

政治大學戰略與國際事務碩士在職專班

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朱新民 博士

二十一世紀中共的東亞安全政策—以南海地區為例

研究生：陳金龍

學號：97922007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

謝 誌

本論文付梓，首先要由衷地感謝我的指導老師朱新民博士，因為有朱老師在論文寫作上的悉心指導，並且在生涯規劃上數次指引迷津，讓本人在求學的一年半時間中，做了許多求學生涯的重要規劃，並確定了諸多未來有意義前膽的努力目標。

在政大外交系三個學期的修業過程中，有幸接受諸位德高望重的老師們悉心指導，並得惠見李登科、趙國材、李明、邱坤玄、朱新民、劉德海、邱稔壤、鄧中堅、姜家雄、黃奎博等教授令人景仰的學者風範，除了在學業上獲益良多之外，親切誠懇的教學態度，學業期間如沐春風，謹在此一併深深致謝。

這兩年來回顧修課與論文寫作，內人全心操持家務，使筆者無後顧之憂，二個兒子雖然無法幫忙或提供意見，惟適時的問安與稚情的貼心，也是筆者得以持續完成學業的動力，更要真誠的感謝兩位認真可愛永遠帶著微笑的‘文琪,佳蓉’助教,與兩年同窗彼此互勉的同學們,表達一份誠摯的謝意。最後感謝主耶穌基督，每當凌晨四點起床，伏案秉燭苦讀，思緒陷入困頓時，透過禱告與心靈對話，主耶穌總是為我敞開另一扇智慧之窗，願主的力量為我們的國家降臨更多福祉。

陳 金 龍 於新竹空軍幻象基地宿舍 2010.7.8

| | |
|---------------------|----|
| 目錄 | 2 |
| 第壹章 緒論 | 5 |
|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 5 |
| 第二節 研究理論與方法 | 7 |
| 第三節 文獻研究與回顧 | 14 |
| 第貳章 中共的東亞安全政策內涵 | 21 |
| 第一節 政治方面 | 21 |
| 第二節 安全方面 | 24 |
| 第三節 區域安全方面 | 32 |
| 第參章 影響中共東亞安全政策的因素分析 | 40 |
| 第一節 國際上的因素 | 40 |
| 第二節 國內的因素 | 48 |
| 第三節 領導人的影響因素 | 52 |
| 第四節 戰略的因素 | 56 |
| 第肆章 中共對南海地區安全的政策 | 60 |
| 第一節 石油戰略安全 | 60 |
| 第二節 領土劃界 | 64 |

| | |
|----------------------|-----|
| 第三節 非傳統安全 | 71 |
| 第五章 東亞諸國對中共東亞安全政策的回應 | 86 |
| 第一節 美國的回應 | 86 |
| 第二節 日本的回應 | 90 |
| 第三節 東亞諸國的回應 | 94 |
| 第陸章 結論 | 98 |
| 第一節 研究發現 | 98 |
| 第二節 研究心得 | 100 |
| 參考書目 | 102 |
| 一、中文專書 | 102 |
| 二、中文期刊論文 | 104 |
| 三、學位論文 | 110 |
| 四、外文專書 | 111 |
| 五、其他文獻 | 116 |
| 六、翻譯著作 | 123 |

第壹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一、研究動機

仔細分析亞太形勢可以看到，在世界多極化和經濟全球化的作用下，亞太地區總體和平形勢保持穩定。特別是2000年以來，朝鮮半島局勢進一步朝緩和發展，中越簽署陸地邊界條約，南海地區形勢也比較穩定。絕大多數的亞太國家都把重振經濟，加強對話合作作為外交政策重點。在地區關係上，大都堅持以外交談判用和平方式來解決爭端。

其中比較突出的是亞太地區多形式、多層次、多管道的對話機制加強，如每年一次的亞太經合組織非正式首腦會議，東盟和中、日、韓合作論壇都起了較好的作用。東亞合作機制開始運作。各國財政部和中央銀行副手會議的建議已得到亞太經合組織首腦會議批准，現在提升為制度化的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2000年5月，10+3財長會議通過的東亞國家第一個多邊經濟合作安排，建立貨幣互換機制是在東亞區域合作上具有重要意義。

但影響亞太地區安全與發展的消極因素也有所發展，這主要是美國進一步加強在本地區的軍事存在和雙邊軍事同盟，積極推動美國主導的戰區導彈防禦計畫部署在東亞。這幾年美日新軍事同盟繼續發展，日本確定了“周邊事態法”等，出現了新的危險的，也就是支持美國在國際進行軍事干預的傾向。¹2000年12月15日，日本政府舉行的安全保障會議和內閣會議上制定的2000年至2005年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畫，這5年防衛費總額達2770億美元，每年防衛費增長率為0.7%，這還不包括日本政府支持給駐日美軍的各種巨額變相軍費開支。在

1. 據《讀賣新聞》2006年01月11日報導，日本政府開始對《周邊事態法》進行修改，以在“日本有事”時美軍可以採取強制措施，優先使用日本國內的機場和港灣。報導明確指出，臺灣海峽等日本周邊地區發生戰爭將被視為“日本有事”。

這項計畫中，日本確定引進空中加油機，建造兩艘滿載 2 萬噸搭載反潛直升機的輕型航空母艦，軍備動向引人注目

值得警惕的是美國最近連續把重型進攻性武器運往亞洲，強化關島軍事基地。如準備在關島部署大型核動力攻擊潛艇和水面兩棲戰艦，運進 64 枚射程在 1600 公里的潘興式巡航導彈。這些動向都是和美國國防部在 2000 年 5 月 30 日公佈的《2020 聯合展望》報告中提出的要把“防務重點轉向亞洲”有關。²

除此之外，出現美國重返東南亞的跡象，美國正積極向菲律賓、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國建議，在 2001 年將美國和這些國家的雙邊軍事演習合併為被稱為“小組挑戰”的地區性軍事演習。

臺灣海峽局勢複雜嚴峻。島內台獨勢力公然提出分裂主張，圖謀以各種形式把臺灣從中國分裂出去。臺灣新領導人連“我是中國人”都不肯說出來，回避和模糊一個中國原則。台獨勢力之所以如此嚴重破壞中國主權和國家統一，主要是由於美國的支持和縱容。美國 2000 年計畫售台 13 億美元以上的武器裝備中，包括了預警飛機和中遠端導彈。美國反華分子企圖推動國會通過所謂《加強臺灣安全法》。美日修訂的防衛合作新指標，對臺灣是否屬於其軍事介入的“周邊安全事態”一直吞吞吐吐。這些都助長台獨分裂勢力破壞亞太和平與穩定。

鑒於中國所處的亞太地區複雜的安全形勢，促使我們高度關注中國周邊地區和平形勢的發展。如果中國周邊和平局勢受到破壞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仍然會受到嚴重的破壞，同樣不能保證我國處於一個和平建設環境之中。這一狀況在 50 年代的朝鮮戰爭和 60-70 年代越南戰爭期間都出現過，我們應十分重視。所以，高度關注中國亞太安全利益，深入分析其中能夠導致變化的成份和因素，是我們制定亞太戰略的重要依據。

² Joint Vision 2020 was a document released on May 30, 2000, by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proclaiming the need for "full-spectrum dominance" on the battlefield. The Joint Vision 2020 concepts have subsequently formed the basis of United States military doctrine.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int_Vision_2020

站在世紀交替的門檻上，回顧已過去的百年當中，中共有 72 年的歷史在與亞太國家戰爭衝突中渡過。那麼，如何發展新世紀的亞太關係，最初的 10 年佔有重要的地位，並會對以後發展有重要影響。而 21 世紀初中共與亞太國家的關係順利發展首先取決於總體國際形勢、亞太地區形勢變化，影響因素錯綜複雜。在這些變化之中，中共的外交政策將扮演著十分關鍵的作用，需要我們認真研究。

二、研究目的

21 世紀初，如何確定中共的亞太政策是確定對亞太國家進一步改善關係的重要準則。對亞太國家的政策制訂必須符合中共的亞太戰略，反過來，對亞太的政策執行又會影響到我們的亞太戰略。而在研究這兩個問題之前，還要分析總體國際形勢。

在 21 世紀初，世界總體和平環境將得到維護，世界大戰發生的可能性很小，中共將能在一個較長的和平時期內從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根據上述認識，我認為，中共的對外總戰略有以下主要內容：

維護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總體和平環境，維護世界和平，推遲以至杜絕世界大戰的發生；和世界各國發展和平友好關係，全面提高中共的國際地位；為實現祖國統一，用和平或其他方式解決臺灣問題創造最有利的國際條件。

要實現這一全球外交戰略目標，從當前國際上主要的戰略力量來分析，主要是看美國對華政策和中美戰略關係的變化。當然，亞太地區的影響也很大，特別是在中國統一問題上有相當的影響和作用，這種情況是歷史造成的，但我們認為在 21 世紀初應有所變化，這是本篇論文的研究目的。

第二節 研究理論與方法

政治學家常用的「理論」似乎有好幾種。吉布森的定義的確是最基本的定義：「理論是一套套或一個個的系統陳述，在邏輯上以各種不同的複雜方式彼此

結合。³」同理而言；波斯比(Nelson Polsby)等人寫道：「科學理論是個由通則構成的演繹網，可以由它求出對某些已知的解釋或預測。」⁴所以最簡單的理論觀，是視理論為一套相關的經驗法則。健全的理论雖然以運用理論概念為特徵，卻是經驗的。我們可以說科學理論有二個特色，一個是結構上的，指概念間的關係；另一個是事實上的，指理論的經驗內容。韓培爾(Carl G. Hempel)替科學理論的要素提出了比較專門的描述：「任何科學理論都可視為一個未加解說的、用演繹法發展而成的系統和一種解說(Interpretation)，使這個系統的詞句有經驗的意含。⁵」「科學發現的邏輯」一書作者，科學哲學家波普爾教授(Karl R. Popper)曾經表示：「各種不同的經驗科學即是各種不同的理論系統」。所以；科學知識的邏輯性應當可以視為各種「理論系統」的基礎理論。⁶

社會科學研究發展的活動當中，政治學家特別感興趣的，似乎就是建立模型(Model Building)和建構理論(Theory construction)。⁷理論與模型結構非常相似，而且在某些政治學研究的不同程度上，二者的功能也相似。然而在事實上；理論與模型仍是有極大的區別。⁸理論主要是用來『解釋』政治的事實，模型則是用來『發現』政治事實。當然；理論也是研究過程的核心，科學研究的過程包含了五大固定的步驟，首先是選定主題(Getting an Idea)，然後是找出事實(Getting the Fact)，第三是綜整摘要事實(Summarizing the Facts)，第四是解釋事實(Explaining the Facts)，最後才是測試解釋內容(Testing the Explaining)。⁹從問題的選定、假設的建立、研究的設計、變項的測量、資料的

3 Quentin Gibson, *The Logic of Social Enquiry*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0), 113.

4 Nelson Polsby et al., eds., *Politics and Social Life*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 1963), 69.

5 Carl G. Hempel, *Fundamentals of Concept Formation in Empirical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2), 34.

6 Karl R. Popper *The Empirical Science are Systems of Theories—The Logic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can Therefore be described as a Theory of Theories* (*The Logic of Science Discovery*, 1962), 59.

7 Alan C. Isaak, *Scope and Methods of Political Science – A Introduction to Methodology of Political Inquiry* (The Dorsey PRESS: revise edition 1975), 135.

8 George Smoot Scientific, *The Scientific Method (Theory or Model)*, 2004.12.15 10:56
<http://aether.lbl.gov/www/classes/p10/theory.html>

9 E. Terrence Jones, *Conducting Political Research* (New York: Happer & Row, second edition 1984), 4-5.

蒐集分析，乃至於研究結果的通則化，整個研究過程均是以『理論』為中心。¹⁰

本篇論文的研究途徑是建立在「系統理論」與「比較研究理論」之上，以下則是針對此二種「理論」的基礎說明：

一、研究理論

政治系統理論大師伊斯頓(David Easton)以「系統概念」為中心，發展出一般性的政治理論，他認為系統分析的出發點，是政治生活的一組互動行為觀念，此組行為是被其他社會系統所包圍，而且以界限區分，並常暴露於環境的影響下。它必須處理因其所處的環境系統影響而產生問題與衝突。倘若這些系統能維持長久存在，它必須獲得足夠的回饋訊息，並能採取措施調整未來的行為。調整可能只需按固定目標作細部的檢討以滿足新情勢，但也可能需要更改舊目標或徹底變動它們，如欲求長久運作，系統可能必須具備徹底變革或改造自我內部結構或流程之能力。¹¹

伊斯頓為了替系統理論架構補充了一些內容，特別談論政治系統的「輸入」(Inputs)和「輸出」(Outputs)。「輸入」包含：

(一)、要求(Demands)—來自政治系統的環境，指出其所要、所需、所求的表示。

(二)、支持(Supports)—社會願意視該系統及其領袖為合法的程度。

至於「輸出」；是指決策過程的各方面—法規的制定、法規的解釋、法規的執行。這些概念都很重要，因為他把系統模型之中，如何說明系統與環境之間，或系統彼此之間的關連，清楚描述出來。

系統理論還有一個基本概念，那就是「回饋」(Feedback)。回饋是指輸出對輸入，也就是對決策的影響。例如利益團體向國會提出要求(即輸入)，要求通過某一特定法案，國會不顧這些要求，否決了這個法案(即輸出)。利益團體對國會決定的反應，最終形成回饋，也許又有新的輸入，甚至不再支持系統，

10 David Nachimias and Chava Nachimias, Research Methods in the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econd edition 1981), 23.

11 David Easton,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Analysis – The Political System under Stress Ch.7 (New York: Prentice-Hall Englewood Cliffs, 1965), 103-1106.

包括和平抵抗在內。國會從輸入的改變，得知其決定所造成的後果，也許就會修正它的行為。¹²

本論文所採行的系統理論模型乃是建構在「國際現勢」與「中共東亞政策」這個系統與次系統的界限上，外來的國防威脅環境與國會預算成為最大的輸入「要求」與「支持」，緊接著一連串的亞太政策產出成為具體的「輸出」。依外在環境變化不斷調整的變革腳步與演進方向，是使系統的運作連續不絕的主要依據，這就是「回饋」觀念的具體成效與貢獻。它替系統研究方法建立了處理「輸入」與「輸出」間雙軌關係的方法。因此系統的行為可以視為連續不斷的過程，在這個過程裏，輸出是對輸入的反應，而輸入反過來又受輸出的影響。

二、研究方法

(一)、歷史研究法

歷史研究法希望從錯綜複雜的歷史事件中，發現事件間的因果關係與發展規律，以便做為瞭解現在和預測將來的基礎。從事歷史研究者必須隨時抱持批判的態度，以發現真理。研究步驟：(1)選定問題(2)收集史料(3)鑑定史料(4)建立假設(5)解釋和報告研究的發現。

運用歷史資料，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對過去事件進行研究的方法。亦稱縱向研究法，是比較研究法的一種形式。在政治學領域中，它著重對以往的政治制度、政治思想、政治文化等的研究。

政治學家一般都承認歷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價值。承認歷史的態度和方法是政治研究的一個不可缺少的基礎。歷史研究法曾經是政治學最主要的研究方法。在中國古代，許多有關政治制度的著作都是由歷史學家撰寫的。在西方，採用歷史研究法有影響的學者，有法國的孟德斯鳩、德國的沙維格尼、英國的 S. H. 梅因。歷史研究的目的是在於解決政治制度的現狀及其演變趨向。但不是斷章取義地分析政治制度的現狀，而是系統地研究它們以往的發展及

¹² These notions are developed in Easton, *An Approach to the Analysis of Political Systems*. Transferred from Alan C. Isaak, *Scope and Methods of Political Science – Ch.14, Systems theory and Functional Analysis* (The Dorsey PRESS, revise edition 1975), 215-216.

其變遷的原因。歷史研究法主要是研究政治制度的發展歷史，從各種事件的關係中找到因果線索，演繹出造成制度現狀的原因，推測該制度未來的變化。

行為主義政治學興起後，歷史研究法受到了批評。有些學者認為這一方法容易受歷史研究者的宗教信仰、政治黨派、種族偏見或哲學理論的影響，容易把個人因素或偶發事件視為轉變歷史方向的主要因素，從而影響研究的科學性。同時現代政治學者將研究重點從政治制度轉向政治行為，越來越多地採用心理學、社會學、人類學、生物學等學科的原則、方法及資料，使現代政治研究大大減少了對歷史研究法的依賴。

歷史研究的記錄通常來自兩個方面，其一為書面記錄，如書籍、報紙、期刊、日記、信件、文稿、會議記錄等等。其二則為遺跡、遺址或遺骸。譬如陶器、錢幣、瓦罐、戰斧、界址以及工具、器皿的碎片等等。前者是人們(歷史上的人們)有意識地選擇用以傳遞給後代為目的的記錄，是借助於石塊、紙片、玻璃等實現的。而後者則是無意識的，它們可能存在洞穴、墳塚之中。;歷史記錄既可以是官方的，也可以是非官方的。從真實性和有效性來看，官方記錄的價值要高於非官方記錄。但也未必盡然，因為歷史上統治階級為了自己統治的需要，也會歪曲事實。科學研究不能僅以遺址為依據，因為它提供的關於歷史活動的資料通常是不系統的、殘缺不全的，雖然有些也極有價值。通常講的歷史是指有文字記載的。在有文字可記載之前的則為史前史，對史前史的研究，其資料來源又不一樣。

歷史研究的資料通常分為第一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第一手資料就是原來的或該事件(或活動)的首次記錄，是事件的實際目擊者或參與者所經歷的。第二手資料是至少一次以上被援引的關於該事件的敘述。如法院審理某一案件，當時的法庭記錄就是第一手資料，而新聞界對此案件及其審理的評論就是第二手資料。從資訊學的觀點看，第一手資料轉變為第二手資料的過程中，會發生資訊過濾，因而存在資訊失真的情況。因此，以歷史為研究物件的歷史研究最好要掌握第一手資料，這是歷史研究的基本原則。第二資料應作為背景知識、觀點或熟悉該領域的方法來看待。而第一手資料的獲得，無論是對哪種研究來說，都是至關重要的。

如何判別資料是第一手的，還是第二手的?這就要求對資料進行分析。這

一過程稱為歷史批判，有人也稱之為“歷史批評”。而歷史批判又可分為外在批判和內在批判兩種。；所謂外在批判，就是要回答：這些材料真實、可靠嗎？它們是如何得來的？由誰記錄的？材料的時間、地點與實際相符嗎？內在批判則要解決材料的意義和可信度問題，強調批判材料內容本身的價值。當然，內外批判有交叉、重疊的部分。但內在批判強調內容本身，而外在批判強調資料作為來源的情況。這二者實際是不可分離看待的。如果材料來源不真實，就不可能被運用；而即使內容真實，如與研究問題無關，也是無用的。；在處理歷史資料時，必須考慮歷史記錄是第一手資料還是第二手資料，其真實性怎樣等這些問題，否則研究就失去價值了。

(二)、文獻分析法

此種研究方法，主要是著重蒐集資料與分析資料，通常是應用在書寫第二章的文獻分析，因此，不管採用問卷調查、實地觀察或其他方法，文獻分析法都是與其相互搭配出現，而且必須先有文獻分析的內容，才可以依據文獻內容，考慮較適宜的研究方法做搭配，所以文獻分析法需要大量蒐集資料。

文獻研究乃是對某一問題自過去的有關研究中調查其文獻，並加以分析而形成一研究之內容。文獻研究乃是研究工作的最普通方法，也是一切研究工作所必須經過的步驟。任何研究，第一部工作就是由文獻研究開始，即作文獻的調查和閱讀，以查考是否前人已對此課題有過研究，或其研究成果為何，有何不當！以期獲得一綜括的概念，同時，亦期望能避免作重複的工作，而浪費時間、精力和金錢。有關文獻常常可以自開始查考的有關文獻中所附列之參考文獻一覽中找出。收集文獻，如按歷史的過程加以編排，可以發現並瞭解該問題的發展及變化情況。

文獻研究法是根據一定的研究目的或課題，通過調查文獻來獲得資料，從而全面地、正確地瞭解掌握所要研究問題的一種方法。文獻研究法被子廣泛用於各種學科研究中。其作用有：能瞭解有關問題的歷史和現狀，幫助確定研究課題。能形成關於研究物件的一般印象，有助於觀察和訪問。能得到現實資料的比較資料。有助於瞭解事物的全貌。

文獻分析法主要指蒐集、鑑別、整理文獻，並通過對文獻的研究，形成對事實科學認識的方法。內容分析法則通過對文獻的定量分析，統計描述來實現對事實的科學認識。內容分析法則通過對文獻的定量分析，統計描述來實現對

事實的科學認識。這兩種方法有共同的物件，都不與文獻中記載的人與事直接接觸，因此，又稱為非接觸性研究方法。這兩種方法有共同的對象，都不與文獻中記載的人與事直接接觸，因此，又稱為非接觸性研究方法。二者的區別是在分析的重點與分析的手段上有不同。二者的區別是在分析的重點與分析的手段上有不同。

(一) 文獻的概念

文獻的現代定義為“已發表過的、或雖未發表但已被整理、報導過的那些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文獻的現代定義為“已發表過的、或雖未發表但已被整理、報導過的那些記錄有知識的一切載體”。“一切載體”，不僅包括圖書、期刊、學位論文、科學報告、檔案等常見的紙面印刷品，也包括有實物形態在內的各種材料。“一切載體”，不僅包括圖書、期刊、學位論文、科學報告、檔案等常見的紙面印刷品，也包括有實物形態在內的各種材料。

(二) 文獻的種類

1. 零次文獻（零次文獻即曾經歷過特別事件或行為的人撰寫的目擊描述或使用其他方式的實況紀錄，是未經發表和有意識處理的最原始的資料，即 primary documents）
2. 一次文獻（直接記錄事件經過、研究成果、新知識、新技術的專著、論文、調查報告等文獻）
3. 二次文獻（檢索性文獻）
4. 三次文獻（在利用二次文獻檢索的基礎上，對一次文獻進行系統的整理並概括論述的文獻）

(三) 文獻綜述的基本要求

對文獻綜述的品質要求主要有六條：對文獻綜述的質量要求主要有六條：

1. 搜集文獻應當客觀、全面。
2. 材料與評論要協調、一致。
3. 針對性強。
4. 提綱挈領，突出重點。
5. 適當使用統計圖表。
6. 不能混淆文獻中的觀點和作者個人的思想。

(四) 文獻綜述的步驟與方式

第一步，確定綜述的選題。

第二步，收集相關的文獻資料。

第三步，整理文獻。

第四步，撰寫綜述初稿

第五步，修改綜述初稿，並完成文獻綜述。

第三節 研究限制

二、研究限制

一、資料蒐集限制

有關資料的取材，因中共外交相關單位對政治、軍事等敏感事務仍維持相當程度軍機保密機制，雖說查詢管道多元，但透明度有限。尤其是頃刻正在進行中的軍事研究發展，多係尖端科技範疇，商業與軍事的敏感度均高，取得更是不易。故中共外交政策在對外報導、公佈、宣稱的相關文件資料，基於政治與情報因素考量，仍存有濃厚的宣傳色彩與主觀自圓其說的政策推銷意味，故與實際狀況或多或少有所出入，不易過濾或研判其真偽，易在短時間內，產生無法確認真相及難以取捨之困擾。

二、不確定因素限制

中共在亞太的發展「進程」，本身即存在有許多不確定因素，因科技條件、想像空間、研究深度及個人學養的差異，相關資料均帶有官方之政策宣誓與作者私人之樂觀展望。基此限制，筆者儘量以不同文獻進行交叉分析，期能獲得較正確之結論。

第四節 文獻研究與回顧

一、文獻研究

一、《中美台戰略趨勢備忘錄》

作者是政大國關中心特約研究員曾復生博士基於中華民國生存與發展的考量，審慎地選材與研析相關的論述與事件，並盼能為關心台北—北京—華府互動趨勢的讀者們，增添一個資訊管道，以收集思廣益的效果。¹³亞太地區是中共在二十一世紀初期，與美國競逐戰略利益的場所；而台灣海峽也已經成為兩強權力交鋒的焦點。中華民國未來的生存與發展，不可能無視於中共的崛起與擴張，更無法自外於「兩岸三邊」（台北—北京—華府）互動的框架（Frame-work）。對於美國而言，維護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已成為其在亞太地區，處理安全戰略事務的一項重大考驗。然而，從中共的角度觀之，征服台灣就等於是瓦解了美國在亞太地區的盟主地位。事實上，早在二〇〇〇年二月二日、二〇〇一年的二月中旬、二〇〇三年二月十二日，以及二〇〇四年的二月下旬，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和國防情報局局長，就曾經先後在參眾兩院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表示，台灣內部的台獨勢力上漲，已促使台海地區發生軍事危機的可能性，明顯上升。此外，二〇〇〇年十一月間，美國國防部的研究報告披露，解放軍不會用「入侵」的方式攻打台灣，而是用大規模的密集導彈突擊，全面瓦解台灣的空防和預警系統。中共軍方對台作戰的主軸將包括：掃除美國的干預威脅，對台實施精準空襲、發動資訊戰，以及運用特種作戰部隊等措施，並企圖使台灣的軍隊措手不及，無法實施反擊。從近期中共與俄羅斯、以色列，以及歐盟國家等發展國防科技交流和軍購的內容觀之，中共軍隊將擁有的軍備包括：高解析度的雷達衛星、可改變彈道的M—九型彈導飛彈、超音速攻艦飛彈、空中預警管制機、陸攻巡弋飛彈、攻擊直昇機、靜音效果極佳的潛艦等。至二〇一〇年，中共海軍將可擁有十五艘新式潛艦，對台灣海峽的封鎖能力可大幅增加。此外，中共的瀋陽飛機製造廠已取得蘇愷二七型戰鬥機的製造授權和各種設備零件。

13 曾復生,《中美台戰略趨勢備忘錄第三輯》,秀威資訊,2006年11月01日。隨著二〇〇八年總統大選的迫近,「兩岸三邊」的互動關係,勢必會成為影響選舉結果的重要變數。因此,國人有必要密切觀察中美台的戰略趨勢,以確保台灣的關鍵利益與安全。筆者基於中華民國生存與發展的考量,審慎地選材與研析相關的論述與事件,並標明備忘錄完稿時間,期盼能為關心台北|北京|華府互動趨勢的讀者們,增添一個資訊管道,以收集思廣益的效果。

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當前所認定的三項重要的國家安全戰略性任務，已經對亞太安全格局構成深遠的影響。第一項就是有關「祖國統一」的議題。中共不僅把解決「台灣問題」視為民族主義問題，同時也將其視為「國家安全」問題。民族主義追求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而一個分裂的中國，對中共的「國家安全」具有顯著的威脅。第二項國家安全戰略性任務是鞏固並開拓中共在東海及南中國海的政治、經濟、軍事利益。為了要達成此項戰略目標，中共所必須發展及擁有的軍事能力，將不只是足夠對付台灣，而且必須能有效嚇阻任何可能對此地區構成威脅的國家。最後，第三項戰略性任務，就是維持並強化中共對東北亞及東南亞國家的影響力。中共當局將會把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駐軍及其與各國的軍事合作關係，包括「美日防衛合作指針」¹⁴、戰區飛彈防禦體系(TMD)的部署、對台軍售等，視為其解決「台灣問題」，以及取得海疆戰略縱深優勢的障礙；美國也將因中共在亞太地區的軍力和影響力日益強化，而備感不安。據此觀之，台灣海峽潛在軍事危機的根源，主要是來自於美國與中共之間的戰略利益競逐。因此，亞洲諸國，尤其是中華民國、日本，以及南北韓和新加坡，都必須密切注意美「中」兩強間的戰略利益競逐，並找到對自己國家最有利的戰略位置，以因應亞太新形勢的嚴峻挑戰。

二、《國際政治與中國》¹⁵：

作者是閻學通，現任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中日友好 21 世紀委員會中方委員、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中國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理事、中國軍控與裁軍協會理事、中國國際關係研究會理事、中國亞太學會理事、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和學術交流基金會理事、國防大學兼職教授。主要論著有：《中國國家利益分析》、《國際形勢與臺灣問題》、《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中國與亞太安全》、《美國霸權與中國安全》、《國際關係研究實用方法》、《國際政治與中國》(即出)，譯著《爭論中的國際關係理論(第五版)》。發表有關國際關係的論文和文章上百篇，其中部分發表在美國、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印度等國的報紙雜誌上，部分文章被美國、日本、新加坡、羅馬尼亞等國的報紙雜誌全文翻譯或轉載。本書內容簡介本書收集了作者十幾年來的學術文章，圍繞國際

14 1999 年 5 月 24 日，日本參議院在繼眾議院之後，通過了《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相關三法案，即《周邊事態安全保障法草案》、《日美相互提供物品及勞務協定修正案》、《自衛隊法修正案》，為日本軍事力量走向世界、干預地區事務提供了法律依據，從而引起周邊國家的極大不安，也為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增加了新的不利因素。

15 閻學通，《國際政治與中國--未名社科菁華·國際關係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 7 月 1 日。

政治學科在中國的發展，系統地整理了國際關係研究方法，旨在推動我國國際關係研究從傳統研究向科學研究轉變。本書按照國際關係學科的研究方法、理論論述以及對中國安全環境和外交政策的分析和建議的邏輯主題，分為科學、標準與方法，和平、安全與合作，矛盾、崛起與策略三編，並著重突出了國際安全這一主題。作者以現實主義為基本分析範式，在研究安全合作問題時，也借鑒了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一些理念。

本書收集了作者十幾年來的學術文章，圍繞國際政治學科在中國的發展，系統地整理了國際關係研究方法，旨在推動我國國際關係研究從傳統研究向科學研究轉變。全書按照國際關係學科的研究方法、理論論述以及對中國安全環境和外交政策的分析和建議的邏輯主題，分為科學、標準與方法，和平、安全與合作，矛盾、崛起與策略三編，並著重突出了國際安全這一主題。作者以現實主義為基本分析範式，在研究安全合作問題時，也借鑒了自由主義和建構主義的一些理念。

三、《國際關係理論與東亞安全》

作者是朱鋒，1964年生，江蘇蘇州人，1981年考入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1991年獲博士學位。現為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北京大學國際戰略研究中心副主任。作者長期從事國際安全、東亞地區安全與國際關係理論的教學與研究，曾在美國哈佛大學、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美國關注軍控科學家聯盟、英國杜蘭大學、日本信洲大學以及香港中文大學擔任訪問學者。著有《人權與國際關係》、《風雲2001——新世紀開年國際事件點評》、《彈道導彈防禦計劃與國際安全》等學術專著，發表中英文學術論文100多篇，是中國具有代表性的中青年學者。

東亞在全球化、區域主義和國家制衡力量的重建中發揮著核心作用，東亞安全研究已成為中國的一門顯學。本書集朱鋒教授十年東亞安全研究之結晶，匯集了作者對國際關係理論、國際安全理論和東亞安全教學、研究的豐碩成果。基于深厚的學術素養和對國內外學術動態的及時掌握，作者對涉及東亞安全的國際關係理論與中國在東亞地區的政策動向，見解獨到，論證深刻。在紛繁複雜的東亞安全局勢中，作者審時度勢，通過長期的跟蹤研究和多元的分析視角，為讀者了解東亞的國家安全和國際局勢，了解中國與有關東亞國家的關係和國防建設，尤其是對最近的朝鮮核試驗等重大現實問題，提供了精闢而獨到的專

家意見。對於國際關係研究的專業人員，對於關心東亞和國際時事問題的讀者，本書是難得的參考讀物。

四、《前瞻二十一世紀的戰略思潮》

作者是由王高成教授主編，內容強調身處二十一世紀的開端，人類正面臨著許多重大的挑戰，包括上一世紀末冷戰的結束，形成美國的獨霸與各強國的權力競逐；全球化的持續發展，造成各國互賴與競爭的同時深化；二〇〇一年九一一事件的發生，標示著恐怖主義的興起，形成各國安全的新威脅；反恐戰爭的進行，又引發了西方與回教文明衝突的加劇；中國迅速的崛起，也對東亞地區帶來了新的挑戰與機會；全球能源需求的日益增加，也導致各國能源競爭的日益激烈；各種重大疾病與傳染病的蔓延、走私、跨國犯罪與環境污染的惡化等，又形成了人類的新安全威脅。面對這些新的威脅與挑戰，各國皆須審慎思考與應對，建構最佳的國家戰略，以謀求國家最大的利益。

戰略是一國在總目標下的總體而長遠規劃，其範疇包括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心理及科技等層面，對於國家的生存與發展影響至巨。從歷史經驗而言，如果國家缺乏戰略的指導或選擇了錯誤的戰略，輕則導致國困民貧的結果，重則走向覆亡的悲慘命運，例如二次大戰前的德國與二次大戰後的蘇聯皆是明顯的例子。同時，各國戰略的走向，不僅會決定各自的優勝劣敗，也將影響國家間的互動、國際局勢的發展、甚至是全人類的命運。因此，當此新世紀開展之初，各項挑戰接踵而來之際，對於未來全球及國家應有的戰略思維與規劃，做一前瞻性的思考，乃當務之急，亦具備積極的時代意義。

綜合而言，未來的戰略應把握幾個關鍵的原則。第一、應減少對武力的使用。過度的依賴與運用武力，只會加重各國間的猜忌，形成安全困境，刺激軍事競賽，導致地區及全球的緊張，甚至引起軍事的衝突與報復，國家亦不能得到真正的安全，例如美國以武力手段對付伊拉克即是明顯的例子。第二、應注重經濟的交流與合作。二十一世紀已進入了全球化的時代，國家間的交流與互賴加深，各國應善於運用此一趨勢，降低軍事衝突的意願，增加經濟合作的程度，以增進全人類的和平與利益。第三、應注重不同文明間的瞭解與和諧。冷戰結束後，意識型態對立的終結，卻也凸顯了各地區不同文明的存在。不同的文明間應相互理解與尊重，甚至進一步相互的相互學習與合作，才能避免杭廷

頓所謂的「文明衝突」與恐怖主義的滋生，維繫人類的和平與安全。第四、應注重軟權力的運用。軟權力係指一國文化與制度的吸引力，強調的是對話與合作，而非對抗與壓制，故軟權力的行使較不易引起他國的反彈與傷害，有助於促進國際的和平。

本書共集合了9位國內與大陸優秀的國際關係與戰略學者，就二十一世紀戰略思想的發展作了深入的探討，涵蓋了政治、經濟與軍事等分項戰略，主題包括美中等大國的戰略、全球反恐的戰略、經濟發展的戰略、地緣戰略、政治戰略與軍事上的游擊戰略，內容充實而豐富，必能幫助讀者對二十一世紀應有的戰略思潮有深入的瞭解，也有助於我國建構卓越的戰略，以因應本世紀眾多的挑戰。

五、《南海情勢發展對我國國家安全及外交關係影響》

本文是由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編著，自一九九一年蘇聯瓦解，原已經於一九八九年宣告結束的東西冷戰正式落幕後，亞太地區的情勢發展出現以下幾項特色：一、東亞地區權力結構轉變，由美、蘇兩強對抗的格局，轉變為美國獨霸到朝多極化的格局發展；二、中共崛起成為區域霸權，並朝海權國家發展，軍力部署轉向海洋及東南方移動，中國威脅論的升高；三、東協擴大包含東南亞十國，其中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及汶萊與中共在南海主權問題上有所衝突，對中共深感疑慮，而東協的擴大與整合，具有以集體的力量來對抗中共壓力的目的；四、冷戰結束並沒有給東亞地區帶來真正的和平，南海地區、台海地區、及朝鮮半島被視為是東亞地區三大衝突引爆點，導致東亞國家紛紛加強軍備，增加亞太地區的不穩定性，以南海問題而言，中共在過去幾年當中，就曾先後與越南及菲律賓發生衝突；五、美國由從東亞撤退後，再透過雙邊同盟或軍事關係重新返回東亞，美國政策的調整，及東協國家對美國的態度轉變，應是與中共的擴張尤其是在南海地區的發展有關。

上述五項發展均與南海區域有關，中共勢力向南海延伸，牽動東亞權力結構的可能重新調整，而且中共勢力擴張增加對東協國家的威脅，促使東協國家重新引進美國力量，至於南海地區的主權衝突則會影響到中共與東協的互動關係，也會引起美國與日本的高度重視，而我國是東亞地區的一員，南海情勢發展所牽動的東亞情勢的變化與我國國家安全息息相關，加上我國是南海主權的

爭端國之一，對於南海情勢的發展，當然無法置身度外。

此研究以南海地區的情勢發展為基礎，探討(一) 中共對東協國家的政策；(二) 東協區域論壇、亞太安全合作理事會、「處理南海潛在衝突研討會 (Managing Potential Confli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等第一、二軌多邊對話，對解決南海問題的進展；(三) 南海情勢發展如何影響中共與東協國家的互動關係；(四) 主要強權及歐盟，尤其是美國與日本，在南海地區所扮演的角色與採取的政策；(五) 東協國家在臺海兩岸間所採取的政策；(六) 我國在南海情勢發展中所面臨的挑戰；(七) 我國海岸巡防署在東沙、南沙群島駐防，應具備之執法內涵、組織、裝備、法規、及策略。透過對這些問題的深入研究，以針對南海情勢發展對我國國家安全及外交關係的影響提出因應對策，俾供政府決策之參考。



第貳章 中共的東亞安全政策內涵

第一節 政治方面

中國崛起必然衝擊既有的國際秩序，而最為敏感的莫過於中國對東亞安全秩序的影響。從地區意義上講，“中國威脅論”濫觴于東亞有其必然性。冷戰結束以降，許多學者對亞洲的未來抱有悲觀心態，認為亞洲必成爭奪的場所，其主要原因在於對中國成為修正主義國家的預測。然而，亞洲儘管紛爭不少，但並未爆發大規模衝突，且其前景趨向光明。大衛·康（David C. Kang）指出，“從歷史上看，歷來都是中國的軟弱導致亞洲動盪不安；在中國強大和穩定之時，亞洲秩序井然。¹從歷史的角度看，一個富有和強大的中國是鞏固地區穩定的力量。”另一方面，中國一個世紀的衰弱和混亂，以及期間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影響奠定了今日亞洲格局的基礎。中國的強大自然引起疑慮、猜測和期待。國際社會關注的是，一個更加強大和自信的中國如何對待鄰國，其鄰國對中國在東亞影響的增強做出何種反應。

關於中國崛起對東亞安全秩序的影響不乏悲觀認識，但總體而言，越來越多的國家領導人和學者對東亞前景持有樂觀看法。在一定意義上，這是中國崛起進程中的正向變革所導致的。中國崛起是東亞秩序變動的一部分，進而成為東亞秩序變動的主要推動力，成為引領東亞秩序變革的核心要素。中國長期以來不是從地區（Region）角度出發處理與亞洲國家的關係，而是在雙邊層次上處理與各相關國家的關係。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中國將國際戰略重點放在促進東亞一體化進程上，立足臨近地區，加強地緣政治經濟的塑造能力。中國促動的東亞合作機制代表了中國外交的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關的地區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區秩序，在建設性的互動過程中消除長期積累起來的隔閡和積怨，探索並逐步確立國家間關係和國際關係的新準則。中國在地區合作中的積極進取，既促進了地區內國家對中國發展經驗和成果的分享，也提高了議程創設（Agenda-Setting）能力。中國

¹Kang, David C. "South Korean and Taiwanese Development and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9, No. 3(1995), 568-580.

在地區秩序建設中的努力實際上為國際秩序變革提供了一種可堪借鑒的範式。無疑，中國崛起對東亞安全秩序的影響，在日本和美國引致了更多討論。鑒於中日之間歷史宿怨、現實衝突和未來競爭的判斷，日本在經濟上加強與中國合作、在安全和戰略上制衡中國的目標短期內不會改變。當然，隨著東亞合作進程的加速進行，中日問題走向緩和、穩定和逐步解決是可能的，也符合東亞所有國家的利益。近年來，美國對中國的戰略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的結合：將中國網入一系列國際組織的多邊戰略，與中國政府在一系列功能性領域進行綜合性雙邊接觸的戰術。在這個過程中，尤其是隨著非傳統安全重要性的上升，中美安全關係出現了深具建設性的變化。儘管美國對中國能否約束其增強的實力、信守承諾存在疑慮；但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士支持對華接觸政策。大衛·蘭普頓強調，由於中國日益成為地區和全球經濟發展的引擎，美中保持穩定的戰略關係超越了狹隘的安全利益。以上看法表明，對中國崛起與東亞安全秩序變革的認識正在變得理性和客觀，某些理解頗具啟發意義，但總體而言，它們並未站在中國角度看待中國崛起，對中國變革的正向性缺乏全面的認識，甚至缺乏對中國自身安全困境的基本關注。

二戰結束之後，東亞地區秩序的建構一直被冷戰的陰影所遮蓋，並為東亞民族主義浪潮所淹沒。美國主導建立的雙邊安全同盟成為東亞安全秩序的主體，也成為中國安全困境的主要來源。當時，東南亞地區與朝鮮半島忙於非殖民化與國家重建，1967年成立的東盟因外部牽制和內部聚合力不足難以在東亞秩序建構上發揮作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崛起並沒有立即從根本上撼動既有的東亞安全秩序。中國忙於國內革命建設、突破西方的封鎖和應對蘇聯威脅，截至1982年中國國際戰略調整，中國長期關注的是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儘管其後中國經濟安全的重要性開始明顯上升，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的地位相對下降，中國的安全觀念仍然集中於核心安全領域。彼時，霸權與均勢並存仍是東亞安全秩序的基本特徵。²

東亞安全秩序的變動始於冷戰的結束，尤其是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中國安全思想的創新及其付諸實踐所激發。冷戰結束之後，東亞多邊安全機制開

² 約翰·伊肯伯裏主編：《美國無敵：均勢的未來》（韓召穎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美國研究》2007年第2期

始萌芽，其根本動因是美國從東南亞撤軍。冷戰結束後，隨著兩極對峙局面的結束，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東亞安全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美國也相應地調整自己的戰略，減少了在東亞的軍事存在，甚至在 1992 年撤出了東南亞。東南亞由於美軍的撤出而出現巨大的權力真空，原來被冷戰所掩蓋的矛盾以及歷史上遺留的領海和領土糾紛紛紛浮現，加上該地區國家在經濟發展水準以及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存在的差異，使該地區內部出現了不穩定因素。為填補美國撤退後留下的權力真空，保持本地區的安全穩定，東盟進行了積極探討。由於東盟地區各國中沒有一個國家能夠獨自主宰本地區的安全事務，東盟引入了多邊主義，並在 1994 年創立了東亞迄今唯一的多邊安全機制——東盟地區論壇（ARF），從而引入了合作安全的理念和實踐。與此同時，中國面對安全環境的巨大變化，積極尋求與周邊國家的安全協調與合作。1996 年 4 月上海五國機制創立，中國領導人將非核心安全領域納入安全戰略思考的重心，開始構築以合作安全、相互安全為核心的新安全思維。1997 年 3 月，中國在東盟地區論壇會議上，正式提出了“新安全觀”。³1997 年 4 月，《中俄關於世界多極化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的聯合聲明》簽署，雙方主張確立新的具有普遍意義的安全觀，呼籲通過雙邊、多邊協調合作尋求和平與安全。1999 年 3 月 26 日江澤民在聯合國裁軍談判會議上第一次全面闡述了中國的新安全觀，強調新安全觀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中國的新安全觀不僅在隨後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中得到積極體現，也逐步引入到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中，引申到關乎朝鮮半島穩定的六方會談之中，並在其中尋求和擴大與各國的共同利益。與此同時，中國積極參與東亞一體化的進程，促使東亞進入全面接觸的時代，使東亞政治對話和安全協調取得顯著進展。

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關係發生深刻轉變，一個緊密型的環中國經濟帶正在形成。與之並行的是，中國崛起帶來的地區震動表明，中國有必要以東亞地區發展為核心，大力促進東亞一體化，創立有助於地區經濟發展和進一步經濟開放的地區性國際制度，為其他國家搭中國發展之便車提供機會。中國對地區合作的參與是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冷戰結束後，中國與周

³ “新安全觀”又稱“非傳統安全觀”，是對“冷戰”後期開始出現的一些不同于“舊安全觀”即“傳統安全觀”的新安全觀念的統稱，指與“舊安全觀”即“傳統安全觀”相對的各種新型的安全觀。

邊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關係陸續正常化、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構成了這一轉變的歷史背景。中國周邊安全面臨的挑戰和隱患，中國與世界、尤其是與周邊關係的日趨緊密，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則提供了啟動地區合作的契機和動力。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加強睦鄰友好與地區合作，地區合作首次出現在黨的代表大會政治報告中，首次與雙邊關係並列。此後，中國將加強地區合作與交流作為實現亞洲共贏的有效途徑，積極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中國積極參與了上海合作組織的活動及“10+3”的進程，逐步加大對這兩大地區合作的投入。在北面，上海合作組織已完成機制化建設，逐步從安全合作向經濟政治合作擴展。在南面，中國率先與東盟確定建立自由貿易區，帶動其他域外國家對自由貿易安排採取更為積極的態度。

東亞主要採用雙邊安全體制和多邊安全體制來維護和確保整個地區的安全。東亞國家有不同的安全追求，美國追求單邊霸權，中國、俄羅斯乃至日本都在或明或暗地追求多極化，其他國家則期望建立多邊安全協調機制，導致存在名目繁多的安全安排，從而構成了霸權、均勢、合作安全等看起來相互衝突的安全選擇交織的局面，東亞安全秩序被視為各種相關安全模式的疊合。隨著中國崛起正向性作用的發揮，東亞安全秩序呈現出與冷戰結束之前截然不同的特徵。雙邊同盟、多邊對話和特殊外交的混合，既沒有出現軍事競爭對抗，也沒有發展成為多邊合作體系，而是處於均勢與共同體秩序之間。在一定意義上，東亞安全正在經歷著美國同盟秩序構想和東亞合作安全構想的博弈。

第二節 安全方面

中國崛起與東亞安全的驅動力，東亞經濟一體化及其溢出效應、中國全面崛起、美國的戰略調整、日本加緊邁向政治大國的步伐、東盟的規範性效應等是東亞安全秩序變革的主要驅動力。其中，中國崛起是安全秩序變革的核心驅動力，也是其他要素發揮戰略效應的牽動力。⁴

（一）東亞經濟一體化及其溢出效應

⁴ 陳勇，《新區域主義與東亞經濟一體化》，中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年06月01日。

東亞經濟一體化迄今經歷了三個主要發展階段。20 世紀 60 年代到 90 年代中期，東亞經濟一體化處於市場或投資驅動階段，日本經濟復興、“四小龍”經濟奇跡和中國經濟崛起成為東亞發展的助推力量，但東亞經濟增長主要依靠各自的經濟和貿易政策，而非多邊框架下的經濟合作。日本在東亞經濟合作和產業轉移中發揮了關鍵性的作用，其投資政策主導推動雁行經濟秩序，東亞國家和地區之間形成依照勞動分工和動態比較優勢的垂直分工格局。東亞地區內貿易比重逐漸上升，貿易和對外直接投資成為東亞經濟增長的發動機。

地區經濟一體化是東亞穩定和繁榮的基礎，其溢出效應反過來加強了政治、安全、社會、文化等領域的地區合作，一些制度框架開始建立起來，東亞共同體理念被接受為地區合作的遠景。經濟相互依賴以及既有的規範和制度起到了緩解地區內權力失衡的衝擊、防止安全困境泛化的效用。與此同時，一系列雙邊同盟、安全對話、多邊論壇、部長級會議、第二軌道接觸及其他特定機制逐步建立起來，並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各國意識到，未來東亞秩序建構並不通過霸權戰爭實現，而是基於共同利益、以國際制度為主要方式的國際協調。共同利益的彙聚和制度化逐步成為東亞合作的主導要素。

（二）美國的戰略調整

美國的重要利益遍佈東亞每一個角落，並為此建立了維護其戰略利益的正式或非正式制度安排。在安全領域，美國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等建立了正式軍事聯盟，與臺灣保持著實質性的准同盟關係。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美國採取了一系列戰略舉措，調整並重新確立了以美國為軸心、由五對正式的雙邊同盟和若干非正式的安全關係構成的、涉及軍事合作各個領域、輻射整個東亞的輪輻體系（Hub-Spoke System）。⁵該體系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次是與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的雙邊同盟，其中與日本和澳大利亞的同盟分別被美國視為其亞太安全戰略的北錨和南錨，尤其是與日本的同盟更是被美國當作其東亞戰略基石；第二個層次是與菲律賓和泰國的雙邊同盟；第三個層次是與馬來西亞、新加坡和印尼等東盟核心國家日益密切的安全合作關係。另一方面，冷戰結束不久，美國減少了在東亞的軍事存在，甚至在 1992 年撤出了東南

⁵ 曾建元，《中國崛起對東亞區域之影響》，台灣新社會智庫，
http://www.taiwansig.tw/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task=view&id=1419&Itemid=117

亞。美國撤軍導致東南亞出現巨大的權力真空，原來被冷戰所掩蓋的矛盾以及歷史上遺留的領海和領土糾紛紛紛浮現，激發了東亞多邊安全合作機制的萌芽。2001年“9.11”事件之後，美國重返東南亞，積極參與東盟地區論壇的活動，憑藉其強大的力量持續影響東亞安全。

在經濟領域，美國是東亞所有經濟體的重要夥伴，東亞在美國貿易中的比重長期穩定在37-38%，美國在東亞的對外直接投資占其總量的比重近年來有所增長，從15%上升到18%左右。美中、美日經濟關係往往吸引著全球的目光，並在一定程度上被視為衡量雙邊關係的尺規。自20世紀90年代早期，美國就在亞太經合組織（APEC）中發揮領導作用，並且成功地把非經濟議題納入非正式領導人會議的議程。美國還致力於加強與中日之外其他經濟體的合作，尋求與某些東亞國家締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

總體而言，美國在東亞的安全制度安排得以持續，其戰略利益得以維護和拓展，美國將繼續在東亞秩序建構中扮演關鍵角色。但另一方面，美國不是東亞霸主，它與東亞其他大國形成均勢格局，將均勢視為東亞和平的主要標杆，並尋求與東亞國家關係的重新定位。美國在東亞戰略調整最劇者莫過於中美關係。經過十數年的猶豫，美國終於開始以較為平衡客觀的眼光看待中國的崛起。2005年9月，副國務卿佐立克（Robert Zoellick）用“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表達對中國的預期，此後美國呼籲中國承擔起世界經濟領袖的必要責任，在一定意義上鎖定了美國對華奉行接觸政策的戰略趨向。⁶中美通過制度化管道穩定了雙邊關係，為戰略互動和多邊領域的對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三）日本加緊邁向政治大國的步伐

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末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強國，逐步建立了資本密集型、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經濟，實現了以往用武力沒有實現的目標。與其國際地位相適應，日本開始在認同上出現變化。自80年代以來，日本把成為“普

⁶ 羅伯特·佐利克，2005年副國務卿在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發表演講時，闡述了“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這一概念。有鑒於中國的成功、中國的規模及其不斷上升的影響力，中國會有興趣和利益，與其他主要的國家一起來維持並強化國際體系，因為正是依靠這一國際體系，才使世界更加安全、更加繁榮，也給美中兩國人民帶來了更多的機會。維持和強化國際體系對於所有的主要參與者，包括歐盟、日本、印度、俄羅斯等等，當然還有美國，都是一個挑戰。

通國家 (Normal Nation) ” 視為戰略目標，追求與其經濟實力相符合的政治大國地位。日本熱望在全球和地區事務中扮演更為顯著的角色。在全球舞臺上，日本尋求更大的國際認可，成為世界秩序的主導者之一，將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席位作為孜孜以求的目標，並為此不遺餘力達 20 年；在地區舞臺上，日本尋求界定未來東亞共同體的理念、框架和主要特徵的領導權。

戰後《美日安保條約》是日本的“生命線”，而美國主導的自由貿易體制則是其“利益線”。⁷日本受益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在東亞主導建立的安全體系，並以此為依靠建立了日本主導的雁行經濟秩序，從而確立了日本在東亞的優勢地位。日本以“普通國家”為主要動力和旗幟，以美日同盟為依託，不斷強化軍事力量，爭取在東亞安全事務中的發言權，加強對東亞的影響力。冷戰結束以來，東亞國家尤其是中國的經濟崛起改變了東亞的權力關係，也使得東亞安全情勢處於演變之中。日本是中國的近鄰，面對中國在東亞地區呈現的越來越強大的力量，日本比美國更深切感受到巨大的壓力。對日本而言，最為關鍵的步驟莫過於重新定義和確認美日安全同盟，因為後者是兩國在東亞利益的柱石。東南亞對日本經濟繁榮至關重要，日本與東盟國家簽署雙邊或多邊經濟夥伴協定，以進一步鞏固合作關係。其次，自由貿易區在東亞經濟一體化中發揮著富有成效的作用，不僅促進經濟增長，而且有助於政治和社會穩定，也會對日本帶來積極的影響。當然，這些調整必然影響中日經濟關係。作為東亞秩序的首倡者，日本不會甘心在自由貿易區建設、地區秩序建構上落於中國之後。2002 年，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提出超越“10+3”框架的“擴大的東亞共同體”構想，其基本內涵是日本主導、日本和東盟為核心、將澳大利亞等非東亞國家吸收為共同體核心成員，制衡中國在東亞影響力擴大的意圖不言自明。2006 年下半年以來，中日兩國在確立戰略互信關係上做出了積極的努力，但日本從安全和戰略上制衡中國的意圖卻愈發明顯。

亨廷頓 (Samuel Huntington) 指出，日本未來有四個選擇：第一，與美國

⁷ 日本國與美利堅合眾國之安全保障條約 (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日文：日本国とアメリカ合衆国との間の相互協力及び安全保障条約)，簡稱美日安保條約，由美國與日本在華盛頓於 1960 年 1 月 19 日簽訂。此條約宣示兩國將會共同維持與發展武力以抵抗武裝攻擊。同時也將日本領土內一國受到的攻擊認定為對另一國的危害。也包括美軍駐日的條文。此條約在冷戰時期強化了美日關係，也包括了後來進一步的國際合作與經濟合作的條款。維琪百科，<http://zh.wikipedia.org/>

維持和加強盟友關係，扮演英美關係中的英國角色，這一關係在亞洲情勢之下不可避免被視為本質上是反華的(Anti-Chinese)，可能陷日本於某些衝突情境；第二，如果中共實力繼續增強，日本可以與中共結盟，扮演法德關係中的法國角色，但與中共結盟意味著大幅削減日本與美國的聯繫；第三，日本竭力避免捲入東亞的敵對和競爭，不與強國結盟，而是發展自己的軍事力量以求必要的自衛，其角色如在歐洲保持中立的瑞士；第四，與所有其他大國和次要大國發展合作關係，積極參與亞洲外交活動，並緩和彼此的矛盾，如同歐洲的德國，日本很難這樣做而不針對中國大陸。從當前的情勢看，日本選擇了一條混合路線，即在經濟上加深中日相互依賴的同時，繼續加強在安全和戰略上對中共的制衡，這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東亞安全秩序建設的漸進性和變革性。

(四) 東協方式的規範性效應

東協逐漸形成了富有次地區特色的決策模式。將東協處理成員國之間關係的一系列基本原則和規範概括為東協模式(ASEAN Way)，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原則是非正式性和協商一致。⁸在非正式性原則下，地區合作保持較低的制度化程度。在協商一致原則下，地區合作的決策機制回避了多數表決和強制執行，而是滿足地區合作參與者的舒適感。東協所有成員國，不論大小和國力強弱，在東協事務的決策、執行過程中絕對平等。東協最高一級的決策機構由各成員國輪流主辦，最高一級的執行機構常務委員會也實行輪換制，各國通過輪流執掌常務委員會均衡地取得對下屬執行機構的領導權。東協採取協商一致的決策方式，即通過全體成員國的反復磋商和妥協，最後達成共識，任何議案只有在全體成員沒有反對意見時才能通過。在對外事務上，東協合作以各國政策的獨立為前提，允許單邊主義在多邊主義的框架內發展，允許國家決定與地區追求並存。這種最大限度兼顧國家利益和地區利益的做法，保證了利益各異的成員國之間進行有效合作，也導致較低的制度化合作水準。以東協方式為準繩，東南亞各國有效地和平解決了一系列雙邊和多邊爭端，並逐步建立了穩定的次地區秩序。

在對外安全關係上，東協一方面確立了“東協主導、大國均衡”的戰略，

⁸ 劉善偉，《借力東盟，佈局亞洲一體化》，中國青年電子版 2009 年 14 期，2009 年 7 月 24 日。

積極發展與東協以外國家的關係，逐步建立起多層次的論壇式協商制度（東協地區論壇），另一方面仍然支援與地區外大國尤其是美國的雙邊安全合作，並將雙邊防務合作視為最有效、最現實的安全模式。東協地區安全戰略可以概括為：通過東協合作增強集體安全保障能力；通過磋商與對話，與地區大國建立互信關係，解除外來威脅；積極宣導東協地區論壇，開展“第二軌道”安全對話，建構地區多邊安全機制；調整軍事戰略，獨立發展軍事力量，積極開展軍事合作。⁹迄今，東協在東亞合作進程中的作用堪稱富有成效，東協在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領導地位得到了地區內外國家的認可和尊重，並尋求在所有地區合作倡議中扮演中心角色。然而，東協方式所秉持的低制度化、避免承諾和義務的做法不僅導致東協內部整合緩慢，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緩了東亞安全秩序建構的進程。綜上所述，中國崛起是引領東亞安全秩序變革的核心力量。隨著中國的全面崛起、日本加緊邁向政治大國的步伐、東協規範性影響的擴大和美國的戰略調整，東亞權力關係進一步趨於平衡。東亞的權力結構決定了東亞秩序的開放性，而美國等外部力量的強大決定了共同利益的彙聚和制度化是東亞安全秩序建構的惟一可行路徑。

隨著東亞合作進程的積極推進，中國與東亞安全秩序建構開始呈現良性互動的特徵。從未來前景看，二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促進，不僅中國崛起是引領東亞安全秩序變革的核心力量，後者也是考驗中國能否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尺規。

（一）東亞安全秩序的前景

儘管東亞安全設計和衝突解決上少有多邊主義的傳統，東亞地區合作依舊保持了低制度化的特徵，但應對安全困境的需要催生了東亞地區安全認同的形成，廣義的合作機制正在發展，有助於促進相互信任的基本框架正在確立。在目前的東亞安全秩序建構中，處理某些冷戰遺留問題仍是應對重點，但積極因素已經在發揮作用，追求合作安全已經成為本地區國家的基本目標。總體而言，冷戰之後的東亞各國沒有根本性的敵友之分，競爭與合作並存成為國家間安全

⁹ 劉長庚，《東盟合作發展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 The Development of ASEAN Cooperation and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湘潭大學，2002年05月01日，ASEAN,State,Problem,Cooperation foundation。

關係的主流，東亞多邊合作進程既維持著地區穩定、促進地區合作、塑造地區規範，也建構著地區認同，從而促使軍事同盟框架和多邊安全對話方塊架並存于東亞，形成二元安全結構。兩種安全框架既是目標和手段，也代表了不同的戰略思路。

展望未來的東亞安全秩序，傳統的零和博弈難以在東亞再現，在多邊合作安全框架之中，平衡中共日益增長的地區影響、平衡美國在東亞的作用將合力催生新的安全制度安排，戰略約束——特別是自我戰略約束——成為中美等大國必須認真思考的議題。總體而言，東亞安全秩序開始從實質上的美日主導向共同主導發展，作為東亞安全秩序建構的重要層面，推進經濟相互依賴、推進六方會談等應對傳統安全困境的制度安排、促進在應對非傳統安全上的制度建設、促進大國之間的戰略互動機制建設都將持續下去，傳統的輪轂體系、新生的共同體趨向並非非此即彼，而是在尋求和平共處之道。

（二）中共東亞安全秩序戰略的基本趨向

中共崛起被逐步承認和接受，與中共在東亞秩序建構中發揮越來越積極、建設性的作用密切相關。在某種意義上，“過去 20 多年中共的所作所為是對現實主義理論的挑戰。”東亞（乃至全世界）對中共崛起、對中共與東亞秩序互動的認識正在發生變化，其基本趨向是，從“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到“中國機遇論”、“中國責任論”，從中共崛起不可避免引發衝突到包容中共在內的東亞秩序可以達成，從反對、抵制中共發揮作用到認可並希望中共發揮更大、更具有建設性意義的作用。¹⁰

東亞是中共崛起的戰略依託地帶，中共必須先積極參與東亞新秩序的建構，才可能具備引導世界秩序演變的條件。目前，中共積極參與到東亞合作進程中，對東亞共同體建設持有開放性的態度，著力促進與東亞各國進一步的經濟合作，穩妥開展政治安全對話與合作，並避免被視為尋求東亞合作的主導權。

¹⁰Downs, Erica Strecker; Philip C. Saunders (1998 年 Winter 月) · Legitimacy and the Limits of Nationalism ·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3 (3): 114-146 · 中國威脅論（此處「中國」皆指中華人民共和國），乃國際關係上一種訴諸對中國採取圍堵（英語：Containment）的說法，始於後冷戰時代各國裁減軍備之際，中國因改革開放後大舉擴充軍備，特別在於海空軍在東海及南海的聯合作戰能力，相關國家產生的憂慮與質疑，此質疑於 1995 年因南海問題及對台灣領海試射飛彈達到高峯，然近年來東南亞國協國家、美日等國的實際作為並非圍堵，而是一些防範及牽制。

在東亞安全秩序的建構上，中共將體現出如下基本戰略趨向：

第一，秉持新安全觀，尋求共同利益，促進合作安全

中共將繼續秉持新安全觀，並尋求共同利益、合作安全與新安全觀的結合，從而積極促進東亞的合作安全。中共宣導的新安全觀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層次的含義：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各國建立互信機制，通過戰略合作機制以爭取共同安全，通過友好協商和平解決爭端；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承認並尊重世界的多樣性，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和民族之間保持和睦相處的關係；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大小國家一律平等，求同存異，通過國際政治民主化的途徑，解決事關世界與地區和平的重大問題。概括起來，可以歸納為“共同利益、共同存在、共同發展、共同安全”。中共新安全觀的實質就是尋求合作安全。合作安全議題廣泛，既包括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也包括政治、經濟、環境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追求合作安全的前提條件是，參與各方擁有避免對抗、維護地區穩定與和平的政治意願。合作安全不僅符合各國的願望和東亞的現實，也符合中共的戰略利益。中共在東亞安全上的實踐，包括加深中共-東協關係、積極參與東協地區論壇活動、支援“10+3”作為東亞合作的主體框架、主持六方會談等均體現了通過合作安全緩解東亞困境、促進東亞安全秩序良性變革的戰略思路。¹¹

第二，構建基於共同利益的東亞戰略框架

當前東亞迄今已經在次地區、地區和超地區層面建立起東協、“10+1”、“10+3”、東協地區論壇、東亞峰會等頗具效用的制度框架，它們均是共同利益彙聚和制度化（或處於制度化進程中）的結果。東亞各國將繼續秉持開放精神促進合作，追求共同獲益的雙贏結果。隨著東亞進入制度建設和尋求認同的時代，共同利益成為地區各國思考問題的基礎和出發點。只有以共同利益為基礎，才能防止或制止大國將其個別利益置於多數國家之上。在一定意義上，東亞秩序的核心發展動力來自本地區面臨的共同利益、共同威脅和挑戰，它基於各國的戰略利益考慮，又超越狹隘的國家利益，並以追求共同利益、應對共同挑戰和威脅為路徑，應確立東亞各國基於共同利益的基本戰略框架，並逐步豐

¹¹ 郭震遠：《中美關係中的臺灣問題：變化與影響》，載《國際問題研究》2007年第2期，第24頁。

富之，以奠定東亞秩序建構的基石。¹²

在以上東亞共同利益的戰略框架中，國家和雙邊層面是該戰略框架的基礎，更多體現了雙邊互惠的含義；地區層面是該戰略框架的重心，東亞共同利益不僅體現在互惠利益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共同威脅和潛在威脅的應對上；全球層面則表明，作為世界三大經濟區之一，東亞國家的戰略視野並不局限于東亞，各國必然將其全球利益納入戰略思考之中。

第三節 區域安全方面

中共崛起必然衝擊既有的國際秩序，而最為敏感的莫過於中共對東亞安全秩序的影響。從地區意義上講，“中國威脅論”濫觴於東亞有其必然性。冷戰結束以降，許多學者對亞洲的未來抱有悲觀心態，認為亞洲必成爭奪的場所，其主要原因在於對中共成為修正主義國家的預測。然而，亞洲儘管紛爭不少，但並未爆發大規模衝突，且其前景趨向光明。大衛·康 (David C. Kang) 指出，“從歷史上看，歷來都是中國的軟弱導致亞洲動盪不安；從歷史的角度看，一個富有和強大的中國是鞏固地區穩定的力量。”¹³另一方面，中共一個世紀的衰弱和混亂，以及期間世界其他國家（尤其是美國）的影響奠定了今日亞洲格局的基礎。中共的壯大自然引起疑慮、猜測和期待。國際社會關注的是，一個更加強大和自信的中共如何對待鄰國，其鄰國對中共在東亞影響的增強做出何種反應。¹⁴

關於中共崛起對東亞安全秩序的影響不乏悲觀認識，但總體而言，越來越多的國家領導人和學者對東亞前景持有樂觀看法。在一定意義上，這是中共崛起進程中的正向變革所導致的。中共崛起是東亞秩序變動的一部分，進而成為東亞秩序變動的主要推動力，成為引領東亞秩序變革的核心要素。中共長期以來不是從地區 (Region) 角度出發處理與亞洲國家的關係，而是在雙邊層次上處理與各相關國家的關係。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以來，中共將國際戰略重點放在促進東亞一體化進程上，立足臨近地區，加強地緣政治經濟的塑造能力。中

12 宋國友，《美國的東亞 FTA 戰略及其對地區秩序的影響》，當代亞太，2007 年第 11 期，129 頁。

13 Jongryn Mo, “What does South Korea Want?”, Policy Review, Apr/ May 2007, p. 50.

14 宋國友：《東亞區域貿易協定的發展與美國霸權的變遷》，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04 年第 7 期，第 61 頁。

共促動的東亞合作機制代表了中共外交的新思路，即在自己利益攸關的地區培育和建立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平等、合作、互利、互助的地區秩序，在建設性的互動過程中消除長期積累起來的隔閡和積怨，探索並逐步確立國家間關係和國際關係的新準則。

無疑，中共崛起對東亞安全秩序的影響，在日本和美國引致了更多討論。鑒於中日之間歷史宿怨、現實衝突和未來競爭的判斷，日本在經濟上加強與中共合作、在安全和戰略上制衡中共的目標短期內不會改變。當然，隨著東亞合作進程的加速進行，中日問題走向緩和、穩定和逐步解決是可能的，也符合東亞所有國家的利益。近年來，美國對中共的戰略體現在如下兩個方面的結合：將中共網入一系列國際組織的多邊戰略，與中共在一系列功能性領域進行綜合性雙邊接觸的戰術。在這個過程中，尤其是隨著非傳統安全重要性的上升，中美安全關係出現了深具建設性的變化。儘管美國對中共能否約束其增強的實力、信守承諾存在疑慮；但越來越多的美國人士支持對華接觸政策。大衛·蘭普頓強調，由於中國日益成為地區和全球經濟發展的引擎，美中保持穩定的戰略關係超越了狹隘的安全利益。以上看法表明，對中共崛起與東亞安全秩序變革的認識正在變得理性和客觀，某些理解頗具啟發意義，但總體而言，它們並未站在中共角度看待中共崛起，對中共變革的正向性缺乏全面的認識，甚至缺乏對中共自身安全困境的基本關注。¹⁵

從結構上講，東亞安全困境俯拾皆是，既有大國如中美、中日、日俄之間的安全困境，也有中等力量國家之間如朝鮮半島南北雙方之間的安全困境；既有大國與小國之間如中國與東協國家之間存在的低烈度的安全困境，也有小國之間如東協成員之間存在的某種程度上的安全困境。東亞各國奉行不同的安全政策，或牽制、或防範、或聯盟，致使東亞眾多的安全之間形成某種連動的複雜關係。東亞地區至今沒有形成為各方廣泛接受和認同的安全制度或體制，缺乏制度約束的眾多行為體之間難以形成相對穩定的安全關係，地區熱點問題始終沒能得到根本解決，熱點升溫甚至失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從進程角度看，東亞安全秩序一直處於變動過程中，並逐步奠定了東亞穩定的基礎。其中，中

¹⁵Fred Bergsten, "Toward a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sia Pacific", Policy Brief in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February 2007.

共從東亞安全秩序的被防範者到積極參與者，中共的角色發生了變化，中共的安全觀念和安全行為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從而為中共與東亞安全秩序的良好互動提供了基本條件，也為東亞安全秩序建設提供了新的動力。

二戰結束之後，東亞地區秩序的建構一直被冷戰的陰影所遮蓋，並為東亞民族主義浪潮所淹沒。美國主導建立的雙邊安全同盟成為東亞安全秩序的主體。當時，東南亞地區與朝鮮半島忙於非殖民化與國家重建，1967年成立的東協因外部牽制和內部聚合力不足難以在東亞秩序建構上發揮作用，20世紀60年代至80年代日本和東亞四小龍的崛起並沒有立即從根本上撼動既有的東亞安全秩序。中共忙於國內革命建設、突破西方的封鎖和應對蘇聯威脅，截至1982年中國國際戰略調整，中共長期關注的是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儘管其後經濟安全的重要性開始明顯上升，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的地位相對下降，中共的安全觀念仍然集中于核心安全領域。彼時，霸權與均勢並存仍是東亞安全秩序的基本特徵。

東亞安全秩序的變動始於冷戰的結束，尤其是為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中共安全思想的創新及其付諸實踐所激發。冷戰結束之後，東亞多邊安全機制開始萌芽，其根本動因是美國從東南亞撤軍。冷戰結束後，隨著兩極對峙局面的結束，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東亞安全形勢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美國也相應地調整自己的戰略，減少了在東亞的軍事存在，甚至在1992年撤出了東南亞。¹⁶東南亞由於美軍的撤出而出現巨大的權力真空，原來被冷戰所掩蓋的矛盾以及歷史上遺留的領海和領土糾紛紛紛浮現，加上該地區國家在經濟發展水準以及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存在的差異，使該地區內部出現了不穩定因素。為填補美國撤退後留下的權力真空，保持本地區的安全穩定，東盟進行了積極探討。1999年3月26日江澤民在聯合國裁軍談判會議上第一次全面闡述了中共的新安全觀，強調新安全觀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中共的新安全觀不僅在隨後成立的上海合作組織中得到積極體現，也逐步引入到中共-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建設中，引申到關乎朝鮮半島穩定的六方會談之中，並在其中尋求和擴大與各國的共同利益。與此同時，中共積極參與東亞一體化的進程，促使東亞進入全面接觸的時代，使東亞政治對話和安全協調取得顯著進展。¹⁷

¹⁶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201.

¹⁷陸建人:《亞太自由貿易區倡議緣何擱淺?》,載《新京報》2006年11月18日;柴瑜:《建立亞太自貿區尚待時

中共認識到亞太地區是強國最密集的地區，中共安全戰略的首要目標是與地區內的主要強國均維持一種至少可以正常運轉的關係，從而使中共不會再次在大國中陷入孤立。中共安全戰略的第二個目標是盡可能維持與地區內國家間的友好關係，以防止一個針對自己、且得到其他大國支援的遏制聯盟形成。¹⁸中共越來越接受這樣一種觀點，即經濟的相互依賴能創造共同利益、有利於防止衝突，最好的戰略就是通過成為地區內國家的市場和投資、技術提供者，使中共逐漸成為地區經濟增長的火車頭。隨著中共的崛起，中共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關係發生深刻轉變，一個緊密型的環經濟帶正在形成。與之並行的是，中共崛起帶來的地區震動表明，中共有必要以東亞地區發展為核心，大力促進東亞一體化，創立有助於地區經濟發展和進一步經濟開放的地區性國際制度，為其他國家搭中共發展之便車提供機會。中共對地區合作的參與是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冷戰結束後，中共與周邊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關係陸續正常化、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構成了這一轉變的歷史背景。中共周邊安全面臨的挑戰和隱患，中共與世界、尤其是與周邊關係的日趨緊密，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則提供了啟動地區合作的契機和動力。¹⁹

東亞主要採用雙邊安全體制和多邊安全體制來維護和確保整個地區的安全。東亞國家有不同的安全追求，美國追求單邊霸權，中共、俄羅斯乃至日本都在或明或暗地追求多極化，其他國家則期望建立多邊安全協調機制，導致存在名目繁多的安全安排，從而構成了霸權、均勢、合作安全等看起來相互衝突的安全選擇交織的局面，東亞安全秩序被視為各種相關安全模式的疊合。隨著中共崛起正向性作用的發揮，東亞安全秩序呈現出與冷戰結束之前截然不同的特徵。雙邊同盟、多邊對話和特殊外交的混合，既沒有出現軍事競爭對抗，也沒有發展成為多邊合作體系，而是處於均勢與共同體秩序之間。在一定意義上，東亞安全正在經歷著美國同盟秩序構想和東亞合作安全構想的博弈。

當前，傳統軍事同盟無法完全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隨著共同利益和共同威脅的擴大，以合作安全為主體建立東亞安全體系開始被視為合理的選擇。東亞總體上體現出從安全困境到安全合作、從傳統安全困境到非傳統安全合作的

日》，載《人民日報》（海外版）2006年11月18日。

18 USTR, "Southeast Asia and Pacific 2006 Major Initiatives". <http://www.ustr.gov>

19 吳心伯：《後冷戰時代的美國亞太安全戰略》，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153頁。

發展路徑，並促使傳統安全走向可管理性。中共的新安全觀與合作安全的理念契合，中共近年來的安全實踐體現了合作安全的戰略價值，並成為東亞安全秩序變革的核心推動力。²⁰

東亞經濟一體化及其溢出效應、中共全面崛起、美國的戰略調整、日本加緊邁向政治大國的步伐、東協的規範性效應等是東亞安全秩序變革的主要驅動力。其中，中共崛起是安全秩序變革的核心驅動力，也是其他要素發揮戰略效應的牽動力。

在對外安全關係上，東協一方面確立了“東協主導、大國均衡”的戰略，積極發展與東協以外國家的關係，逐步建立起多層次的論壇式協商制度（東協地區論壇），另一方面仍然支援與地區外大國尤其是美國的雙邊安全合作，並將雙邊防務合作視為最有效、最現實的安全模式。東協地區安全戰略可以概括為：通過東協合作增強集體安全保障能力；通過磋商與對話，與地區大國建立互信關係，解除外來威脅；積極宣導東協地區論壇，開展“第二軌道”安全對話，建構地區多邊安全機制²¹；調整軍事戰略，獨立發展軍事力量，積極開展軍事合作。亞洲金融危機表明，東協自身不能解決危機，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制度不可倚靠，東亞國家之間的緊密合作成為惟一可行的選擇。自此，東協一直是東亞地區主義的主要組織者，“東協方式”也逐漸擴展到東亞一體化進程中。尤其是，東協各國對中共採取接觸戰略，尋求將中共納入地區制度和地區對話；中共則支援東協提出的東亞峰會模式和東協在共同體建設中的領導地位，東協與中國關係的健康發展是東協在東亞秩序建構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基本條件。迄今，東協在東亞合作進程中的作用堪稱富有成效，東協在經濟一體化進程中的領導地位得到了地區內外國家的認可和尊重，並尋求在所有地區合作倡議中扮演中心角色。然而，東協方式所秉持的低制度化、避免承諾和義務的做法不僅導致東協內部整合緩慢，也在一定程度上放緩了東亞安全秩序建構的進程。

綜上所述，中共崛起是引領東亞安全秩序變革的核心力量。隨著中共的全面崛起、日本加緊邁向政治大國的步伐、東協規範性影響的擴大和美國的戰略調整，東亞權力關係進一步趨於平衡。東亞的權力結構決定了東亞秩序的開放性，而美國等外部力量的強大決定了共同利益的彙聚和制度化是東亞安全秩序

20 Jeffrey Garten, "Bush Behind the Smiles", *New2 sweek*, Oct127, 2003, p. 32.

21 陳建榮，《“第二軌道外交 SOUTHEAST ASIAN STUDIES”》，暨南大學東南亞研究所，2004年。

建構的惟一可行路徑。²²隨著東亞合作進程的積極推進，中共與東亞安全秩序建構開始呈現良性互動的特徵。從未來前景看，二者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促進，不僅中共崛起是引領東亞安全秩序變革的核心力量，後者也是考驗中共能否實現和平崛起的重要參據。

儘管東亞安全設計和衝突解決上少有多邊主義的傳統，東亞地區合作依舊保持了低制度化的特徵，但應對安全困境的需要催生了東亞地區安全認同的形成，廣義的合作機制正在發展，有助於促進相互信任的基本框架正在確立。在目前的東亞安全秩序建構中，處理某些冷戰遺留問題仍是應對重點，但積極因素已經在發揮作用，追求合作安全已經成為本地區國家的基本目標。總體而言，冷戰之後的東亞各國沒有根本性的敵友之分，競爭與合作並存成為國家間安全關係的主流，東亞多邊合作進程既維持著地區穩定、促進地區合作、塑造地區規範，也建構著地區認同，從而促使軍事同盟框架和多邊安全對話方塊架並存於東亞，形成二元安全結構。兩種安全框架既是目標和手段，也代表了不同的戰略思路。

展望未來的東亞安全秩序，傳統的零和博弈難以在東亞再現，在多邊合作安全框架之中，平衡中共日益增長的地區影響、平衡美國在東亞的作用將合力催生新的安全制度安排，戰略約束——特別是自我戰略約束——成為中美等大國必須認真思考的議題。²³總體而言，東亞安全秩序開始從實質上的美日主導向共同主導發展，作為東亞安全秩序建構的重要層面，推進經濟相互依賴、推進六方會談等應對傳統安全困境的制度安排、促進在應對非傳統安全上的制度建設、促進大國之間的戰略互動機制建設都將持續下去，傳統的輪轂體系、新生的共同體趨向並非非此即彼，而是在尋求和平共處之道。

中共崛起被逐步承認和接受，與中共在東亞秩序建構中發揮越來越積極、建設性的作用密切相關。在某種意義上，“過去 20 多年中共的所作所為是對現實主義理論的挑戰。”東亞（乃至全世界）對中共崛起、對中共與東亞秩序互動的認識正在發生變化，其基本趨向是，從“中國崩潰論”、“中國威脅論”到“中國機遇論”、“中國責任論”，從中共崛起不可避免引發衝突到包容中

²²Hiro Katsumata Reconstruction of diplomatic norms in Southeast Asia:The case for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ASEAN Way",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003

²³喻常森 "第二軌道"外交與亞太地區安全合作 [期刊論文]-東南亞研究 2003

共在內的東亞秩序可以達成，從反對、抵制中共發揮作用到認可並希望中共發揮更大、更具有建設性意義的作用。²⁴

東亞是中共崛起的戰略依託地帶，中共必須先積極參與東亞新秩序的建構，才可能具備引導世界秩序演變的條件。目前，中共積極參與到東亞合作進程中，對東亞共同體建設持有開放性的態度，著力促進與東亞各國進一步的經濟合作，穩妥開展政治安全對話與合作，並避免被視為尋求東亞合作的主導權。在東亞安全秩序的建構上，中共將體現出如下基本戰略趨向：

第一，秉持新安全觀，尋求共同利益，促進合作安全

中共將繼續秉持新安全觀，並尋求共同利益、合作安全與新安全觀的結合，從而積極促進東亞的合作安全。中共宣導的新安全觀主要包括以下幾個層次的含義：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各國建立互信機制，通過戰略合作機制以爭取共同安全，通過友好協商和平解決爭端；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承認並尊重世界的多樣性，不同文明不同文化背景的國家和民族之間保持和睦相處的關係；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大小國家一律平等，求同存異，通過國際政治民主化的途徑，解決事關世界與地區和平的重大問題。概括起來，可以歸納為“共同利益、共同存在、共同發展、共同安全”。中共新安全觀的實質就是尋求合作安全。合作安全議題廣泛，既包括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也包括政治、經濟、環境等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合作。追求合作安全的前提條件是，參與各方擁有避免對抗、維護地區穩定與和平的政治意願。合作安全不僅符合各國的願望和東亞的現實，也符合中共的戰略利益。中共在東亞安全上的實踐，包括加深中國-東協關係、積極參與東協地區論壇活動、支援“10+3”作為東亞合作的主體框架、主持六方會談等均體現了通過合作安全緩解東亞困境、促進東亞安全秩序良性變革的戰略思路。

第二，構建基於共同利益的東亞戰略框架

當前東亞迄今已經在次地區、地區和超地區層面建立起東盟、“10+1”、“10+3”、東協地區論壇、東亞峰會等頗具效用的制度框架，它們均是共同利益彙聚和制度化（或處於制度化進程中）的結果。東亞各國將繼續秉持開放精神促進合作，追求共同獲益的雙贏結果。隨著東亞進入制度建設和尋求認同的

²⁴Paul Evans,Possibilities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Track 2 and Track 1, Luncheon Address,Multilateralism in Asia Pacific:What Role for Track Two? Pacific Symposium 2001,Organized by th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The US Pacific Co

時代，共同利益成為地區各國思考問題的基礎和出發點。只有以共同利益為基礎，才能防止或制止大國將其個別利益置於多數國家之上。在一定意義上，東亞秩序的核心發展動力來自本地區面臨的共同利益、共同威脅和挑戰，它基於各國的戰略利益考慮，又超越狹隘的國家利益，並以追求共同利益、應對共同挑戰和威脅為路徑。我們認為，應確立東亞各國基於共同利益的基本戰略框架，並逐步豐富之，以奠定東亞秩序建構的基石。²⁵

在以上東亞共同利益的戰略框架中，國家和雙邊層面是該戰略框架的基礎，更多體現了雙邊互惠的含義；地區層面是該戰略框架的重心，東亞共同利益不僅體現在互惠利益上，更重要的是體現在共同威脅和潛在威脅的應對上；全球層面則表明，作為世界三大經濟區之一，東亞國家的戰略視野並不局限於東亞，各國必然將其全球利益納入戰略思考之中。²⁶以上東亞共同利益的戰略框架是一種理想模式（Ideal Type），需要隨著地區關係的深化而有所調整和拓展，其總體目標就是建立東亞利益共同體。如何通過共同利益彙聚及其制度化建構一個穩定而富有建設性的地區秩序，實現地區安全秩序的良性變革，是擺在東亞諸國面前的重大戰略議題。中共的建設性崛起、東亞各國的戰略優化為此提供了基礎條件，各國合作確立了未來合作的總體目標和基本框架。展望未來，中共將繼續作為引領東亞安全秩序變革的力量，東亞安全秩序建構將進一步穩定對中共崛起的預期，二者互動將成為影響東亞秩序建構的核心要素。

25 王峰“東盟方式”在亞太地區的擴展——以東盟地區論壇為個案；2006年。

26 劉勇為“第二軌道”外交屬性與影響辨析 [期刊論文]-蘭州學刊 2008(12)

第參章 影響中共東亞安全政策的因素分析

冷戰以後，亞太地區在世界政治中的戰略地位越來越重要，各大國的戰略重點紛紛向亞太地區位移，亞太地區的戰略態勢產生了一系列新的變化，呈現了一定程度的複雜性。在此情況下，對亞太地區戰略態勢有一個清醒的認識，正確掌握亞太地區戰略態勢的變化趨勢就成為制定正確的國家安全戰略的又一重要保證。

儘管亞太地區的安全熱點很多，但亞太地區仍沒有一個完備的安全機制。亞太地區的集體安全機制始終建立不起來，現有的、像東盟地區論壇那樣的的安全機制由於對大國的約束力不大而對本地區安全的影響力很小。並且由於美國試圖通過雙邊軍事同盟和其他雙邊軍事條約來保證自己在亞太地區霸權的行為，更為多邊安全機制的建立增添了極大的障礙。由於沒有一個權威的地區安全機制，亞太地區的衝突就很難在地區範圍內妥善解決。¹

第一節 國際上的因素

冷戰結束以來，亞太地區的國際關係發生著深刻的歷史性變革。四重安全結構相互交錯，推動著亞太地區地緣政治的演變。這四重結構首先是美國的軸輻式軍事同盟體系，制約著新的地區安全合作機制的形成；其次是亞洲各種地區合作機制，特別是形成中的東盟式的軸輻合作機制，推動著亞太地緣政治與經濟的演變；再者是亞洲大國，特別是中共和印度，以各自的方式迅速崛起，影響著亞洲政治、經濟與安全的傳統力量結構；最突出的則是非傳統安全問題，嚴重威脅著地區和平、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

美國及其盟國為了應對演變中的亞太地緣戰略新格局，致力於建立一種後冷戰時代的亞太安全體系，旨在確保美國對亞洲事務的主導權，牽制、防範中共成為主導亞洲事務的力量。為此，對中共採取所謂的對沖戰略，積極拉攏中國周邊大國，採取“離岸平衡”戰略。東盟總體上推行大國平衡戰略，在大國之間尋求平衡接觸的政策，而在經濟貿易領域致力於擴大與中共等亞洲國家的

¹吳英明、許文英，〈非政府組織(NGOs)在人類安全中的角色—多軌外交與全球民主安全〉，《人類安全與21世紀的兩岸關係》，臺灣綜合研究院戰略與國際研究所主辦，2001年9月14日，頁96。

合作。中共為拓展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空間，應在和諧世界理論的指引下，充實和豐富新安全觀與和諧亞太的理念，在亞太地區推進中國的合作模式，同時推進亞洲合作夥伴關係和跨太平洋合作夥伴關係，著重推進和加強次地區合作進程，宣示中國的和平發展與和諧外交理念和政策，致力於樹立負責任的大國形象。

一、美國亞太安全架構的理念

冷戰結束以來，美國一直努力在亞太地區建立新的安全體系，以應對急劇變化的亞洲經濟、政治和安全形勢。從 2005 年布希第二任期開始，美國決策層開始關注東亞的安全機制構建。從 2004 年的軍力調整報告，到 2006 年的四年防務評估報告和新的國家安全戰略報告，美國已將建立民主聯盟和防範新興大國提到與反恐和防擴散同樣重要的地位。中共被正式界定為“處於戰略十字路口”的新興大國，被認為最有可能與美國發生軍事衝突。於是，美國啟動接觸與防範相結合的對沖戰略，旨在將中共納入其主導的現行國際和地區秩序，影響中國未來發展的方向，並爭取把中共塑造成“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²

2006 年 9 月，由兩黨主要智囊參加的普林斯頓國家安全項目報告發表。該報告把在全球推進民主化提升到 21 世紀國家安全戰略的高度，把世界上的國家劃分為“民主”和“非民主”兩大類，主張建立由盟國和友邦參加的“民主同盟”，必要時取代聯合國，承擔起維護世界和地區和平、促進全球民主化進程的使命。該報告把中共列為“主要威脅和挑戰”之一，建議美國政府繼續鞏固美日同盟，保持強大的軍事實力，對中共加以威懾。該報告並不主張對中國採取冷戰式的“遏制”，建議勸導中共融入現行國際體系，使其成為承擔國際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報告明確建議，構建以美國為主導的跨太平洋安全機制，防止中國主導的泛亞洲秩序的形成；把中共納入以美日同盟為基礎的亞太安全機制；加強與印度的戰略夥伴關係，旨在將印度塑造成能夠制衡中國的戰略夥伴；重視其他亞洲國家的經濟發展對平衡中國崛起的戰略作用。

2007 年 2 月，美國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佈第二個阿米蒂奇報告，標題為《美日同盟：讓亞洲正確邁向 2020》。2000 年，阿米蒂奇曾發表《美日同

²鄭端權，〈新型安全觀與兩岸關係〉，《社會建構論與兩岸關係：理論與實踐的對話》，當代思潮系列座談，政大國關中心主辦，2001 年 11 月 21 日；參見 http://www.future-china.org/csipf/press/paper/ppr_mnu.htm

盟：邁向成熟的夥伴關係》的研究報告，極力主張強化美日同盟抗衡中國的崛起。新報告明確指出，美日同盟面臨的最重要的可變因素是中國和印度的崛起，美國應該防止中共影響力擴大成為“亞太安全的威脅”。新報告指出，在亞洲戰略博弈的棋盤上，由於中國的未來發展具有不確定性，在強調美日同盟是美國亞洲戰略的核心的同時，美日應提升與印度的戰略關係，利用印度牽制中國。新報告主張在強化美日同盟、拉攏印度制衡中國的同時，增加與中國的接觸與合作，爭取把中國塑造成美國治下的“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

2007年4月，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發佈題為《美中關係：肯定的議程及負責任的道路》的對華報告。該報告全面分析和詮釋了中共崛起與美中關係，強調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之一，將對21世紀的國際和地區安全格局產生決定性影響。

通過對上述報告的歸納比較可見，儘管觀察和分析的角度不盡相同，但都將中共的崛起視為影響美國在亞洲未來地位的最主要因素之一，都主張在與中共進行接觸與合作的同時，引導中共向有利於美國的方向發展，制約中共未來發展中的不利因素，使中共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同時，上述報告均主張繼續加強美日同盟，拉攏印度，防範中共。³

2007年在新加坡召開的香格里拉對話會議上，美國國防部長蓋茨發表演講時表示，美國是“駐留亞洲的大國”。無論誰當選下一任美國總統，新政府未來的安全政策依然會確保美國繼續致力於參與亞洲事務，美國依然會在亞洲地區擁有牢固與持久的利益。

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奧巴馬將重建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當作其外交戰略的核心。他指出，21世紀的威脅來自與極端分子結盟的無賴國家，也來自向美國和國際自由民主的基礎挑戰的新興大國；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要應對原教旨主義對自由的挑戰以及像中共、印度、俄羅斯這樣的新興大國的崛起。

奧巴馬強調，在亞洲，首先要維持同盟國的強有力的關係，要加深與像印度這樣的關鍵民主國家的夥伴關係，同時也提出加深與新興大國的關係。關於印度，他指出，作為世界上兩個偉大的多民族的民主國家，美國和印度是天然戰略盟友，將協力迎戰21世紀的共同威脅。

³「共同安全」最早由「歐洲安全暨合作會議」與「帕姆委員會」(Olof Palme Commission)所提出。有關「共同安全」的內容，請參閱Andrew Butfoy, *Common Security and Strategic Reform: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7)

奧巴馬在一份有關中共立場的聲明中表示，中共的崛起將是未來美國外交政策相當重要的挑戰。他不會把中共妖魔化，但要確保中共和平崛起。他指出，發展中美關係的最好方法，是在國際體系中與中共開展協作，同時對中共軍事現代化保持警惕。民主黨 2008 年競選綱領堅持一個中國的政策和臺灣關係法，堅持和平解決台海問題，並聲稱要關注西藏的人權。布希政府以及未來的美國總統以美國的價值觀為道義基礎，以軍事實力為依託，堅持美國在全球和地區的領導地位，致力於構建“有利於自由的均勢”的世界和地區力量結構，建立美國治下的“新美利堅帝國”體系，在亞太地區也不例外。今天和未來的美國政府雖然強調與中共合作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共同挑戰，但是也都把中共看作是美國在亞太地區領導地位的潛在威脅，並據此處處防範和牽制中共的發展。試圖以兩面下注的對沖戰略逐步把中共納入美國主導的亞太安全聯盟體系。⁴

二、美國尋求建立的亞太安全架構

在美國，冷戰的結束被視為民主對獨裁的勝利。冷戰結束以來，“民主和平論”在美國國際關係理論中仍佔據重要地位，因此在構建新的國際體系方面，民主共同體的設想應運而生。所謂“民主同盟”，就是美國與盟國和友邦合作，建立自由民主國家之間安全合作的新機構，必要時替代聯合國，採取集體行動，包括使用武力。在亞洲地區，可以追溯到 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醞釀的“亞洲版北約”的影子。

目前，美國在亞太地區積極推進的聯盟體系著眼於三個方面：一是包括美國在內的跨太平洋體系；二是把太平洋和印度洋聯繫起來，即海洋型的聯盟體系；三是聚焦從中亞到東北亞的所謂“不穩定弧形”地帶。可以歸納為以下三個方面：

其一是美國積極推進由美國主導的對話合作機制，使其成為未來亞洲太平洋聯盟體系的基礎。美國積極策劃主導在新加坡召開的年度香格里拉國防部長會議，從對話機制逐步向機制化發展。2008 年度香格里拉對話會議有 27 國的國

⁴合作安全的理論基礎有二：新安全觀與多邊主義。所謂「多邊主義」，是指與兩國或兩國以上的國家共同協作，以達成在外交、經貿、軍事等方面的政策目標，強調透過多邊手段來解決國際間各種問題，故秉持此種理念而有多邊安全對話機制和多邊經濟合作機制的產生。前者如東協區域論壇，而後者如亞太經合會。「合作安全」由加拿大所倡議的「北太平洋安全對話」(North Pacific Cooperative Security Dialogue)而得名；可參見Radmila Nakarada and Jan Oberg (eds.), *Surviving Together* (Hampshire: Dartmouth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39-41; David B. Dewitt, "Concept of Security for the Asia-Pacific Region," in Bunn Nagara and K.S. Balakrishnan (eds.), *The Making of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the Asia-Pacific* (Kuala Lumpur: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4), 24.

防部長或高級防務官員參加。會議被公開稱為“亞洲安全會議”。其意圖顯然是對沖東盟地區論壇及其安全政策會議。美國積極推進從目前的雙邊軍事同盟擴展和延伸為三邊、四邊聯盟體系——從美日、美澳雙邊“2+2”會議發展到美日澳三邊“2+2”對話會議，再從2004年推出的美日澳印海嘯救災“四國核心集團”到2007年4月東協地區論壇會議期間的四國高官協商會議。與此同時，美國與印度和日本與印度的關係積極向全球戰略夥伴關係發展，使之成為美國主導的亞洲聯盟體系的核心，即所謂的基於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的“民主同盟”的核心。

其二是對美國參加但不能主導的跨太平洋合作機制，則加以利用，企圖主導其對話與合作的議題，為己所用，使之成為美國主導的安全機制的補充，如東協主導下的東盟地區論壇。美國努力啟動和加強亞太經合組織的功能，企圖以之為紐帶打造和強化美亞體系，從而削弱非美的亞洲體系。

其三是對美國既不能主導也不能參加的亞洲區域組織，則採取打壓和分化的政策。如“10+3”合作機制、上海合作組織和中俄印戰略對話等。值得注意的是，隨著東盟逐步推進一體化，美國並不希望看到在東南亞出現一個一體化的國家聯盟，這將不可避免地對美國在該地區的主導地位形成挑戰。

冷戰結束以來，隨著東協的建立，東協通過建立三個共同體正在強化一體化進程，並在外交和安全領域積極推進以其為主導的各種合作機制。比如，東協地區論壇、東亞峰會以及“10+3”和“10+1”合作機制，都已形成了東協自己的“軸輻”戰略。在這些合作機制中，東協是主導或領導力量，而東協以外的國家為對話夥伴。⁵

在安全理念方面，東協宣導綜合安全和合作安全，主張在多邊框架下通過對話增加信任，促進合作，實現共同安全。在構建東協主導的地區安全架構方面，東協不以意識形態畫線。東協原計劃以東協的名義加入亞太經合組織，但是美國沒有同意，至今仍有部分東協成員國不是亞太經合組織成員。而在籌建東亞峰會過程中，東協提出了加入的三個條件——東協的對話夥伴，與東協有實質性的關係，簽署《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美國符合前兩個條件，但布希政

⁵張亞中、孫國祥，〈亞太綜合安全：台灣安身立命之所基〉，《亞太綜合安全年報2001-2002》（台北：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2002年6月），頁3。

府對《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含有不干涉成員國內政的條款持保留態度，至今未能加入。⁶

2008年香格里拉對話期間，在新加坡總理和國防部長的演講中，都將東協地區論壇、香格里拉對話和東亞峰會歸類為泛亞洲合作機制，將東協、南協和上海合作組織歸類為次地區合作組織，而將六方會談、海上搜救、麻六甲海峽巡邏等視為功能性的對話合作機制。冷戰結束以後，各國依據自己對國際形勢演變的認識，先後提出了新的安全理論和安全概念。比較流行的是綜合安全和合作安全。前者強調安全的內容超越傳統意義上的安全概念，通常包括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後者強調各國在安全領域加強合作的必要性。這兩種安全概念緊密聯繫。前者是安全的內涵，後者是實現安全的手段。隨著國際形勢的發展，非傳統安全的概念不斷擴延，在有些情況下，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叉且界限模糊。⁷

非傳統安全主要涉及社會經濟和生態環境領域內的安全威脅，包括經濟安全、金融安全、資源安全、水安全、糧食安全、生態環境安全、資訊安全、傳染疾病蔓延、跨國有組織犯罪、輕武器走私、販毒、非法移民、海盜、洗錢以及重大的自然災害等。隨著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的迅速發展，非傳統安全嚴重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並且威脅人類的生存環境和身體健康。冷戰結束以來，亞洲地區相繼遭遇金融危機、“非典”和禽流感等流行病以及海嘯、洪水、地震和熱帶風暴等自然災害。

人們把恐怖主義和武器擴散歸於非傳統安全的範圍，國際對此也普遍認同。九一一事件是恐怖主義襲擊，屬於非軍事手段，但是襲擊的目標是美國政治、軍事和經濟的中樞，直接威脅到國家安全。襲擊的執行者是非政府組織，即行為本身不是國家行為。武器擴散主要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及其運載工具的擴散，包括製造此類武器的材料和技術的轉讓、走私和偷竊。這裏涉及政府行為和非政府行為。從事擴散的行為本身是非軍事的，但是其後果卻顯然是軍事威脅，是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因此，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擴散又具有傳統

6 閻學通，《中國與亞太安全——冷戰後亞太安全的安全戰略走向》（北京：時事，1999年），頁23。

7 楚樹龍、彭春艷，〈冷戰後國際安全理論的發展〉，《現代國際關係》，1999年4期（1999年12月），頁13；薩本望，〈我國安全觀的變化及新的普遍安全觀的主要特點〉，《和平與發展》，2000年1期（2000年8月），頁5-9。

安全的特性。

在亞太地區，需要界定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但更要研究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相互交叉的威脅，同時也要研究傳統安全威脅和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轉化及其轉化的條件。根據亞太地區各種非傳統安全威脅的現象以及人們對這些現象的理解，非傳統安全威脅有以下主要特點：

其一是非傳統安全威脅具有明顯的跨國特徵。不僅是某個國家存在這種威脅，而且這種威脅也擴展到其他國家乃至全球；不僅是對某個國家構成安全威脅，而且對別國的國家安全也不同程度地構成危害。例如，生態環境惡化、非法移民、販毒、洗錢以及武器走私等，其跨國性質非常明顯。

其二是非傳統安全威脅一般不是來自某個主權國家，而是來自非國家行為體，如個人、組織或集團等。但是，這也不是絕對的。比如，印尼發生的森林大火引發的濃煙嚴重影響到周邊國家，這是非政府行為。但某國的工業活動所引發的溫室效應卻涉及政府政策。這兩種行為均會造成生態環境的惡化。

其三是非傳統安全與傳統安全之間沒有絕對的界限。例如，恐怖主義活動一般界定為非傳統安全威脅。主要理由是，行為主體是非政府的，行為目的不是推翻政權和佔領領土，而是讓社會瞭解他們的存在並達到震懾目的。但是，所有的恐怖主義活動均有其政治背景。許多恐怖主義組織同分離主義活動有密切聯繫。例如，斯里蘭卡的泰米爾猛虎組織從事分裂活動，就是以建立泰米爾國為其政治綱領。由非傳統安全威脅轉化成傳統安全威脅，在恐怖主義和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問題上可能是最典型的案例。美國不僅把恐怖主義組織作為打擊的物件，還將其認定的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作為打擊對象，美國解決恐怖主義的手段是戰爭和先發制人的軍事打擊。隨著恐怖主義的不斷升級和擴大，威脅到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穩定和發展，反恐便會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相關政府就會動用武裝力量，採取軍事手段向恐怖主義組織開戰。例如，上海合作組織進行的反恐聯合軍事演習，就體現了這種發展趨勢。⁸

三、中共的亞太安全合作戰略框架

中共為拓展在亞太地區的戰略空間，應在和諧世界理論的指引下，充實和

⁸〈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2002年7月31日；全文參閱中共外交部網站www.fmrc.gov.cn。

豐富新安全觀與和諧亞太的理念，在亞太地區推進中共的安全合作模式或“反對沖戰略”。中共也應積極參加跨太平洋合作機制，宣示中共的政策主張，展現建設性的外交形象，保持與美國的接觸和互動。⁹我們清楚地看到，美國的亞洲政策是雙邊和多邊並用，打壓非美機制。在亞洲安全領域，美國注重多邊關係，如香格里拉防務對話、防擴散安全倡議、多國軍演、地區海上安全倡議以及千艦計畫等。在經濟貿易領域，美國注重雙邊關係，如美新自貿區、美韓自貿區，目前正在推進美日、美泰和美菲自貿區的談判。而對非美的亞洲合作機制則採取打壓的政策。¹⁰

對於中美學界和智庫提出的“中美共主”和“三國(中美日)共治”理念，從好的方面理解，是脫離亞太安全形勢的一相情願；從壞的方面理解，損害了中國在亞洲推進多邊合作的和諧外交努力，疏離了中共與亞洲鄰國的關係，不利於中共建立“和諧亞太理念”指導下的安全合作架構。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至少應當有三個層次，即主權國家層次，地區（或次地區）層次，以及全球層次。要善於協調國家、地區組織和國際組織三者的關係。應對和消除非傳統安全威脅的政策和措施應是綜合的和多重的，需要考慮三條原則：

首先，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主權性和自主性。國家是非傳統安全的主體，主權國家在解決非傳統安全問題上擁有自主決定權。儘管非傳統安全威脅具有跨國性，但是應對一國內部的這種威脅應是其主權範圍內的事情，要按照國家安全利益制定相應的政策措施。別國善意的意見和建議可以有選擇地採納，但是有損于國家安全利益的外部壓力和威脅必須抵制。在環境問題和打擊各種犯罪時也同樣涉及此類問題。中共與東協簽訂的關於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宣言明確指出，雙方“確認在遵守《聯合國憲章》、《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體現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其他公認的國際法準則的基礎上開展合作，並尊重各國的法律制度”。

9「安全必須是各國的普遍安全。國家無論大小、貧富、強弱，都享受平等的安全權利。如果廣大發展中國家得不到安全，整個世界也就不可能安寧。」引自江澤民，《推動裁軍進程維護國際安全——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9年3月27日，版1。

10鄧小平1988年12月21日在會見印度總理拉吉夫·甘地時說：世界上現在有兩件事情要同時做，一是建立國際政治新秩序，一是建立國際經濟新秩序。我們應當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國際關係的準則；中國在國際問題上還是要有所作為。做什麼？我要積極推動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我們誰也不怕，但誰也不得罪，按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辦事，在原則立場上把握住。引自鄧小平，《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1993年），頁282。

其次，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協調性和合作性。非傳統安全威脅具有跨國性。許多犯罪集團具有地區網路和國際背景。為了徹底打擊此類犯罪，必須加強地區和國際合作，將威脅減少到最低限度。中共和亞太各國在應對非傳統安全問題方面存在廣泛的共同利益，因此非傳統安全問題需要加強地區和國際合作。中國同其他國家進行的聯合軍事演習，也反映了在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國際和地區合作。例如，2007年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內舉行了反恐聯合軍事演習，以及近年中國同巴基斯坦和印度舉行的海上搜救聯合軍事演習。

再次，應對非傳統安全威脅的綜合性和多重性。非傳統安全威脅涉及政治、經濟、社會、生態環境和公共衛生等各個方面，其形成原因是多重的，其中包含了傳統安全因素和非傳統安全因素。如伊朗和朝鮮的“核問題”，傳統安全因素和非傳統安全因素交織在一起，使用單一手段難以真正解決。再如毒品問題，不但要將販毒的集團和個人繩之以法，還要教育癮君子，更要摧毀毒品的生產基地。¹¹

以合作的方式創建共同安全的國際和地區環境，非傳統安全領域的共同利益便能凸顯。社會安定是國家穩定的基石，國家穩定是國際與地區合作的基礎，人的安全則是傳統安全和非傳統安全的核心。在應對非傳統安全領域問題過程中，在國內需要對國家安全、社會安全和人的安全的統籌兼顧，推進各個部門的協調與合作，並在此基礎上開展平等互利的地區和國際合作。

第二節 國內的因素

基本上，中共當前的亞太政經政策可以發現幾個外交主軸和策略，在此可以歸納出幾項：一是展開有好合作的務實外交，積極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和提高影響力；二是以務實建設性的政經友善策略反制美國的圍堵政策；三是以經貿合作來拓展軍事外交關係；四是從單邊主義邁向多邊主義外交策略；五是堅持反霸主義的外交原則。¹²

11 〈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2002年7月31日；全文參閱中共外交部網站www.fmrc.gov.cn。

12 〈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文匯報》，2000年10月17日，版12。

一、展開友好合作的務實外交

中共亟欲建構多元的國際戰略格局，係源於中共一九九二年的「十四大」的獨立自主與和平之外交政策，一直延續到一九九七年的「十五大」，甚至到二〇〇二年「十六大」第四代領導人的改組，仍延續著其所謂的「和平友好」和「互利共榮」的外交策略，這最符合中共當前的外交利益。中共外交政策的改變主要源於蘇聯帝國的瓦解，世界政經秩序開始走向後冷戰時期，基於國家利益的考量，一方面積極參與國際和亞太事務，加強與亞太國家的關係，以及反對霸權主義，另一方面不再嚴守共產主義的意識型態，而改採務實考量的全方位外交策略，除建立友好外交關係，也促進經貿發展的利益。特別是中共與俄羅斯外交關係的改善，雙邊高層領導的互訪頻繁，也保證雙邊對於華盛頓的一致立場，一方面既可增強中俄關係紐帶，另一方面也讓中共可免於北方的俄羅斯軍事威脅。

此外，在東北亞地區中共努力於維持中、俄、和北韓之聯合關係，來抗衡於美、日、和南韓聯合的軍事外交均勢，並積極向南亞、中亞、和東南亞地區加強友好合作，在南亞區域中共與巴基斯坦之策略聯盟也有效地抗衡美國與印度的外交合作，亦構成區域的軍事平衡關係。在中亞地區，中共更透過上海合作會議的召開，緊密與中亞國家建立更具有建設性的規範關係，將美國勢力排除在外。在東南亞區域，中共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區建構，便是一個具體關係改善的例子，拉近中共與東南亞的政經關係。¹³

二、亞太政策用來反制美國圍堵政策

中共全方位的亞太外交策略不但運用大國外交手段，也運用拉攏聯合伎倆，一來反制美國主導的「一超多強」格局，二來反制美國所主導的亞太圍堵策略，建構中共在亞太地區的霸權地位。如上所言，中國隨著經濟的高度成長，也開始轉變其區域的多元發展策略，在東北亞地區仍一手運用軍事外交手段，一手創造經貿利益；一方面吸引南韓與日本資金的大量流入，一方面又與北韓建立更密切的軍事外交關係，以經貿利益拉住日韓，以北韓議題來提高對美國的談

¹³ 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2002年7月31日；全文參閱中共外交部網站www.fmrc.gov.cn。

判籌碼，進而制衡南韓與日本的掣肘，以及突破美國的圍堵政策。¹⁴此外，中共一方面以兩岸經貿關係的熱絡拉住台灣經濟，又試圖促進三通來加速兩岸經濟整合，另一方面又努力防範美國對台的大量武器銷售。對於中亞與中東的立場，中共也強力反對美國強硬的外交手段，不僅反對美國對伊拉克動武，也反對美國插手南亞和中亞的政經事務。中共之所以積極拉攏中亞、南亞和東亞國家，不只是為了確保中國在亞洲地區的整個政經利益，也是突破美國圍堵策略防線的重要對策。

三、以經貿合作拓展軍事外交

中共的亞太策略從「政經分離」到「政經一體」的全方位策略，更加落實中共與鄰國的外交關係。在以往中共對亞太發展策略採取了政經分離的兩手政策，一方面提昇與亞太國家經貿關係，加強經濟合作與市場之開放，特別是吸引來自美、日、與四小龍之外來投資，以經貿投資拉近雙邊關係，何況順應後冷戰時期以「經濟發展」為主軸的潮流，亦可改變中共在國際間的友好形象，不但可以提高中共經濟實力，進而強化其區域政治與軍事影響力，也可以降低鄰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疑慮。¹⁵值得觀察的是當中共對外友好關係建立和經貿高度成長之際，也加速其被整合到市場經濟的資本主義體系中。此外，爭取到二〇〇八年的奧運和二〇一〇年的上海世界博覽會主辦權，也是中共走向世界和區域的具體作法，藉以宣示中國是世界的成員之一，不具有安全威脅。這種現象對這些中共週邊的亞太國家而言，無不期待藉此開拓與中國的經貿交流，藉以獲得更大的中共經貿利益，也積極加強與中共的軍事外交合作，以確保國家安全。也期待中共更走向市場經濟的改革開放後，樂見中共內部政治的和平演變的發生。¹⁶

四、從單邊主義邁向多邊主義外交策略

中共在邁向新世紀後，開始從單邊主義轉向多邊主義的外交發展策略，積

¹⁴江澤民，〈推動裁軍進程維護國際安全——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9年3月27日，版1。

¹⁵張聖岱，〈睦鄰安鄰富鄰：中共新外交思維〉，《聯合報》，2003年10月8日，版A13。

¹⁶張雅君，〈十六大後的中共外交：相互依賴深化下的利益、挑戰與政策取向〉，《中國大陸研究》，46卷2期（民國92年3、4月），頁20。

極推動亞太區域的安全對話機制，一個對話而非對抗的地區安全框架，透過多邊主義的運作，使其成為亞太安全的重要保障。例如中共主導的上海合作組織、東協區域論壇（ARF）、和博鰲亞洲論壇（Boao Asian Forum）。中共多邊主義的外交策略又以所謂的新安全觀為主要考量，其中上海合作組織可以說是中共新安全觀的多邊主義外交的重要實踐。所謂「新安全觀」便是重視互信、互利、平等、和協作，來尋求共同安全。中共認為新安全觀的合作模式具有論壇性質的多邊安全對話，旨在增進信任的雙邊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學術性質的非官方安全對話。從一九九六年開始，「上海五國組織會議」啟動，中國、俄羅斯、哈薩克、吉爾吉斯、塔吉克等五國先後簽署《關於在邊境地區加強軍事領域信任的協定》和《關於邊境地區相互裁減軍事力量的協定》，通過友好協商機制解決紛爭，並率先提出打擊恐怖主義、分裂主義和極端主義的主張，此舉讓中共可以維持「西線」（中亞地區）無戰事，而使中共有餘力將重點放在南邊東南亞外交拓展上。此外，上海五國組織也是用來抗衡美國霸權，因為此機制為中俄提供一個聚會場合，挑戰美國雄霸世界舞臺的角色，五國強力阻止美國違反一九七二年的反彈道導彈條約，發展導彈防衛系統，強調反彈道導彈條約是世界戰略穩定的重要基石。¹⁷

五、堅持反霸主義的外交原則

中共也進行「反霸權主義」的傳統外交，試圖喚起曾被殖民和剝削的東亞國家共鳴，藉以降低或排除美國在亞太區域的幹預勢力，確保中共在亞太的優勢。即使如此，在務實上中共仍必須積極與美國發展友好關係，特別是在一九九八年六月柯林頓總統訪華時，承諾「三不」政策，獲得美國不承認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也不支持台灣獨立，更不支持台灣加入聯合國，讓台灣處於孤立狀態，也是中共的重要亞太策略之一。這種以反霸為籌碼，換取美國降低中國反霸的政治利益，在「親霸」與「反霸」之間創造出中共最大政經利益。¹⁸

此外，反霸路線代表著低度發展國家對先進發展國家之政治危機意識，而堅持反霸權主義的外交，足以讓中共成為亞洲低度發展國家的代言人，進而為

17 邱坤玄，〈中共新安全觀與十六大後對美政策取向〉，外交政策公共論壇第二次會議，政治大學外交所主辦，2003年3月24日；<http://diplomacy.nccu.edu.tw/fofa/viewtopic.php?p=6#651>

18 潘錫堂，〈當前兩岸關係的發展與困境〉，《國政研究報告（NPF Research Report）》，國安（研）091-002號，民國91年5月18日。From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ns/091/ns-r-091-002.htm>

這些對霸權充滿疑慮的國家共創彼此的外交利益和提升國家尊嚴，這符合、也滿足中東、南亞、中亞等低度發展國家的反美和反霸的外交原則和民族主義情緒需求，最終可以擴大中共在亞太地區的最大外交利益。

第三節 領導人的影響因素

區域經濟發展是中國共產黨的歷代領導集體長期關注和著力解決的一個重要現實問題。在不同歷史階段提出了各有側重、各有特色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思想。這些思想對於縮小地區差距，保持社會穩定和民族團結，建設和諧社會，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第一代領導集體：實施區域經濟均衡發展戰略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根據中共是農業大國、工業基礎薄弱、生產力水準低且地區分佈不均衡的基本國情以及當時戰雲密佈的國際環境，把實現工業化和產業佈局平衡作為一個重要目標，在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上提出了區域經濟均衡發展的戰略構想。1956年4月，毛澤東在聽取34個中央部委的經濟工作彙報的基礎上，發表了《論十大關係》一文，其中專門談了沿海與內地工業的關係，標誌著毛澤東區域經濟思想的形成。他認為：我國全部輕工業和重工業，都有約百分之七十在沿海，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內地，這是歷史上形成的一種不合理狀況，沿海的工業基地必須充分利用，但是，為了平衡工業發展的佈局，內地工業必須大力發展。並根據當時國際形勢他強調：“新的工業大部分應當擺在內地，使工業佈局逐步平衡，並且利於備戰，這是毫無疑義的。但是沿海也可以建立一些新的廠礦，有些也可以是大型的。如果採取消極態度，就會妨礙內地工業的迅速發展。”這種安排，一方面要維護沿海地區的發展，另一方面要有計劃地重點照顧內地。¹⁹以毛澤東為代表的第一代黨中央領導集體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的實施，初步改變了歷史上形成的中共經濟重心過分偏重於沿海的格局。啟動和推動內地走上工業化之路，廣大內地、特別是西南西北地方基本上建立了以重工業為基礎、門類比較齊全的戰略後方基地，客觀上改變了我國工業佈局長期不合理狀況，形成了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新興工業中心，帶動了西部地區工業生產的發展，對於保障國家安全，加強國防建設，促進內地和少

¹⁹Butfoy, Andrew. *Common Security and Strategic Reform: A Critical Analysis*. New York: St. Martin's, 1997.

數民族地區的發展，使生產力的空間安排趨於均衡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推進作用，對中共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和深遠的影響。²⁰

然而，加快沿海地區的發展可以帶動整個國家的發展，沿海要支援內地，內地也要支援沿海的毛澤東區域經濟發展思想沒有貫徹始終，加之急於求成、國際安全等政治因素的干擾，中共在資金、設備、人才等要素的分配上是重內地輕沿海，人為地推動生產力佈局大規模西移。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更是由於備戰的需要，國家把大量資金投入內地的國防“三線”建設，再度忽視沿海地區的工業優勢，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全國經濟的健康發展。

二、第二代領導集體：實施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戰略

改革開放後，中共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出現重大轉折。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鄧小平明確指出：“在經濟政策上，我認為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於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就必然產生極大的示範力量，影響左鄰右舍，帶動其他地區、其他單位的人們向他們學習。這樣，就會使整個國民經濟不斷地波浪式地向前發展，使全國各族人民都能比較快地富裕起來。”這一指導思想對後來中共區域經濟政策的制定產生了深刻影響，標誌著中共區域經濟發展戰略思想的歷史性轉變，即由區域經濟均衡發展轉化為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²¹

首先，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的戰略思想是鄧小平對社會主義生產力佈局規律的深刻認識。在計劃經濟時期，中共一直把區域均衡發展視為社會主義生產力佈局規律，而把區域非均衡發展當成資本主義生產力佈局規律，因而在對待地區經濟發展上一直採取了均衡發展戰略，這是對社會生產力佈局規律的片面認識。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鄧小平以巨大的理論勇氣指出：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是客觀的經濟規律，無論是資本主義國家還是社會主義國家，都應充分尊重這一規律。這一認識為中共改革開放的總體戰略佈局奠定了堅實的理論

²⁰江澤民，〈推動裁軍進程維護國際安全——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9年3月27日，版1。

²¹中共所謂國際關係民主化即國家不分大小、貧富，都是國際社會平等的一員。就是各國的事情要由各國人民主，國際上的事情要由各國平等協商，全球性的挑戰要由各國合作應對。這樣做，有利體現各國人民的意願和利益，有利於促進世界的平衡發展；參見江澤民在亞行理事會第35屆年會上的講話全文，新華社，上海2002年5月10日電；另此一概念中共最早於2000年4月在「中非合作論壇上」明確提出，2001年11月胡錦濤在訪歐時再度提出，指出「各國的事應由本國政府和人民決定，國際上的事由各國政府和人民平等協商……應承認世界的多樣性，尊重各國的歷史文化、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參見倪世雄、王義桅，〈論國際民主化〉，《國際關係研究：理論、視角與方法》，包霞琴、蘇長和主編（上海：文匯，2002年），頁14。

基礎，為一部分地區和人民開闢了先富起來的康莊大道。其次，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的戰略思想是鄧小平對建國以來經濟發展歷史經驗的系統總結。鄧小平認為，在較長時間內不發生大規模的世界戰爭是有可能的，維護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這就為克服區域經濟發展中的平均主義，實施優先讓經濟基礎和經濟區位較好的沿海地區先富起來的政策，掃除了一大思想障礙。

正是由於中共實施了區域經濟傾斜式發展戰略，把建設的重點放在沿海，使東部地區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顯著增強了中共的綜合國力，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中共與發達國家的經濟差距，加快了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步伐。

然而，區域經濟傾斜式發展戰略的負面效應是使區域之間特別是東部與西部的經濟差距急劇拉大，地區之間的經濟衝突加大，產生了一系列社會問題。針對區域經濟發展差距擴大的現實問題，鄧小平在 20 世紀 80 年代末就提出了“兩個大局”的戰略構想。1988 年 9 月，他指出：“沿海地區要加快對外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帶較快地先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

三、第三代領導集體：實施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並不是簡單地對區域經濟均衡發展戰略或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否定，而是追求區域均衡發展戰略與非均衡發展戰略的辯證統一，追求效率與平等的高度統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的目的是要實現各地區經濟發展的良性互動與相互支援，形成區域產業結構合理分工、並向產業結構高級方向不斷演進的動態格局。²²

從改革開放到 1995 年，中共經濟一直保持兩位數的增長速度，但沿海地區與內地發展差距迅速擴大，已嚴重影響到了社會穩定、民族團結和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同時，中共經濟發展水準已提前達到小康水準，著重解決沿海與內地發展差距問題所應具備的條件已具備，提前實施我國第三步戰略目標的條件已經成熟。因此，以江澤民為核心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為縮小東西部經濟發展的差距，沿著鄧小平區域經濟非均衡發展戰略的大思路，在實踐上著眼於“後一個大局”，不失時機地把西部大開發提上了議事日程，實施戰略重點的轉移，走上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之路。²³

22張雅君。〈四十年中共外交政策的實踐評估〉。收錄《中國大陸研究》，頁396。台北：三民，民80年。

23王逸舟。〈論綜合安全〉。《世界經濟與政治》，4期。1998年4月，頁23-26。

如何正確認識和處理東西部經濟發展差距和擴大化趨勢，是關係中共經濟發展全局、實現現代化的重大課題。1995年9月，江澤民在十四屆五中全會提出：對於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中出現的差距擴大問題，必須認真對待，正確處理。但為了跳出均衡則窮、富裕則不公的區域經濟怪圈，第三代領導集體在繼承毛澤東、鄧小平的“共同富裕”的區域經濟思想的基礎上，認真總結了他們實際工作中所採取的策略手段的經驗教訓，創造性提出協調發展的策略手段，以期從根本上扭轉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矛盾。江澤民明確指出：“解決地區發展差距，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今後改革和發展的一大戰略任務。”根據他的指示，中共黨的十四屆五中全會作出了堅持區域經濟協調發展，逐步縮小地區發展差距的戰略方針。

1999年6月17日，江澤民在西安舉行的西北五省區國企改革和發展座談會上及時提出了西部大開發戰略。他明確指出：加快開發西部地區，對於推進全國的改革和建設，對於保持黨和國家的長治久安，是一個全局性的發展戰略，不僅具有重大的經濟意義，而且具有重大政治和社會意義。1999年9月，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正式提出西部大開發戰略，會議決議指出：國家要實施西部大開發戰略。中西部地區要從自身的條件出發，發展有優勢的產業和技術先進的企業，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東部地區要在加快改革和發展的同時，本著互惠互利、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原則，通過產業轉移、技術轉讓、對口支援、聯合開發等方式支援和促進中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2000年3月，九屆人大三次會議對西部大開發作了重要戰略部署，西部大開發正式進入實踐階段。²⁴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戰略的實施，極大地促進了中共整體經濟實力的提高和綜合國力的增強，西部大開發有力地推動著西部經濟的發展，東部地區依然保持著良好的經濟發展勢頭。中共十六大以後，胡錦濤創造性地提出了科學發展觀，要求牢固樹立和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推進改革和發展的順利進行。作為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所謂統籌區域發展，就是要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統籌兼顧，合理佈局，妥善處理區域發展中的各方面關係，走各地區協調發展、共同富裕之路。統籌區域協調

²⁴江澤民，《推動裁軍進程維護國際安全——在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上的講話》，《人民日報》1999年3月27日，版1。

發展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的重要方面，是促進中共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和社會全面進步、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重要途徑。²⁵

第四節 戰略的因素

一、亞太地區政治、經濟、軍事實力的不斷壯大與發展使該地區作為國際政治重要戰略地區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份量將足以與歐洲並駕齊驅。

由於種種原因，近代以來，亞洲國家在世界文明的競爭中落伍了，被擠到了世界政治舞臺的邊緣。但從 20 世紀 60 年代開始，亞洲地區的一部分國家的經濟發展進入了騰飛階段，經過了 20 多年的時間，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經濟強國，日本之後，亞洲四小龍、東南亞部分國家的經濟也獲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特別是中國自從 20 世紀 70 年代末開始改革開放以後，經濟發展迅速，國家實力日益增強。從而使亞太地區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迅速的地區，亞太地區在世界政治中的份量也由此變得越來越重。目前，該地區受 20 世紀末亞洲經濟危機影響的國家的經濟正在逐步復甦，亞太地區的經濟實力在經受危機的考驗後會更快更好地發展，從而使該地區的綜合實力更加強大，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會更強、更穩固，亞太地區將逐漸和歐洲一樣成為世界新的政治、經濟、軍事中心。²⁶

二、世界各主要大國或大國集團的戰略重點向亞太地區位移的趨勢將逐步加強，亞太地區的大國競爭將日趨激烈。

鑒於亞太地區的戰略地位越來越重要，能否在該地區擁有一席之地，甚或擁有一種比較優勢的戰略地位，已成為一些大國國家戰略重點考慮的問題。於是，冷戰後，美國、俄羅斯、日本等大國的戰略重點向亞太地區作了大幅度傾斜，紛紛強調自己在亞太地區存在的重要性。

²⁵張雅君，〈十六大後的中共外交：相互依賴深化下的利益、挑戰與政策取向〉，《中國大陸研究》，46 卷 2 期（民國 92 年 3、4 月），頁 25。

²⁶蔡拓，〈全球問題與安全觀的變革〉，《國際政治與安全》，2000 6 期（2000 年 6 月），頁 32-34。

美國歷來重要在亞太地區的存在。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夫1994年3月2日談其亞洲之行時指出：“對美國來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地區比這個地區更為重要了。”前助理國務卿溫斯頓·洛德曾直言不諱地說：“世界沒有什麼比東亞和太平洋地區更重要的了。俄羅斯傳統上是歐洲國家，但其大部分國土在亞洲，俄羅斯未來的發展方向也在亞洲。特別是，冷戰後，俄羅斯在西線歐洲受到北約的強大狙擊，北約東擴嚴重阻礙了俄羅斯西進的戰略愈圖，壓縮了其西部戰略空間。作為戰略補償和平衡，同時也為了穩定東線，避免兩線受阻的戰略被動，俄羅斯自然地把亞太地區作為戰略魚點加以經營。²⁷

三、亞太地區的戰略格局是當今世界政治力盆體系中最為複雜的格局之一。

亞太戰略格局首先是大國格局，亞太地區中獎日俄四大國的戰略實力和戰略關係決定了亞太戰略格局的基礎。亞太四大國力盆格局是任何一個亞太國家制定國家安全戰略時都不能不仔細考慮的戰略要素。亞太地區真正有力的大國有美國、中國、俄羅斯、日本等四大強國。這四大國構成了亞太地區的戰略格局的基礎。而印度、東盟、澳大利亞等國家的力雖也不弱，但與四大國相比，其重要性不足動搖亞太地區戰略格局的根本。它們只是亞太戰略格局的邊緣力，處在亞太戰略格局的邊緣。

組成亞太地區戰略格局基礎的四大國的國家利益差異很大，相互間存在著深刻的矛盾，衝突不斷。但是四大國誰也沒有在亞太地區取得絕對支配地位，相互間在戰略上又互有需要。所以四大國之間的關係既有聯繫合作的一面，又有競爭和衝突的一面，從而四大國的關係處於一種動盪不定狀態並帶動了亞太戰略格局的動盪。四大國在戰略上形成了一個力的四邊形結構，四極關係的任何變動，都會引起全面的反應，任何一方的戰略變化都會引起其他三方的相應的變化，情況相當複雜，是一個互相牽連、變化不斷的動態體系，戰略關係有很大的可變性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同的戰略利益支配下四大國之間會產生不同的雙邊或多邊戰略關係組合。其中有中美、中日、中俄、美俄、美日、日俄等六組雙邊組合，有中日美、中日俄、中俄美、俄日美等四組三角關係組合。

²⁷安全在冷戰時期受到相當高的注意，其中又以軍事安全為主要考慮。在美蘇對峙的時期，西方和共產國家關心本身和對手的軍事實力，能否打敗對手成為計算的重點。參見Barry Buzan, *People, States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emel Hempstead, Hertfordshire: Harvester Wheatsheaf, 1991).

四、亞太地區軍事強國林立，軍備增長引人注目。

亞太地區重兵雲集，這裏集結了除歐洲軍事強國以外的幾乎所有的世界級軍事強國，如美國、俄羅斯、日本、中國、印度、巴基斯坦、南北朝鮮、印尼、越南、澳大利亞、伊朗、伊拉克和以色列。其中，美國、俄羅斯是世界超級軍事強國，日本的軍事力量如果以品質僅次於美國和俄羅斯，如以軍費算則僅次於美國而居世界第二位。美、俄、中、印（度）、巴（基斯坦）是有核國家。至於有能力製造核武器的國家亞洲也不在少數。如日本和以色列等國的核能力也是眾所周知。亞洲地區有發射導彈能力的國家和地區就更多。美、俄、中、日、印、巴且不論，如朝鮮、中國的臺灣、韓國、以色列、伊拉克、伊朗等國都有不同種類的導彈武器。冷戰後，亞太地區並未能享受和平紅利，該地區的軍費水準並未降下來，相反還不斷有所增長。²⁸

五、亞太地區戰略熱點眾多，近期難以完全消弭，相應于複雜的安全形勢，亞太安全機制顯得不夠完善。

亞太地區民族、宗教文化社會制度歷史傳統差異極大，矛盾在所難免。加上該地區曾長期處於殖民統治之下，有很多殖民主義者故意製造的領土宗教和民族矛盾。所以冷戰後，該地區矛盾重重，衝突不斷，諸如分裂主義動亂、宗教極端勢力、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領土引紛、資源爭奪等問題接連不斷。產生了許多難以解決的熱點問題，成為影響該地區和平與安全的不穩定因素。尤其是這些矛盾和衝突常常被超級大國利用，作為其介入亞太地區事務，干涉有關國家內政的藉口，從而給該地區帶來了更大的不穩定，對該地區的安全產生更大的威脅。

綜上所述，中共是沿著“均衡——非均衡——新的均衡”的戰略思路，對地區經濟發展戰略進行探索的。這一否定之否定的過程，絕不是原來意義上簡單重複，而是不斷發展和完善的過程，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進的過程，反映了對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和本質特徵認識的不斷深入。各領導集體實施不同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其在本質上是一脈相承的，他們都以唯物史觀的理論和方法分析各自所處時代的特點，科學地回答時代提出的課題；他們都堅持社會

28政大國關中心主辦，2001年11月21日；參見http://www.future-china.org/csipf/press/paper/ppr_mnu.htm

主義的價值目標，堅持以人民利益和社會進步為標準的價值取向。歷代領導集體實施不同的區域經濟發展戰略，其出發點和歸宿也是一致的。



第四章 中共對南海地區安全的政策

南海諸島自古以來就是中國的領土，無論從南海諸島的考古發現還是從歷史典籍，都證明這一客觀事實。在二戰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內，國際社會也都承認中國對南海諸島的主權。但在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地質考古發現我國南海地區儲藏著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後，相關的周邊國家開始蠶食、侵吞其中的一些島礁。¹而 1982 年聯合國第三次海洋法會議上獲得通過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更加刺激了這些國家對南海諸島的分割佔領。這些國家利用《海洋法公約》中的某些對其有利的條款，在南海領土主權問題上與中國公然抗爭，大大提高了南海問題解決的難度，從而逐漸造成了今日南海的局勢。目前，東沙群島、中沙群島和西沙群島在中國政府管轄之下。南沙群島雖然主權屬中國，但 189 個已有命名的島、礁和暗灘、暗沙中，中國僅控制著 9 個島礁，其中包括台灣控制的太平島，大部分島嶼都不在中國控制之中。有關國家搶佔我南中國海島礁約 50 個。其中越南佔據著南沙的 29 個島礁，菲律賓佔據 9 個，印度尼西亞 2 個，馬來西亞搶佔 9 個，文萊 1 個。

第一節 石油戰略安全

上世紀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這些國家開始分別在所佔據的島礁上修建飛機跑道，建漁港、燈塔和旅遊觀光點，並紛紛與外國石油公司合作，開採南沙地區的油氣資源。一些國家自從涉足這一海域後，短短十幾年時間，已從南海獲取了重大經濟利益，有的甚至從貧油國變成了油氣資源出口國。到 90 年代末期，這些國家已經在南沙海域鑽井 1000 多口，發現含油氣構造 200 餘個和油氣田 180 個，僅 1999 年就年產石油 4043 萬噸、天然氣 310 億立方米。目前，南沙海域已經有 200 多個油氣田，超過 1000 口油井被東南亞國家勘探和開發，每年開採的石油超過 5000 萬噸。各國對中共漁業資源的掠去是驚人的，並且還經常抓捕中共漁民。²

¹ 南海“歷史性權利”的概念主要基於南海權益各聲索國已侵佔中國南海領土主權並侵犯南海權益等現實，為強調曾經完整的南海權利以及這一權利的合法性而提出。此處用“傳統權利”主要基於南海權益在清朝中晚期時並未遭受具有法律意義的侵犯以及當時中國本擁有南海權利的事實。

² 鞠海龍：《論清末和民國時期我國相關史料在解決南中國海爭端方面的價值》，《史學集刊》2003 年第 1 期。

從地緣戰略觀點來分析，目前國際石油分佈，是以「一個中心，兩條航線」來掌控世界能源，即是以石油為主要蘊藏地帶——中東地區為中心，向太平洋和大西洋延伸的東、西兩條路線為主要運輸航線。西線是由波斯灣經紅海、地中海到歐洲、美國東岸的「大西洋航線」；東線是由波斯灣經斯里蘭卡、麻六甲海峽、關島、夏威夷到美國西岸的「太平洋航線」。³

未來世界能源供應對中東產油國的依賴程度，只會愈來愈高。將從 1997 年的 26%，提高到 2040 年的 40%。但世界各國對中東的能源依賴程度並不相同。歐洲北海油田枯竭後，可改由俄羅斯及裏海地區輸入油氣，原運往歐洲的非洲油田可改供應北美洲，透過這種方式，歐美地區可有效限制對中東產油國的能源依賴。亞洲情況則有不同，亞洲地區快速的經濟發展使石油需求急速上升，但亞洲本身的能源生產並不樂觀。日本早透過合作方式與中東產油國建立密切的石油外交，中共也別無選擇的與中東產油國發展這種關係。因此，亞洲將是未來世界能源棋盤上的關鍵地區，一旦能源供應短缺，中共遭受的打擊可能比歐美國家嚴重。

一、石油運輸路線安全面臨極大挑戰

（一）中共能源安全受美國影響：

「能源安全策略改變地緣戰略的價值，地緣戰略保障能源安全」，已成為中共近年來為保障能源安全策略的積極作為與認知。綜上所述，就地緣觀點言，無論在石油資源、地緣關係、交通條件上，中東地區都是中共石油進口貿易的主要供應地。而能源的運輸安全就中共而言，卻是一項極大的挑戰，一旦中共和美國引發衝突，則對中共將會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因為從波斯灣的荷姆茲海峽至麻六甲海峽，甚至於東南亞一帶均屬美軍的勢力範圍，對於中共能源安全的保障而言，必須另圖他法。⁴

（二）中共力求確保能源供給：

隨著中國大陸經濟的快速發展，其對於各項能源的需求量也急遽的增加。中共當局為了確保長期持續穩定的能源供給，並維持整體經濟的健康發展，已經把能源安全戰略列為「頭等大事」來看待。中共現階段所推行的能源安全措

3 韓振華《我國南海諸島史料彙編》，東方出版社，1988年，第1頁。

4 鞠海龍：《亞洲海權地緣格局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5—6頁。

施將會牽動中共整體軍事安全及地緣戰略部署的動向，因為中共如何確保自中東經由印度洋、麻六甲海峽、南海、臺灣海峽，到大陸東岸的航線安全，以維持穩定的石油能源供給，勢必將成為其地緣戰略的重要課題。

二、向外擴張石油戰略引發俄國疑慮

（一）莫斯科對北京有疑慮：

美國不少觀察家早已看穿中共這種以敦親睦鄰為中心，作放射狀向外擴張石油戰略，不斷的擴充油源的版圖，將會使其在國際上有可能因能源安全得到有力的保障，也會改變美國與其地緣戰略聯盟關係，亦會於戰時影響到國際同盟的關係，整個地緣戰略已經受到能源安全動向的轉變，而產生重大的變化。就連與中共一向交好的俄國，亦改變遠東油管路線及中共石油公司被迫退出拍賣活動，顯示出莫斯科對北京的疑慮。⁵

（二）中共積極規畫鋪設油管：

受到日本的利誘，莫斯科的動向猶豫搖擺不定，中共能源機構曾提出三個解決方案：建立泰國南部沿海的「海陸聯運陸橋」、建立「泛亞洲石油大陸橋」及開鑿「克拉地峽運河」。並積極規畫鋪設油管，包括巴基斯坦、孟加拉、緬甸、泰國等四國的油管路線，以及可以避開麻六甲海峽，藉由「泛亞鐵路」西線從雲南西線瑞麗出境，連接緬甸東北線交通樞紐，最後到達仰光，長度約1,700公里，直接通往印度洋，為中共多提供一條能源後路。

三、建立能源供應鏈動作恐肇生衝突

（一）中共與哈薩克達成石油合作：

大陸在全球四處尋油的腳步從未停止。中共與哈薩克油管不經第三國，當初設想就是避免美、日等「石油俱樂部」資深成員對中共能源取得的箝制與威脅。但中共與哈薩克油管磋商期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反對石油東輸，百般阻撓國際金融界向「中」哈油管貸款，而胡錦濤曾提出「馬六甲困局」因為

⁵ 陳鴻瑜主編《外交部南海諸島檔案彙編》，上冊，第二部分目錄，臺灣“外交部行政院研究設計委員會”，1994年，第113、116頁。

該區也是美國勢力所在。因此，中共今日和哈薩克達成石油合作，反應其油源避險政策。⁶

（二）中共能源佈局易引發衝突：

種種動作讓中共的全球能源戰佈局更趨清晰，即把全球能源版圖分成三大塊，由三大石油企業各自分工收購，在全球建立風險均擔的能源供應鏈，但中共的行動正引來其對手：日本及印度，尤其是前後院（加拿大及拉丁美洲）都被中共攻佔的美國極度關切，遲早因石油引發正面衝突。⁷

（三）臺灣位居兩邊角力的地緣位置：

中共東邊的制約主要來自中華民國，因此，政策表面上強調民族主義與民族情感，實際上是基於地緣戰略利益考量，尤其是石油的運送。因此，中共要成為亞洲強權，現階段最大的考量是以發展經濟為主，而整個西太平洋最具優勢的地緣位置就是臺灣，所以在中共戰略發展已朝陸地轉向海洋的方向調整的今日，相較於美日等國而言，臺灣位居兩方的相互抗衡之下，如何妥善操作天平槓桿原理，以取得中華民國最有利的平衡點，才是我們最應該思考和面對的問題。

四、我扼臺海水道掌控油源戰略地緣

（一）臺灣地理戰略位置重要：

對資源極貧乏的日本和對中東石油有相當依賴的美國而言，控制經臺灣海峽、麻六甲海峽，西入印度洋，北上阿拉伯海，終達波斯灣油區的航線，實在是太重要了。在中共逐步走向海洋的同時，勢必與美、日兩國發生衝突，而這種衝突的區域環境，又為臺灣所在的地理賦予新的戰略價值，中共若控制臺灣，則不但在地理上成為扼制臺灣海峽的唯一國家，同時更能將臺灣作為跨進太平洋的良好跳板；反之，若臺灣不受中共的控制，那麼中共海權的力量在邁向太平洋時，將受到較大程度的制約。⁸如果能建立影響臺灣海峽水道的軍事力量（例如新潛艦的建構升級，使得任何經過臺灣海峽水道的國家不敢小覷我國），如此一來必可增加我國籌碼，否則只是空有優良的地緣位置。

（二）中共為躋身大國進行能源外交：

⁶ 詳參《關於我國南海諸島各島嶼中英地名對照表》，《水陸地圖審查委員會會刊》，1935年1月第1期，第61—69頁。

⁷ 孫冬虎《南海諸島外來地名的命名背景及其歷史影響》，《地理研究》2000年第2期。

⁸ 戴可來、童力《越南關於西南沙主權歸屬問題檔資料彙編》，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0頁。

從地緣戰略觀點的角度來看，中共 21 世紀的目標便是要躋身為全球大國，一圓「強國夢」，而要達成此一目標除了要依賴本身的政、經實力外，更需要藉助中共有利的地緣戰略位置及積極的能源安全作為。中共近年來經濟高度的發展，並且扮演「世界工廠」的角色，能源需求量大增；能源外交可收「一石三鳥」之效，除滿足能源需求、產油國分攤風險，還可提升國際影響力，對中華民國亦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

五、我應積極多元參與能源開拓

（一）我國能源供應產生壓力：

中共強調重視能源供應多元化，並做好能源戰略儲備工作；近年能源外交出擊的焦點，為臺灣邦交重心非洲和中南美洲，對臺灣形成的外交空間壓迫相當明顯，甚至於對我國能源的供應，也產生極大的壓力。另一方面，中共也利用地緣的優勢，積極與周邊的國家擴展能源合作的協定，多管道運用地略價值以謀取能源安全的保障。此等種種的作為，必可為中共確保能源安全而開創地緣戰略價值並進一步創造有利態勢，我國應該要特別注意後續中共會發展。⁹

（二）我需開闢多重能源來源管道：

反觀我國在臺灣海峽的地緣戰略雖具有不可忽視價值，但是對於能源安全上卻是缺乏積極的作為，實在值得相關部門重視。另外，亦應盡速建立具有威嚇的軍事武力，以護衛確保能源安全的海洋通路，並利用周邊地緣關係積極參與能源的開擴，不能被排拒在外。

（三）求取我最大利益：

如何藉由我國有利的戰略地位，並運用大國的矛盾、求取我方的最大利益，及以適度的模糊策略保持我方的迴旋空間等，都將是攸關我地緣戰略價值發展和能源安全獲得保障的重要課題，值得重視和研究。¹⁰

第二節 領土劃界

一、地理位置決定戰略價值

⁹Amy E. Gadsden, "Flashpoints in East Asia: Hot, Hotter, Hottest",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8(3), June 2000.

¹⁰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America's Changing Strategic Interests." Survival 8(3): 3-17.

有學者指出，在戰略中，像在房地產中一樣，地理位置是決定價值的主要因素，歷史發展表明，一個國家或地區，如果要在世界上引人注目，至少應該具備下述三個條件中的一個或都具備：要麼本身經濟發達、社會進步；要麼擁有能供全球使用的重要資源；要麼處在通往某個文明中心或文明之間交往的必經之路上；否則，則永遠是默默無聞，淪為真正的邊緣地帶。這三個條件在古代的南中國海似乎都不具備。從地理的分佈來看，南中國海地區各國並不像大陸上的國家那樣緊靠在一起形成一個統一的單元，而是一部分國家在大陸上，而另一些國家星羅棋佈地分散于大海中，中間隔著南中國海。

由於中國北方被遼、金切斷了陸上國際貿易線，不得不轉向南中國海方向發展，重視海上貿易，以增加國庫收入，在這一點上以南宋為甚，但此時中國封建王朝重視與南中國海方向的貿易是與阿拉伯和西歐商人而不是與東南亞地區進行的。在此，南中國海只是作為一條通商的航線。西方對南中國海作為交通樞紐的認識雖比中國稍晚，但來得迫切。西歐在中世紀後期社會經濟的發展對商品與市場的需求，需要擺脫奧斯曼帝國對陸上“絲綢之路”的控制，取得與印度、香料群島和中國的直接貿易聯繫。在這種情況下，從西方經南中國海到達中國的航路被開闢出來。隨著工業革命的完成，大量工業製成品需要海外市場，南中國海地區作為商品市場和原料產地向資本主義顯示其。¹¹

二次大戰後，雖然先有兩大陣營的鬥爭後有美蘇兩強的爭霸，但世界經濟卻一直飛速發展，南中國海地區作為世界貿易航道與市場的地位更加重要。它是世界海運量第二大海上航道，僅次於位在歐洲的地中海，全世界一半以上的大型油輪及貨輪均航行經過此一水域，每年通過的大小船舶總計在四萬艘以上，經麻六甲海峽進入南海油輪是經過蘇伊士運河的三倍、巴拿馬運河的五倍，經過南中國海運輸的液化天然氣是全世界液化天然氣總貿易量的2 / 3。這條能源供應線對日本、韓國、中共最為重要，是整個東亞地區的“海上生命線”，也是東南亞各國對外貿易的主航道。日本稱“這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貿易通道，不僅是同東南亞的貿易，而且是同中東和歐洲的貿易”，把南中國海稱為“東方地中海”毫不過分。¹²

¹¹ 美國與菲律賓、馬來西亞與英國有軍事關係，越南也有少量的俄羅斯海空軍駐守。參閱劉永城，「南海現況淺析」，空軍學術月刊，第451期，民國83年6月12日，頁78-87。

¹² 陳鴻瑜，「後冷戰時期美國之亞太安全政策」，美國月刊，第七卷第七期，民國81年7月，頁71。

二、傳統陸海權大國的爭奪依然如故

地緣政治學家對南中國海的關注可上溯到二戰時期，豪斯浩弗預言“印度洋—太平洋空間”將會是未來權力的主要中心，註定要取代歐洲成為世界事務的主宰者，按照豪斯浩弗的預測，作為“印度洋—太平洋空間”結合部的南中國海應該在這個“未來的權力中心”處於重要位置。豪斯浩弗還在他所設想的世界四個泛區中給日本留有一個以日本為主導包括東北亞、東南亞和澳大利亞的“泛亞區”。在這個判斷的基礎上，他對日本的侵華政策提出了批評，日本“1937年全面入侵中國是一個失策”。他主張日本應把注意力移向南方，建議“日本應與美國和平共處，這樣可以促使美國巨人接受東南亞共榮圈”。¹³

事實上，豪斯浩弗對日本的批評是不恰當的，在他批評之前日本就把南中國海當作“海上生命線”。1936年6月一名叫石丸藤太的海軍評論員說：“日本之生命線有三：第一是大陸正面的生命線，在‘滿洲國’（中國東北）第二與第三是海洋正面之生命線。因而日美修訂安保條約對日本來說本質上是其自太平洋戰爭以來“保衛”其“海上生命線”企圖的繼續。輿論一般把關注的焦點放在美日修訂後的安保條約是否包括臺灣海峽方面，但實際上，東南亞及南中國海航道與臺灣海峽同為日本“海上生命線”的組成部分，在美日安保條約裏同等重要，如果條約只包括後者而沒有前者，則美日修訂安保條約對日本來說其意義僅限於干涉中國內政，不具有保護“海上生命線”的含義。另一方面，日本在二戰後的表現似乎接受了豪斯浩弗的建議，即“日本應與美國和平共處，這樣可以促使美國巨人接受東南亞共榮圈”。由於日美結盟，日本在東南亞的發展未遇到美國的絲毫阻撓，付出的代價遠小於發動另一場太平洋戰爭事實也表明，日美關係發展順利時，日本在東南亞便會安然無恙。¹⁴

美國苦心經營《東南亞集體防務條約》、進行了30年越南戰爭以及在菲律賓的軍事基地與蘇聯在越南的金蘭灣基地隔著南中國海對峙無不表明這一點。“9·11”事件美國借反恐名義重返東南亞，“不僅有利於反對恐怖主義，而且有助於防止該地區的潛在的侵略者”。9,11“為美國提供了重新實現東南亞地

¹³John H. Noer, *Chokepoints: Maritime Economic Concerns in Southeast Asia*,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1996, pp.3-4.

¹⁴柯林頓政府「南海聲明」文件(1995年5月10日), “Spratly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http://dosfan.lib.uic.edu/ERC/briefing/daily_briefings/1995/9505/950510db.html.

區權力平衡的機會”，美國的著眼點仍在於搶佔“邊緣地帶”。冷戰後時代，如斯拜克曼所說：“在國家的外交的政策中，地理為最基本因素，它是永恆不變的”所以，儘管東西方矛盾已消失，傳統的地緣優勢爭奪仍是大國外交的重要內容，大國對戰略要地和海上通道的關注也未有絲毫鬆懈。西方國家的政治家和政治學家在對冷戰後的地緣政治的分析中並未脫離傳統地緣政治學的窠臼，南中國海地理位置重要性時隱時現於他們的地緣政治分析中茲比格涅夫·布熱津斯基認為，冷戰後世界新的地緣政治形勢將變得日趨複雜，東南亞處在他所劃分的世界可能出現的多極組群中的“不規則的穆斯林新月形區域組群”，這個地區存在著尖銳的矛盾和衝突，居住其間的穆斯林“不佩服西方”，認為西方特別是美國“令人討厭”在布里辛斯基眼中，該區域的重要性是和“文明衝突”聯繫在一起的各國文化背景不同、宗教信仰各異、各種語言和種族相伴而生、各國政局時有不穩。¹⁵

正是該地區政治情況的複雜，給世界與周邊大國在該區域謀求政治、經濟和文化影響提供了機會。除海上航道外，空中航道在南中國海也具有特別的重要性。“空中航道”即“飛航情報區”(FIR, Flight Information Region)，指國際民航組織規定的“空中航道”(Air Route)南中國海上空的民航“飛航導航”(AIR Navigation)以東經1140為界分東、西兩區，東區為馬尼拉飛航情報區，西區為胡志明飛航情報區，所有在南中國海上空飛行的飛行器都要接受這兩區的導航服務。如果沒有這兩區的允許，就不能通過，或者要繞道而行。而且雖說是民航服務，但所有經過南中國海上空的飛行器都受這兩個區的管制，因而軍用飛行器也不例外，必須申請得到允許才能通行。南中國海還是軍事戰略要地，由於南中國海海底地形極其複雜且海水極深，如果在南中國海有一艘核潛艇潛伏在深水中，就能抵消在菲律賓蘇比克灣基地的美國第七艦隊部署的大部分實力，並且能夠控制半徑為4000公里，包括世界1/3人口的地區。這個地區的水深使得幾乎不可能偵察到潛艇，因此也就無法採取反擊行動因而也就有了這樣一種古老的地緣政治學命題：“控制南中國海的國家將控制東南亞”，導致各國極為關注南中國海的地緣戰略。冷戰後美國的東南亞的軍事力量一度有所減少，但近年來卻借各種名義又逐漸回到了原來的地方。

¹⁵ 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有三個主要的支柱：降低主要戰爭的風險，維持安全競爭在可控制的範圍內，追求開放的市場並與在這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年代中，寬廣的美國經濟戰略相連貫。參閱 Thomas G. Moore, "In pursuit of open markets: U.S. economic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Asian Affairs* 28(3):170-179, Fall 2001.

三、多種文明的交匯處

南中國海區域面積雖小，卻是多種文明的交匯處。按亨廷頓劃分文明的標準，南中國海區域主要文明就有兩個，中華文明、伊斯蘭文明。其中中國、新加坡、越南等屬中華文明，泰國應該屬於次文明的佛教文明；馬來西亞、印尼、汶萊則是典型的伊斯蘭文明；菲律賓本身就是多種文明的聚合體，應是亨廷頓所謂的文明間的斷裂帶不僅如此，隨著國際政治與經濟的發展，外部大國的力量與利益也延伸到南中國海區域，美國不用說，印度、日本、澳大利亞和俄羅斯也都在南中國海擁有重大利益。連遠在西歐的大國在冷戰結束以後也開始關注南中國海區域，1996年的亞歐首腦會議及其後續會議即是一個例證，雖名曰亞歐會議，但參加會議的亞洲國家除了日本、韓國外，其餘全部是南中國海周邊國家，這種情況在南中國海區域不一定完全正確該區域各國之間及國內的種族差別、宗教信仰、文化差異等不比巴爾幹地區更小，但該地區並未巴爾幹化，雖有騷亂，卻沒有出現像巴爾幹地區那樣的民族衝突與血腥戰爭。¹⁶

所以如此，一是該地區沒有種族衝突的歷史傳統，雖然曾發生過本地人反對甚至屠殺華人的現象，但這與殖民統治、經濟動盪和各國政治派系的鬥爭有莫大的關係。二是該地區各國為緩和種族衝突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及時疏導處理種族衝突事件，使之趨於解決例如，馬來西亞與新加坡，雙方曾合併為一國，但由於國內華人和馬來人種族衝突較為激烈，而且又引起鄰國印尼的疑慮與對抗，雙方領導人果斷撤銷合併，避免了種族衝突與國家間的對抗，三是該地區經濟增長迅速，為各種族和各國間人民平等相待創造了條件經濟上的進步，使各國有能力在教育、住房、醫療衛生和就業方面為各民族人民提供了平等的機會，從而使各民族之間的緊張關係緩和下來。¹⁷

四、地緣經濟與資源政治因素將逐漸增強

南中國海爭端在冷戰結束以來愈演愈烈，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該海域蘊藏著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這反映了當今時代的一個重要特徵，即能源爭奪越來越成為左右世界局勢的重要因素。石油的獲得不但是國家軍事安全的前提和保障，也同國家的生存和發展之間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然而石油是一種不

¹⁶Philip Bowering, 「南海地區的權力平衡」, 國家政策雙周刊, 第96期1994年10月。

¹⁷Mark J. Valencia, 「南海爭議的解決：脈絡、選項與議題」, 國家政策雙周刊, 第96期1994年10月。

可再生性資源，具有稀缺性，其形成需要上千萬年，而按目前開採速度，地球上現有的石油儲量無論如何都不可能供開採千萬年之久。在還沒有研究出石油替代品的情况下，各國要維持自身經濟的發展，就只有爭奪現有的石油資源。人們普遍認為南中國海具有豐富的石油和天然氣，而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與勘探技術的進步，對該地區石油與天然氣儲量的估計也在日益增加 1968 年聯合國亞洲暨遠東經濟委員會自然資源探勘報告指出，南海至少具有 10 億噸的石油儲量 1969 年 68 月美國海軍調查局在暹羅灣及南中國海北部（北緯 14 “以南）進行地震和地磁測量，推斷南中國海有良好的含油遠景 1983 年中國在南中國海北部和南沙群島附近海域進行石油勘探，查明南中國海海域共有 38 個盆地或盆地群，其中全部或部分位於大陸架的盆地有 19 個，面積約 83 萬平方公里，沉積層厚，最大厚度可達一萬米，生油氣層多 1987 年中國科學院南沙綜合科學考察隊對南沙群島及鄰近海區的調查，認為曾母暗沙盆地和南薇灘及其以南海區……是重要的含油氣區可見，南中國海海域儲藏著豐富的石油、天然氣資源是沒有疑問的。¹⁸

除石油、天然氣外，漁業資源也是一種重要的海洋資源據專家估算，南海區的漁業資源潛在漁獲量大體分佈如下：（1）南海北部大陸架漁場（47.76 萬平方公里）約 121 萬噸；（2）北部灣漁場（16.4 萬平方公里）60—70 萬噸；（3）西、中沙漁場（21 萬平方公里）23—34 萬噸；（4）南沙漁場（71 萬平方公里）42—56 萬噸全區漁業資源潛在漁獲量約為 246—281 萬噸科學家普遍認為，幾十年來，陸源污染、過度捕撈、不合理的海洋與海岸帶開發，正在使南中國海生物多樣性面臨嚴重危機，已經有超過八成的珊瑚顯示了退化特徵，如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到 2030 年，本地區的紅樹林將損失殆盡現在南中國海的海捕產量達 370 萬噸，已大大超出專家們評估的可捕量目前除西沙、中沙、南沙海域尚有一定潛力之外，其他漁場的資源已被充分利用，目前南中國海區域許多國家仍在競相捕撈，南中國海主權之爭基本上是以爭奪石油和漁業資源為外在表現形式一些國家對其漁民去有爭議的南沙群島海域捕魚採取鼓勵政策，例如，越南對願意去南沙群島水域捕魚的漁民實行免稅，鼓勵他們到那裏捕魚。¹⁹

¹⁸朱雲漢，「AEI-INPR 南中國海會議的重要結論」，國家政策雙周刊，第 96 期 1994 年 10 月。

¹⁹Amy E. Gadsden, "Flashpoints in East Asia: Hot, Hotter, Hottest",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8(3), June 2000.

冷戰結束後，意識形態的對抗已經結束，但局部衝突與爭端仍連綿不斷，一些被冷戰所掩蓋的領土爭端逐漸顯露出來，而領土爭端一個主要原因來自於能源的爭奪，從上個世紀 80 年代起到今天的三場與伊拉克有關的戰爭、亨廷頓所謂的西方文明與伊斯蘭文明的衝突、裏海沿岸國家的摩擦等，都體現的是能源爭奪正是因為南中國海海域擁有豐富的能源，才使得冷戰後南中國海領土、領海爭端愈演愈烈與上述地區更為不同的是，南中國海地區體現的是地緣經濟與資源中心的統一，不像中東地區二者被割裂（阿拉伯國家經濟的發展不能與波斯灣的石油產量成正比），因而隨著東南亞各國工業化的深入，經濟的飛速發展，對能源需求的迅速增加，不可避免地要對有限的能源進行爭奪，加上外來大國的插手，預示著東南亞地區的地緣政治格局正在發生變化並且變得越來越重要。²⁰

早在 20 世紀 50 年代南中國海領土歸屬問題就曾出現過，只不過當時對南中國海提出領土要求的菲律賓與南越政府當局證據不足，加之國際社會對中國擁有南中國海主權沒有異議，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政府的出版物均承認中國對南中國海的主權，就連北越政府也在各種場合多次聲明南中國海主權歸屬中國，因而菲律賓與南越政府對南中國海的主權要求雖喧鬧一時，但旋即歸於沉寂。²¹70 年代，南中國海主權爭端凸顯，普遍認為是在該海域發現石油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的制訂使東南亞爭端國認為對該地區提出主權要求有了法律依據與實際意義，但東西方鬥爭、美蘇爭霸仍是國際政治中的主要矛盾，各國對外政策與國家利益都不得不服從於它，因而南中國海爭端暫時仍處於潛伏狀態。此一期間中越（南越與統一後的越南）曾發生過兩次。²²

能源方面，據預測，中國未來有約 1 / 3 的能源需要從中東進口，還有一部分能源要從東南亞國家及大洋州國家進口，將這一部分計算進去，則中國有超過 1 / 3 的能源進口需要經過南中國海海域，所以，南中國海地區出現不穩

20Richard E. Hull, "The South China Sea: Future source of prosperity or conflict in South East Asia?", 1996, <http://www.ndu.edu/inss/strforum/forum60.html>。以及Richard D. Fisher, Jr., "Rebuilding the U.S. - Philippine Allianc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February 22, 1999。

21 "Special Report - The South China Sea Dispute: Prospects for Preventive Diplomacy",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http://www.usip.org/oc/sr/snyder/South_China_Sea2.html。

22 "Whom, If Not China, Is US Aircraft Carriers' Moving onto South China Sea Directed Against?", People's Daily, Aug. 27, 2001。

定，將延緩中國經濟的發展。因此中國大陸必須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處理好南中國海爭端對中國營造一個和平的周邊環境的意義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南中國海爭端本身如果處理不當，將使中國東南沿海面臨著與鄰國發生衝突的局面；二是中國周邊還存在許多安全隱患，南中國海爭端只是其中之一，此外還有朝鮮半島問題、釣魚島爭端、臺灣問題、中印邊界爭端等，這些問題在一定程度上處於潛伏狀態，與這些問題相關的國家或地區都在揣測、分析中共對南中國海爭端採取何種政策，如日本就明確表示擔心中共用於南中國海爭端中的“做法”將來釣魚島爭端。²³所以，南中國海爭端若處理不當，將損害中共安全環境，不利於現代化建設，三是南中國海爭端影響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整體看法。許多境外學者想當然地認為中國把南中國海視為“中國湖”，實際上是“中國威脅論”的翻版若該爭端朝著衝突的方向發展，“中國威脅論”對中共國際形象將更具破壞性的影響因此，中共應借助南中國海爭端努力消除“中國威脅論”，以一個愛好和平、負責任的大國形象出現在國際舞臺上對於東南亞相關國家來說，南海問題主要包含著主權、領土、資源之爭。但對於中共來說，則更事關國家崛起的大業。綜觀近代世界大國歷史，海洋權益與其興衰緊密相關——荷蘭、英國都是借海洋而登上歷史舞臺，俄國彼得大帝發動對瑞典的戰爭、數次瓜分波蘭以獲取出海口，美國的領土擴展到太平洋東岸，才有了今日美國。今天，美國無疑要借南海問題遏制中國的發展，而一個國家海洋權益的強弱，事關一個國家對海洋權力的爭取、保護能力。中共的崛起，解決南海問題是題中應有之意。²⁴

其次，南海問題事關中共國家安全。對於中共來說，南海具有重要的戰略地緣價值，它是中共東南部戰略防禦的前哨陣地和華南地區的海上屏障。獲得對南海（尤其是南沙）的支配地位，使中共的戰略防禦縱深向南推進數百海裏，對於保障經濟安全、軍事安全有重要意義。南海問題不解決，則中共與東盟發展的不穩定因素也將長期存在。而且南海是海上交通要道，控制南海，對於中共的海上貿易安全有重要經濟意義。

²³美國與菲律賓、馬來西亞與英國有軍事關係，越南也有少量的俄羅斯海空軍駐守。參閱劉永城，「南海現況淺析」，空軍學術月刊，第451期，民國83年6月12日，頁78-87。

²⁴Amy E. Gadsden, "Flashpoints in East Asia: Hot, Hotter, Hottest", *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 8(3), June 2000.

第三節 非傳統安全

東南亞國家的恐怖主義由來已久，其組織主要有四類：分離主義恐怖組織、“聖戰”組織和原教旨主義組織而且東南亞各國的恐怖分子並非孤立，而是和國際恐怖主義緊密聯繫在一起，其成員多在國際恐怖分子的基地訓練過。不過，在“9·11”之前東南亞各國的恐怖主義並未引起國際社會的多少注意，而且也沒有給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等西方國家帶來多少危害，各國都在依靠自己的力量進行打擊，國際社會也未給予有力支持。“9·11”事件後，美國在阿富汗打擊“基地”組織，引發了東南亞恐怖組織的連鎖反應菲律賓的阿布沙耶夫組織不時地製造爆炸事件和綁架人質索要巨額贖金，甚至襲擊在菲美軍印尼的巴厘島爆炸事件使“9·11”事件後東南亞的恐怖活動達到高峰，緊接著美國駐巴厘島總領館、菲律賓駐萬鴉老總領館、菲律賓的三寶顏市也相繼發生爆炸，‘9·11’事件後的東南亞恐怖主義活動給南中國海區域帶來了兩個重要影響一是使南中國海周邊各國的經濟增長受到損害，尤其是在東南亞各國受金融危機的打擊還未完全恢復的時候加速了美軍以反恐為名重返東南亞，從而導致該地區力量失衡，增加該地區地緣政治的複雜性與不確定性。²⁵

美軍重返東南亞的一個主要託辭是擔心恐怖分子襲擊航行于麻六甲海峽及南中國海航道的油輪，美國能源部列出世界石油運輸的六大“瓶頸”（土耳其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巴拿馬運河、俄羅斯石油外運通道、霍耳木茲海峽、麻六甲海峽、蘇伊士運河），其中麻六甲海峽位於連接中國、印度、印尼的最短航線上，被認為是亞洲能源運輸瓶頸，最狹窄處僅1.5英里如果海峽因恐怖襲擊而被關閉，幾乎一半世界船運將不得不航行更遠的路程，在世界範圍內提高運輸費用。2002年12月巴厘島爆炸案使美國人擔心該地區的其他目標包括麻六甲海峽這個運輸“瓶頸”可能成為恐怖分子襲擊的目標。所以，美國借反恐名義加快在東南亞的軍事重返，“9·11”事件後菲律賓即邀美軍進駐以反恐，名為打擊阿布沙耶夫，實為美國進駐菲律賓大開大門，2002年美菲“肩並肩聯合軍事演習”時美軍駐菲部隊達到3800人，創下歷史記錄。巴厘島事件發生後，印尼政府也改變了此前一直不合作的方針，其國防部長馬圖裏首次承認國內有

²⁵ 陳鴻瑜，「後冷戰時期美國之亞太安全政策」，美國月刊，第七卷第七期，民國81年7月，頁71。

基地組織的存在，爆炸事件發生後美國總統布希就打電話給梅加瓦蒂，要求印尼與美國合作反恐。

可以預料，美國今後將繼續增加在該地區的戰略投入冷戰後隨著全球化的深入，國際分工與世界經濟一體化及區域化的進一步發展，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相互交融，地緣政治的整體發展趨勢表明經濟、生態安全的意義將超過軍事、政治安全，傳統地緣政治有被地緣經濟取代的趨勢及地緣經濟與資源中心正日益被割裂，但在南中國海地區，情況並非如此，地緣政治各要素並不相互排斥或替代，軍事政治安全與經濟生態安全同等重要，地緣政治與地緣經濟同步相向發展所以，傳統地緣政治的爭奪、地緣經濟的振興及資源政治的紛爭相互交錯日益成為南中國海地區最基本的“地理”因素。²⁶

東南亞的非傳統安全(non-conventional security)威脅日益加大，已取代了過去著重的國家間對抗。美國學者賽蒙(Sheldon W. Simon)認為：「嚇阻或防禦國家間的侵略在今天已經不是東南亞核心的安全關注，反而，『非傳統』威脅已經從側翼走到中央舞台」。非傳統安全威脅具有以下三個特徵：(1)傾向於跨國性；(2)政府受到非國家行為者的挑戰；(3)非國家行為者通常採取非對等性策略，如恐怖主義、游擊戰和非正式活動。

首先，自 911 事件後，國際恐怖主義的風聲鶴唳提高了世界各國的警覺心而嚴陣以待，但此恐怖事件的「成功」也無形中鼓舞了恐怖份子的肆無忌憚。例如，爆炸事件在歐洲的有西班牙馬德里(2004 年 3 月)、英國倫敦(2005 年 7 月)，在亞洲的有印尼峇里島(2002 年 10 月)、印尼雅加達(2003 年 8 月及 2004 年 9 月)、菲律賓(2003 年 2 月與 2004 年 2 月)。由於愈來愈走向組織國際化，而且攻擊的對象通常是「軟」目標和平民，恐怖主義造成的傷害幾乎到了無法令人接受的地步，並嚴重地威脅政府的公信力，無法保護人民。這種非對等戰爭(亦即，恐怖份子在暗處，其攻擊對象則在明處，從軍隊、警察、政府官員到一般平民百姓)的興起、擴散和效率主要是受到幾項因素所助長：新傳播溝通技術的推陳出新、人民自由遷徙的擴大、全球企業網絡的利用、以及傳統匯款的全球化。東南亞地區的伊斯蘭恐怖份子(團體)已有復甦的跡象：1980 年代興起；1990 年代勢力擴大。其壯大的因素可歸咎於：複雜的地理形態、可輕易滲透的

²⁶ 柯林頓政府「南海聲明」文件(1995 年 5 月 10 日)，“Spratlys and the South China Sea”，http://dosfan.lib.uic.edu/ERC/briefing/daily_briefings/1995/9505/950510db.html .

邊界、國家的軟弱、伊斯蘭的叛亂、以及族群的鬥爭。雖然東南亞伊斯蘭恐怖份子不但與整個東南亞地區而且與中東國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埃及、葉門、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都有密切的連繫，但是他們的活動還是主要以本土(本國)區域為目標而擴散，並從過去的叛亂事件作為其正當性來源，如印尼 1950 年代的千禧年達魯(Darul)伊斯蘭運動。自峇里島爆炸事件後，印尼政府通過了反恐怖主義法，並加速行動反恐。同時，東協國家間不同的反恐協定已強化和改進彼此情報的分享。例如，菲律賓、印尼、馬來西亞、柬埔寨和泰國於 2002 年簽定協議，共同掌握航空旅客名單、著名罪犯黑名單、電腦化的手印資料庫，以及強化邊境巡邏。不過，東南亞國家之間簽定的各種反恐及打擊罪犯的條約，都未包含引渡條款。²⁷

由於東協各國對恐怖主義威脅的認知以及集體認同的意識彼此間不同，反恐的合作也因而降低。簡言之，各國對主權的保護仍為東協的規範。2007 年 1 月於菲律賓舉行的宿霧(Cebu)高峰會把東協反恐會議列入議程。儘管會議中有共識，可說是在反恐合作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內容則包含鼓勵成員國同意引渡並各自立法交換情報，但獨特地是，最後簽署的文件則希望，根據新加坡、印尼和馬來西亞三國經驗，讓被逮捕的恐怖份子能身心重建，重新整合入到他們自己的社會中。也就是說，期待東協各國在反恐合作及行動上有重大的突破也許言之過早。

固然分離主義、族群-宗教鬥爭仍維持與恐怖主義之間的連繫，但僅在部分地區，並不是全部。東南亞的分離主義和族群-宗教的暴動於 1990 年代湧現，但大都已經平息或恢復和平。印尼的情況日見好轉，緬甸的分離主義也逐漸式微。東南亞海域的海盜行為雖然目前非常猖獗，但其與分離主義團體及恐怖份子凱達(Al-Qaeda)組織沒有明顯的關聯。比較明顯的是，分離主義與國際犯罪相互勾結。

國際遷徙也成為東南亞安全的問題。目前保守估計，大約 7 百萬到 8 百萬的移民在東南亞地區。印尼同時成為從中東地區「路過」到澳洲的轉接地。由於這種不正常的大量移民，尤其是從印尼到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定期地驅逐非

²⁷ 美國在亞太地區戰略有三個主要的支柱：降低主要戰爭的風險，維持安全競爭在可控制的範圍內，追求開放的市場並與在這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年代中，寬廣的美國經濟戰略相連貫。參閱 Thomas G. Moore, "In pursuit of open markets: U.S. economic strategy in the Asia-Pacific", *Asian Affairs* 28(3):170-179, Fall 2001.

法移民已經拉緊兩國之間的緊張關係。而且，許多移民是透過假公司偷渡非法打工，因此，受到雇主虐待和當地政府逮捕的新聞不絕於耳。其他跨越國界的非傳統安全性威脅則是環境問題，如罩霧、生物多樣性減少以及氣候變化。這些現象起因於非法砍伐與亂砍燃燒農業(swidden agriculture，過去以印尼為主，估計印尼涉及的範圍達1100萬公頃、6百萬人參與)，結果不僅導致鄰國的呼吸疾病顯著增加，而且造成無以估計的經濟損失。外來旅客受到「急性嚴重呼吸併發症」(SARS,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感染的病例增加，旅遊業一度蕭條，而同時愛滋病毒／愛滋病的蔓延仍在緬甸與中南半島國家不斷增加。因為缺乏國際合作和政府有效的回應，這些安全上的威脅有增無減。相對於1992-93歐洲貨幣體系危機，東南亞地區的經濟危機要嚴重得多。²⁸

1997-98的亞洲金融危機及社會-經濟的震盪似乎可與1930年代的經濟大恐慌相比。雖然東南亞國家採取某些措施方案以改革其企業部門及金融體系、建立金融監督制度、並達成「清邁協定」(the Chiang Mai Initiative)，但許多因危機而引起的國內問題仍未根本解決。儘管「東協社會安全網工作小組」(ASEAN Task Force on Social Safety Nets)已經設立，但仍屬於初始階段，發揮功效不大。再加上，經濟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邏輯鼓吹政府削減社會福利計劃(也就是少做，留給市場機制運作)，在這種趨勢下，東南亞各國要有所作為困難不少。

針對非傳統安全所帶來的威脅，東南亞地區的國家在因應上沒有什麼多大的進展，特別是處理國際移民、環境惡化、以及瘟疫(威脅程度較前兩者為低)等方面的問題。除了出現一些知識社群(epistemic communities)和第二軌道(Track Two)召開相關的會議外，這些議題仍傾向於由個別國家自行處理。即使當東協部長會議在討論這些議題時，他們幾乎沒有超出「非約束性宣言」(non-binding declarations)，類似於所謂的「原型範則」(proto-regimes)，只強調某些共同的原則，但通常不會超越這種早期範則建立的階段。同樣地，分離主義縱使可能會產生跨越國界的後果，但東南亞國家仍認為，這種威脅應當由各國自行解決並最好用軍隊將之瓦解。雖然印尼與馬來西亞曾調停菲律賓政府與摩洛(Moro)人民解放陣線之間的衝突(於1996年雙方簽訂和平協定)，泰國和菲律賓也介入印尼亞齊特別行政區分離運動的爭端(2005年7月17日印

²⁸Philip Bowering, 「南海地區的權力平衡」, 國家政策雙周刊, 第96期 1994年10月。

尼政府與分離主義份子在芬蘭達成和議)，但東協國家仍然迴避多邊調解。一般而言，東南亞的政府們，尤其是他們的安全部門，未能認識到這些衝突的高度複雜性本質和其背後的認知過程。衝突通常是由先前的互動、社經的分歧、政治文化歧視的經驗、以及單一創痛事件所結合而成。每當族群之間的關係惡化時，這些因素就會如影隨形地刺激了集體記憶的復甦，而造成一發不可收拾的慘劇。²⁹

東南亞國家罔顧個人安全的結果在2004年12月26日海嘯(tsunami)事件得到應驗，至少23萬人喪生、失蹤。印度洋邊緣國家，不像太平洋沿海地區，到目前為止一直未能建立一個海嘯預警制度，提早告知當地政府迫切的危險即將踵至，可挽救上千上萬人的性命。另外，1980年代起，專家們就已經預測，安達曼海(Andaman Sea)區域被認為是高風險區，海底地震會帶來毀滅性後果。然而，目前也沒有任何區域性合作以防止該地區災變出現。如果萬一不幸發生海震，到時就悔不當初沒有相互合作、及早做準備了。國家主權在東南亞國家討論安全時仍為最重要的核心價值，即使在面臨亞洲金融風暴帶來的壓力下也是如此。泰國和菲律賓提議的「彈性接觸」(flexible engagement)也因為得不到其他盟友的認同和支持而無疾而終。無獨有偶地，2004年印尼也拒絕了成立東協維持和平部隊的建議。而區域性人權機制更不用說，毫無一點跡象。2004年12月的東協萬象(寮國首都)高峰會議上通過了萬象行動計劃(the Vientiane Action Program，從2004到2010實施)。其中指出，和平、穩定、民主、和繁榮是支持東協安全共同體的主要價值。不過，空有華麗的詞藻和美麗的願景而沒有真正的實踐，也是枉然。

中共在南海問題上的一貫政策是“主權歸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這一政策使爭議雙方有可能將注意力放到經濟的優先發展上來從而有利於將雙方引向和平解決爭端的軌道上來，“共同開發”也可以避免南海問題被美日等國利用。為此，中共在經濟、外交上進行了不懈的努力，簽訂了中、菲、越《在南中國海協議區三方聯合海洋地震工作協議》，發表了中越雙方《聯合新聞公報》，但從目前南海各國所發生的事端來看，這些條約、公報都只是象徵性的，並沒有實質的約束作用。中共的政策之所以沒有達到預期的目標，其原因在於：

²⁹Richard E. Hull, “The South China Sea: Future source of prosperity or conflict in South East Asia?”, 1996, <http://www.ndu.edu/inss/strforum/forum60.html>。以及 Richard D. Fisher, Jr., “Rebuilding the U.S. – Philippine Alliance”,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February 22, 1999。

1. 大國的介入，南海地區國際形勢複雜。南海各相關國家為造成既成事實，加緊對南海資源的開發，借助美日等國家的力量抗衡中國；其次，南海是重要國際貿易通道，主要各國（美、日、印、歐）在此有重要利益。而且，隨著國際局勢的變化、地區不穩定、中共的崛起，美國加緊對中共的遏制等因素，利益糾纏，國際形勢複雜。

2. 南海爭端複雜。南海的爭端，不僅僅在於南海相關國家對南海的資源開發，更在於對中共主權的侵犯，使“主權在我”的前提形同虛設。各國在所佔的島嶼上修築機場、跑道、燈塔，並通過各種海基法案，無視中共的一再警告，肆無忌憚地侵犯中共主權。

3. 南海各相關國家在南海問題上共同合作，抗擊中共，使中共面對一個國家利益集團，外交上十分被動。顯然，要解決南海問題，必須排除或者最大可能減少美、日等國的幹預，加強軍事建設，分化瓦解東南亞各相關國家，爭取各個擊破。經濟、政治、軍事、外交四政策的要素及其可行性：

1. 經濟政策

歷史上，德國首相俾斯麥曾經用經濟手段達到加緊聯絡德意志諸邦、孤立奧地利的目的，並最終通過三次王朝戰爭統一了德意志聯邦。今天的歐盟，也正走著通過市場的統一走向政治的統一的進程中。古今歷史的經驗表明，經濟決定政治，市場的統一使雙方休戚相關、產生共同利益，最終導致政治上的統一。這是值得我們在南海問題上進行借鑒的。而日後在南海爭端激化的情況下，則也給中國增加了一份籌碼，中共可以在必要的時候對南海各相關國家進行經濟制裁，這對於經濟上嚴重依賴中共的相關國家來說，將造成極大打擊。³⁰

但是根據赫克歇爾－俄林的資源稟賦理論，中共與東協各國在人口、科技等方面的稟賦差異不如東協與美國那麼明顯，中共於東協處於同一國際市場梯次，傳統經濟領域的經濟分工與合作對東協吸引力不大。在國際社會，中共生產的那些基於科技地段、勞動力密集型的產品（如紡織品、玩具等）甚至與東協相關國家存在競爭的局面。中共應當積極與東南亞努力建立共同開發海洋資源，尤其是油氣資源開發的合作機制，在不同的國際市場梯次中實現進一步的合作。以“海洋開發為例，如果各國能夠從海域管轄權劃分、油氣田勘探開發、

³⁰ 宋燕輝，「南中國海之領土爭議與亞太安全：中共之威脅」，後冷戰時期亞太集體安全（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年。

資金投入、技術開發、產品加工等多個層面探討對爭議海域油氣資源的共同開發問題，那麼在外部環境日益改善的前提下，南海問題爭議各方將很可能在海洋資源開發領域形成多領域、深層次的合作。”一旦這種合作形成，經濟的力量將把東盟與中共緊緊捆綁。而隨著南海相關國家在這一領域經濟利益不斷擴張，它將很難離開南海。而中共根據現有的南海開發狀況，保持對南海資源的較低依存度，就可以使中共在南海爭端激化時遊刃有餘，處於相對優勢的地位。

其次，中共應加強同其他國家如美國、日本、歐盟等的經濟聯絡，因為當面對巨大的經濟利益，任何一個國家都不會輕易對中國進行經濟制裁，發展與中亞、俄羅斯、非洲的友好關係，保證石油進口管道多元化。相比較純粹軍事行動的政策而言，使用長久而漸進的經濟政策顯然不損國力，不傷東南亞各國人民的感情，不引起國際輿論對華的指控和世界大國對華的在政治經濟外交上的孤立。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³¹

2. 外交政策

在南海爭端中，美國絕對是一個不可忽視的區外角色。中共欲解決南海問題，首先必須排除或者儘量減少美國在此區域的干預和對中共在南海行動的阻撓。在地緣經濟、政治戰略的影響下，出於對海上貿易通道、南海油氣資源等的考慮，美國積極干預南海問題。美國通過與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的軍事合作，加強在此區域的軍事存在，爭取在此地的安全主導權，以南海問題為契機打壓中共的崛起。進入 21 世紀以來，美國和東南亞國家合作展開的軍事演習更顯頻繁，“肩並肩”、“金色眼鏡蛇”、“卡特爾”等的展開，使中國南海的周邊環境急劇惡化。中共的崛起必將影響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利益，排擠美國在東南亞的勢力，因而美國與東南亞的軍事合作，其戰略意圖是十分明顯的，即構成東南亞-台灣-朝鮮半島三位一體的“環形島嶼鏈”，從而達到壓縮中國向太平洋發展的戰略空間，遏制中共的崛起的目的。而南海相關國家也正好借美國之力打壓中國，雙方於是一拍即合。

但是中共實力的增強和在國際上政治大國地位的確立是無法遏制的，美國急需中共在諸多重大國際事務中對其予以支持。因此，中共對於美國的外交政

³¹ 佐藤考一著，李明峻譯，「南中國海的國際關係：『中國威脅論』與東協」，東南亞季刊，第 2 卷第 2 期，1997 年。

策應當由如下構成：1. 盡可能發展與東協各國的友好外交關係，如召開“東盟外長會議”、“東協首腦會議”，發展“東協 10+3”等經濟合作，排擠美國在此區域的勢力；2. 在朝核問題、伊朗核問題、反恐等重大外交事件上對美國予以合理的支持，以要求其在南海問題上對中共的支援。此外，因儘量發展海軍，弱化美國在此區域的軍事優勢。

對於日本，則首要應在外交上承諾保證其南海貿易航線的安全，以此力爭其對南海問題上持中立態度。明治時期日本外相伊藤博文曾經說過：“在實力相當時，外交就是力量；在實力懸殊時，力量就是外交。”國家利益和國家力量決定外交政策。軍事上的支持對於此類事關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的外交談判的勝利是不可或缺的。中共在南海問題相關談判中的最主要目標是確立中共對南海島嶼的主權。中共必須加大外交斡旋，採取各個擊破的方式，以支援其對南海資源的開發為誘餌，逐一展開對南海相關各國的外交攻勢，力求通過經濟和軍事上的壓力，迫使其對南海（尤其是南沙諸島）主權歸我的外交要求達成妥協。之所以必須採取各個擊破的方式，原因在於如果東盟相關國家出於其共同利益的考量，達成外交一致，這對於中共在外交談判桌上的形勢將極為不利，一個國家對抗一個國家利益集團，其資訊之不對稱不言而喻。畢竟對於東南亞相關國家來說，少一個分蛋糕的龐然大物顯然更加符合其國家利益。³²

3. 軍事政策

首先，應加快建設航母、新型核潛艇和大型海上作戰艦艇，加強遠洋作戰能力。綜觀二戰以來海戰經驗，以制空權奪取制海權是歷史發展之必然。以中共目前的海空軍實力，尚不具備遠洋作戰的能力（嚴格來說，打擊海盜並不算是遠洋作戰），完全無法與美國抗衡。一旦美國介入南海事端，則中共將處於極端劣勢的地位。中共海軍之所長僅在近海作戰（有沿海空軍、陸軍和二炮部隊的支援），而遠洋作戰，非有航母不可。中國一日無航母，則一日不可輕易與日美交惡。

其次，中共若對東南亞相關國家中的某一國發動戰爭，考慮到唇亡齒寒，相關國家極有可能相互聯合，共同抗擊中共海軍在南海的軍事行動。而美國、印度等國出於對華遏制政策的考慮，日本出於對海上生命線安全的考慮，極有

³²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94-95, Fareed 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可能出兵幹預，屆時中共將處於極端惡劣的軍事環境，這對於中共的經濟建設、海軍發展將是一場災難。戰爭只因當是政治的延續，單純以軍事手段解決南海問題可以說是下策。

第三，與南海各相關國家展開廣泛的非傳統安全的合作，促進軍事互信，通過軍事合作，打擊該海區的海盜，展示中國海軍實力，對南海各相關國家產生威懾作用。

4. 政治策略

中共首先應通過政治、經濟、文化乃至軍事各領域加強與台灣的友好關係。第三次“陳江會”簽署三協議、發表一個共識，宣佈將開通兩岸定期航班、就大陸資本赴臺投資達致共識，兩岸“三通”已經全面實現。大陸與台灣關係的友好發展，可以逐漸打破美國對華的軍事遏制，而且，兩岸的友好發展將大大有利於南海問題的解決。大陸應力求與台灣達成共識，在軍事上加強合作。甚至共同在太平島駐軍，這對於南海相關國家的威懾力是不言而喻的。其次，加強全國人民的海權意識，保證中共在南海問題上有足夠的群眾基礎，減少在非正常時期的輿論壓力和政策執行難度。

以上4個政策，當然是不能割裂來實施的，其中經濟合作和軍事建設將貫穿整個南海問題解決的過程，外交斡旋以求突破是其重點，獲取國際輿論同情是外交輔助，排除或減少美日壓力是關鍵，與台灣達成政治和解與合作、中共在這4方面的政策應當相互配合、相互促進，共同在南海問題上發揮最大的作用。³³

在冷戰後世界日益一體化的今天，南中國海爭端註定要與亞太國際格局緊密聯繫在一起資源豐富、戰略地位重要的南中國海日益成為美、日、俄、印甚至歐洲國家都試圖加以影響和控制的地區，區域外大國都把東亞作為開展外交的主要地區之一，區域外大國在該地區縱橫裨闔，合縱連橫，演繹出一幅幅動態的國際格局美國實力最強，在該地區佔有絕對優勢但近來美國影響似有降低的跡象，如2003年10月召開的亞太經合組織首腦會議上，美國與該地區國家對該地區發展趨勢出現分歧，布希“看到的是一個以反恐戰爭為主線的美國世

³³Charles Krauthammer, "Why We Must Contain China," Time July 31, 1995, Gideon Rachman, "Containing China," Washington Quarterly 19, no. 1 (Winter 1996), Gerald Segal, "East Asia and the 'Constraint' of Chin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no. 4 (Spring 1996), Arthur Waldron, "Deterring China," Commentary 100, no. 4 (October 1995).

紀當亞洲人展望未來時，他們看到的是一個亞洲世紀，其主線是經濟的蓬勃發展和中國作為超級大國的崛起，而反恐戰爭只是細枝末節”。所以美國希望亞洲盟國加入反恐戰爭、與朝鮮對抗、擴大太平洋兩岸貿易、促使中日兩國提高本國貨幣匯率的要求都未能得到亞洲盟國的積極反應。但不管怎樣，只要美國仍然是世界唯一超級大國，它在南中國海地區的主導地位就不會改變；只要中共國力繼續上升，以中共為戰略對手的東亞戰略就不會改變，其干預南中國海爭端的意圖就不會變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日本未來走向政治、軍事大國的趨勢不可避免日本在南中國海地區的政治、經濟、安全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與美國重合，尤其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線”有賴美國的保護。

目前，在東南亞地區“日本的經濟影響力很大，但在其他方面的影響力卻不大”，日本在成為政治、軍事大國之前必然緊隨美國的步伐，也會利用自身的經濟力量對南中國海地區施加影響。冷戰後俄羅斯國力遠不如前蘇聯，奉行戰略收縮，但仍是南中國海地區的一支重要力量。目前，俄將中共作為其外交的主要方向之一，對中國的政策比其他亞太大國較為友好，雙方結成戰略協作夥伴關係，但對中國抱有戒心，不可能在南中國海爭端採取支持中共的政策。俄的最終目標是成為世界大國，其遠東地區領土的完整、邊境安全、經濟發展及面對西方外交的壓力時都離不開中國的支持，在可預見的一段時期內，只要中俄雙邊關係不出現大問題，那麼俄在南中國海地區應該不會成為中共的掣肘。東盟作為東南亞地區的國際組織，無疑會維護其成員的利益。目前東協在南中國海爭端中一直要求各方和平解決爭端，並代表東南亞爭端國與中共進行多邊談判。但另一方面，東協介入南中國海爭端也有積極的一面。東協組織的目的是促進該地區各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維護成員國的安全，要達成這些目的離不開中國的支援，所以，東盟必會阻止或不支持其成員國在爭端問題上採取過激行動，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東盟可充當中共和東南亞爭端國之間的潤滑劑。從以上分析來看，就南中國海爭端來說，亞太國際格局一個最大的特點是它的動態性、不確定性，或者說還未定型。

這既是挑戰，也是機遇，說明亞太國際格局具有可塑性。亞太國際格局使中國在南中國海爭端中面臨著較大的挑戰，美日是影響南中國海爭端最大的外部因素，也是最不利的因素，它們有意圖也有實力對該爭端產生影響。而且在美日同盟的框架下，它們極有可能採取聯合行動，這是亞太國際格局能對該爭端產生影響的根本原因所在。中國排除這個同盟干預的可能性極小，但也不是無

所作為，一個可努力的地方就是盡可能地阻止這個同盟的擴大及最大限度地分化這個同盟。因為在干預爭端時，美日可能會借某一個具體的問題諸如中印、中俄及中共和東協之間的某個具體事件對中國與這三者的關係所帶來的負面影響謀求俄、印、東協進行策應，或者利用自己的影響力要求俄、印、東協採取相應步驟，各方就南中國海爭端形成針對中國的非正式聯合，或者說是同盟應該說，出現這種可能性的前景極小，但也不是完全沒有可能，20 世紀 60 年代中國周邊環境的惡化至少說明這種前景曾經出現過，只不過當時南中國海爭端還沒有爆發在分化美日同盟方面，中國應儘量向日本保證南中國海國際航道的自由通航，消除日本對“海上生命線”的擔心，利用東協 10 十 3 會議，加速東亞地區的經濟統合，日本畢竟在東亞地區，經濟上的相互依賴能減緩日本緊跟美國的步伐，而且中國目前也無實力像美國那樣對俄印進行壓制。

儘管中國正在崛起，俄印國內也存在“中國威脅論”，但應該說中國還不是俄印現實的威脅，中共目前正在提倡的“和平崛起論”對它們來說應該也是一個寬慰因此，俄印具有在中共和美日等西方國家之間進行平衡外交的便利，它們不會與美日聯手共同反對中共對南中國海的主權，雖然在某個時候它們可能與美日或東南亞爭端國在這個問題上呼應一下，但絕不會像美日那樣上升為一項長期戰略，它們是否介入爭端及介入的力度取決於中國與它們的雙邊關係，也和它們與東南亞爭端國的關係有關。是否介入南中國海爭端可能成為它們對華關係中的一張牌因此，儘管它們不可能支持中國的主權要求，但中立是可能的 東協是南中國海爭端中的另一個變數，不過礙於要維護成員國的利益，變化的幅度不如俄印大東盟有維護其成員國利益的意圖，但缺乏像美日那樣的足夠實力中日之間的結構性競爭使東亞地區難以存在一個單獨由中共或由美日（二者在很大程度上重合）主導甚至控制的安全框架或國際會議，在這種情勢下，選擇一個與雙方矛盾都不大的較弱的第三方作為商討東亞地區安全形勢的場所成為東亞大國可接受的選擇，因此，東協雖以建立“和平、自由、中立區”為宗旨，排除外部勢力對本地區的干涉和爭奪，但東盟地區論壇又使東協本身成為大國之間的緩衝區域，各大國競相與東盟發展友好關係，因此，東協基於大國平衡策略考慮而組織的東協地區論壇使東盟也處在平衡者的位置上在南中國海爭端中，東協始終處於一個矛盾之中，一方面，南中國海爭端事涉成員國的領土領海主權這類國家根本利益，東協不得不予以維護，但單獨依靠自身力量又難以達到目的，因此，將爭端國際化是東盟的必然選擇，俄印在東協國際化

的策略中作用不會太大，國際化的主要對象是美日，這正好給美日以牽制中共的機會，但美日的目標不僅僅是在南中國海爭端中牽制中共，而是要阻遏中共的整體發展，這必然遭到中國的反擊，隨之而來的是美日與中國在該地區的爭奪，而這恰恰是東協所力圖避免的。

東盟希望的是既要達到維護其成員國利益的目的，又要避免被美日當作遏制中國的棋子，這決定了東協必須將國際化戰略限制在一定的範圍內所以，在南中國海問題上，東協作為一個組織與美日聯合的可能性也不大，除非中共一東協關係全面惡化。由於蘇聯解體，綜合國力上升，中國成為世界主要大國之一，尤其是在東亞地區影響力大增。但由於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等原因，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將注意力轉向中國，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成為國際社會矛盾的主要一方，受到西方國家的壓力比較大“9·11”事件以來西方國家將注意力轉向國際恐怖主義，中共受關注的程度有所降低到目前為止，在南中國海爭端中，中共面臨的國際環境不如冷戰時期對中共有利，尤其是俄、印在美國等西方國家與中共之間採取平衡外交的情況下更是如此。因此，中共應利用自己日益上升的影響力塑造出一個有利的國際格局，力圖爭取俄、印中立，利用東協的潤滑劑效果，儘量降低美日的介入程度，以一種有利於中共的方式解決南中國海爭端是完全可能的中共為解決南中國海爭端，維護領土主權所制訂的對外政策都應該圍繞這個基本判斷來進行。目前，爭端各方一直在進行談判，爭端朝著和平解決的方向發展，但因涉及主權、安全、經濟與長遠戰略利益，南中國海爭端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難以獲得最後解決，這並不意味著爭端國之間就一定不會爆發衝突，阻止衝突爆發的各種因素一直存在，並呈現增長的趨勢。

除了主權爭端外，南中國海周邊各國在有關南中國海問題上還存在諸多合作因素如環境惡化和海盜猖獗等問題。儘管南中國海周邊各國政府在治理南中國海環境方面表現出迫切性，但僅僅表現出一種熱情和友好態度，在行動上還未出現聯合因此環境惡化並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各國漁民繼續無節制地捕撈，珊瑚礁和紅樹林破壞嚴重；海上運輸、沿海地區工業化和城市化繼續給沿海地區帶來污染；狹窄的國家利益和權力政治仍是國際關係的主題，環境治理仍然處於不合理的狀態。另外，海盜問題也是令南中國海周邊國家頭疼的問題，嚴重地影響各國的經濟發展南中國海地區存在著大量的海盜襲擊事件，經過該地區的船隻受到海盜的嚴重威脅全世界幾乎3 / 4 的海盜襲擊發生在亞洲，而這

其中又有超過 1 / 3 的海盜襲擊出現在印尼海域、麻六甲海峽和南中國海的南部地區。海盜活動給船運帶來的威脅越來越大，如果周邊國家不對海盜採取聯合行動，海盜問題就不可能得到解決。所以，環境問題與海盜問題的跨國性要求周邊各國必須聯合起來共同治理，這是促進爭端各國採取和平方式解決爭端的一個重要推動力。通過“處理南中國海潛在衝突研討會”，海洋科學家逐漸得到各國政府決策者的注意，影響越來越大。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關於南中國海戰略行動計畫也得到東協成員國和中共的認可，南中國海作為動物蛋白質來源對沿海居民生活所具有的重要性一旦被爭端各國所認識，那麼，對環境的關注就能把爭端各國帶到一起商討如何和平解決領土爭端以保護南中國海資源，就所有各方來說，衝突的代價大於合作所帶來的利益。衝突將使各國關係處於緊張狀態，既不利於東協在國際上發揮影響，難以通過東協地區論壇保持亞太地區安全事務的主導權，也不利於中國開展對外友好關係。同時，該地區經濟的高速發展，對能源需求的越來越大，爭端的僵持狀態使得對該海域的能源開採難以進行，不利於各國經濟的發展，部分爭端國已達成協定進行聯合開發或已就部分爭端地區達成解決辦法。說明這些國家已開始認識合作與和平解決爭端的必要性。

2000 年 12 月中越達成的海洋協定中雙方對邊界都作了妥協，中共放棄了一些歷史性漁權，相對於以前的主張，越南也放棄了對部分海域的主權要求。而且，目前每天石油開採量每天約 250 萬桶，馬來西亞產量約占整個產量的一半，而且日產量過去幾年來一起在上升。因此，爭端國之間保持一種僵硬立場並未阻止各國競相開發石油，與其保持僵硬立場眼看他國開採石油，還不如通過談判聯合開發各方都得利。應該說上述因素都是促進各國進行合作和平解決爭端的推動力，但真正要使這些因素發揮促進和平解決的作用，關鍵還取決於各國政府對主權爭端的認識和未來社會前進方向和國際關係主題的發展變化。例如，在環境問題上，南海周邊國家是相互依存的，因而未來環境安全能扮演推動南海國家進行整合的動力。但如果周邊國家未能找到一個合適的辦法來解決環境問題，它們也必將陷入暴力衝突。

一般說來，環境的相互依存既是衝突的源泉，也是促進地區整合的潛在因素。但環境問題到底如何發揮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各國政府決策者怎樣看待形勢的發展。如果各國政府如看待安全問題那樣看待環境問題，它們就可能在議事日程中提高環境的重要性，以合作的方式找到各方都可以接受的解決辦法。

在看待主權問題上，國際關係的發展是否會使各國對主權有新的認識是決定未來該爭端和平與衝突的一個關鍵因素，是堅持僵硬的主權觀念還是根據國際關係的發展趨勢對主權觀念有新的闡釋是決定能否和平解決的變數，但目前未出現這樣的苗頭，個別爭端國甚至還在擴展對爭端海域的主權管轄範圍。³⁴

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57 條的規定，島礁主權的擁有者可建立 200 海哩的專屬經濟區，而根據聯合國海洋法公約第 76 條第 5 款的規定，擁有大陸架的沿岸國家還可將專屬經濟區延伸到 350 海哩的海域，目前有報導稱菲律賓試圖建立 350 海哩的專屬經濟區，如此則將使爭端更趨激烈。目前，雖然爭端國之間都在各種場合進行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談判，但應該說南海爭端處於“蟄伏”狀態，各國都在致力於經濟發展與合作，尤其是中共和東協之間的經濟合作使得南中國海領土爭端在中共與東南亞國家的外交議題中被“邊緣化”了。只要上述積極因素繼續發揮作用、中共與東協國家及東盟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進展順利、東南亞爭端國國內政局穩定保證南中國海爭端不會被反對派用作攻擊政府的工具，則南海問題就有繼續被“邊緣化”的可能，從而為南海爭端的解決提供和平的環境。

34 宋燕輝，「南沙島嶼主權爭議與南海國際航行問題」，國家政策雙周刊，第 116 期，1995 年 7 月，頁 12-14。

第五章 東亞諸國對中共東亞安全政策的回應

1991年東南亞國家國協(ASEAN, 以下簡稱「東協」)與中共建立對話關係。歷經16個年頭, 中國政治與經濟實力提昇以及中共在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後所採取的各項協助措施, 促進了東協與中共關係的發展, 雙邊以務實的合作態度取代過去的相互對抗。在政治上, 中共陸續簽署認可「南海各方行為準則」(The Declaration of the Conduct of Parti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與「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ASEAN's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增進了東協對於中共的信任與了解。隨著雙邊與多邊會晤機制逐步完善, 以及對國際事務看法日漸一致, 雙方已建立起所謂的「戰略夥伴關係」。¹在經濟方面, 東協除了持續推動與中共之間的自由貿易區整合外, 雙邊經貿的往來亦日益密切。2006年, 東協與中共貿易額達至1608.4億美元, 較2005年成長23.4%。2007年雙邊貿易額更突破2020億美元, 成長高達25.9%, 為中共第四大貿易夥伴。由於相鄰的地緣結構與中共崛起的國際環境, 東協各國自然無法忽視中共對其經濟發展的重要性, 因而有「中國機遇論」說法的出現。

第一節 美國的回應

一、美國的東亞戰略

有一些學者批評美國在後冷戰時期缺乏像圍堵政策那麼清晰的全球戰略, 在缺乏指導方針的情況下, 東亞戰略也因此顯得鬆散。在冷戰結束初期, 美國新孤立主義抬頭, 不斷自全球各地撤軍, 東亞地區也不例外。冷戰剛結束時, 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駐軍超過十五萬, 至一九九五年已經減少到十萬。此外, 美國一反昔日反對在亞太地區成立多邊安全機制的立場, 對東協區域論壇的成立表示支持及願意參與。²隨著美國經濟的復甦, 美國國內的國際主義又恢復活力,

1. 岳德明, 「中國南海政策爭議」, 戰略與管理第3期(2002年), 頁55。

2 「熊光楷闡述中國反恐基本政策」, 2003年2月8日, 出席第39屆慕尼黑國際安全政策會議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熊光楷上將在會上作題為「當前全球反恐形勢及其前景展望」的發言, 闡述中國以新安全觀為基礎所確立的反恐基本政策。http://news.xinhuanet.com/ziliao/2003-04/09/content_823686.htm

自東亞撤軍的政策在一九九五年被扭轉，美國承諾在東亞地區維持十萬駐軍。

基本上，美國東亞戰略的目標在於提升民主力量和促進區域安全，當然經濟利益也是一項重要的考量。在提升民主力量方面，美國希望藉由提供東亞一個安全環境，讓民主政治能在東亞國家生根。就促進區域安全而言，美國希望能夠防止核武或其它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擴散、支持多邊安全機制的建立、促進雙邊或多邊安全對話、在前進基地駐軍、敦促衝突的國家以和平方式來解決爭端。但最主要的是美國與亞太國家所建立的雙邊同盟體系，其中美日同盟是這個同盟體系的基石，美澳同盟是另一個重要支柱，加上美韓、美菲、及美泰同盟，構成美國在亞太地區的雙邊同盟體系，藉著此一同盟體系，美國繼續享有在亞太地區安全事務上的主導地位，並防止在歐亞陸塊出現與美國敵對之霸權或強權的集團。³

可能挑戰美國東亞戰略及國家利益的因素包括俄羅斯未來的可能再度崛起、部分東亞國家可能出現內部動亂(像印尼)、北韓發展核武或對南韓採取軍事冒險行動、中共的崛起、南海主權爭端升高衝突、台海地區發生戰爭、南北韓統一並要求美軍撤退、中共與俄羅斯的軍事合作、日本人民要求美軍撤退等。為了因應這些挑戰，美國強化在亞太地區的同盟關係、要求日本及澳洲承擔起更大的責任、推動國家飛彈防禦系統(national missile defense system)及東北亞戰區飛彈防禦體系(theater missile defense system)、對北韓恩威並用以防止其發展核武器、對北韓採取強硬政策以挫折南韓的統一攻勢、以四方會談來緩和朝鮮半島之緊張情勢、加強與東南亞國家之合作或聯合軍事演習以穩定東南亞及南海情勢、提供台灣防衛武器、以預防外交(preventive diplomacy)策略台海地區發生戰爭。⁴

二、美國對中共的認知

自尼克森展開與中共關係正常化以來，美國與中共的交往已經走過三十年，但是雙方的關係卻一直起伏不定。一九七〇年代，兩國在對付蘇聯威脅的平行

3「江澤民在2002年新年賀詞中談臺灣問題」，「人民日報」2002年1月1日；「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2002年6月8日，中國外交部網站，<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zt/zt2002/2326/2328/t10896.htm>；中國國防部長曹剛川出席“國際反恐形勢與反恐合作”研討會上的講話，「新華社」北京，2004年5月13日電。

4王毅：「新挑戰、新觀念—國際反恐鬥爭和中國的政策」；「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宣言」，見中國外交部網站。

利益考量下，結束敵對、進行交流甚至展開針對蘇聯的一些情報合作，進而於一九七八年底宣佈建交。一九八〇年代雷根執政時期，重新評估中共的戰略價值，認定中共對美國不具全球戰略重要性，而中共適時採取所謂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雙方關係進入冷淡期。老布希於一九八九年上台後原本積極推動對中共的交往政策，但是該年發生中共屠殺青年學生與工人的天安門血腥事件，迫使雙方關係倒退，布希政府在全球輿論及國內壓力下，宣佈停止對中共的官方交流，同時對中共進行經濟制裁。柯林頓擔任總統的八年期間，先是對中共採取強硬政策，將中共人權狀況與是否給予中共最惠國待遇問題掛鉤，後來則改採對中共積極交往政策，並在江澤民於一九九七年十月訪問美國時，雙方同意推動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隨之建立各種層次之交流、對話管道。然而，雙方關係因一九九九年五月美國誤炸中共在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而受損，同時美國偵察機與中共一架殲 8II 型戰機在南海上空發生擦撞事件，使雙方關係雪上加霜。

就美國而言，中共的國家力量逐漸壯大是一個事實，但是中共是否有資格成為與美國平起平坐的同輩競爭者(peer competitor)?究竟中共是競爭者或戰略夥伴(strategic partner)?則是美國學者和戰略專家持續辯論的問題。⁵一般的看法是中共在短期的未來沒有能力挑戰美國，⁶但是如同麻省理工學院政治系教授 Thomas J. Christensen 所指出，縱然中共無法在軍事力量上追上美國，中共可藉擁有一些新的設備和戰略來對美國造成重大問題，尤其對台灣和在東亞地區對美國之安全戰略構成重大的挑戰。⁷

雖然中共對美國的東亞戰略及國家安全利益構成挑戰，而且美國與中共在文化、價值觀、政治體制等凝聚雙方關係的軟件上卻無一契合，這些矛盾的價值與利益使雙方的關係非常脆弱，問題是美國與中共在全球、區域、及雙邊層次上亦具有共同利益。一方面，除了台灣問題之外，美國與中共在人權、西藏問題、建構國家飛彈防禦系統、中共輸出核武技術和飛彈等問題上具有衝突的利

⁵Thomas J. 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China's Rise and Challenges for U.S.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4 (Spring 2001), p. 5.

⁶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Alastair Iain Johnston,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July 26, 2001.

⁷Christensen, "Posing Problems without Catching Up," p. 7.

益；另一方面，美國與中共雙邊貿易額接近一千億美元，美國仍然需要中共這個聯合國常任理事國的合作來維繫全球的和平，而且在朝鮮半島、台海及南海地區、南亞等潛在區域衝突上，需要中共自我約束或配合來避免發生衝突。此外，美國在一些「低安全(low security)」範疇，像打擊毒品走私、管制非法移民、對抗組織性犯罪、管制走私武器、維護環境生態等問題上，需要中共的合作。⁸這種既衝突又合作的現實，導致美國與中共關係高低起伏不定，也導致美國國內對中國政策的長期辯論，有的學者主張交往政策，也有一些學者專家主張圍堵中共。但是不管這些專家學者如何看待中國政策，他們沒有人對中共政權具有好感。⁹

三、美國的中共政策

由於美國與中共間利益與衝突互見，而且美國國內長期持續爭辯應採取何種中國政策，導致美國對中共政策不實在變動中，例如老布希政府主張交往政策，柯林頓政府先是對中共強硬，後半期則改採全面交流策略，但是不管美國政府政策如何演變，想要改變中共之目的是一致的。

小布希視中共為競爭對手(competitor)不是戰略夥伴，在東亞戰略上傾向於揚日抑中，對中共採取既交流又圍堵的圍和(congagement)政策，目的在防止中共崛起成為歐亞陸塊的霸權或威脅美國盟邦的安全。在圍和戰略下，美國一方面強化與亞太盟邦間的雙向軍事合作關係、鼓勵盟邦與盟邦間的雙向合作、及有意推動美國與所有東亞盟邦間的多邊機制，另一方面雖然依舊與中共從事交流，但是對中共的不當行為則毫不遲疑地採取制裁措施。為了制約中共，美國在柯林頓政府時期就已經展開對中共的圍堵部署，如今整個圍堵線已經大致就緒。這條圍堵線以一九五〇年代簽訂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美日安保條約、美菲共同防禦條約、美澳紐公約、及美泰軍事協定為基礎，進一步加以強化。例如美國與澳洲於一九九六年發表聯合安全聲明，確認雙方的同盟承諾；同年與日本發表聯合安全宣言，重申同盟關係，並於第二年提出防衛合作新指針，強化雙方的安全合作；美國與菲律賓於一九九八年簽署「到訪部隊協定」，為兩國恢復

⁸David Shambaugh, "Facing Reality in China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80, No. 1 (January/ February 2001), pp. 55-57.

⁹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Alastair Iain Johnston, Department of Government, Harvard University, in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July 26, 2001.

軍事合作作準備。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與美國的同盟關係隱然若現，新加坡與美國於一九九〇年簽約，允許美國使用該國海軍基地；印度在冷戰結束之後，調整以往親蘇聯外交政策，轉而尋求美國之軍事合作，未來可能允許美國使用印度的軍事基地。此外，美國與蒙古、寮國、汶萊、馬來西亞、及印尼均有或多或少的軍事交流與合作關係，甚至美國未來重返越南金蘭灣基地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

美國在冷戰結束後，不僅沒有降低在東亞的軍事同盟關係，反而進一步加以強化，而且尋求合作的對象不是中共昔日的仇敵，就是籠罩在中國威脅論陰影下的國家，加上美國繼續在東亞維持十萬駐軍，圍堵或防範中共的意圖已經相當明顯。

第二節 日本的回應

進入 21 世紀後不久，日本國內外形勢發生激烈變化，其安全防衛政策進入了急劇調整的新時代。“白皮書”中所見的涉華部分出現了如下新的動向：

- 一、 對中共總體關注度更加提高，尤其對綜合國力與國防建設的關係顯得敏感。“白皮書”對中共綜合國力持續快速上升帶給國防發展的影響顯示出極大的關注和疑慮，開始用越來越多的篇幅敘述與軍事國防看似沒有直接關係的中國內政(政治、經濟、科技等)外交情況。2002 年起“白皮書”一再強調“中共作為地區大國在政治經濟上持續穩步成長，成為在軍事方面各國都注目其動向的存在”。這表明，日本認為中共在經濟發展、國力上升的背景
下推動軍事現代化，將會對日本形成大大超過以往的潛在威脅或至少是不確定性局面。¹⁰
- 二、 對中共國防政策的總體評價發生質變。2001 年版“白皮書”表示從近年國防預算的增幅和增額來看，“中共被認為今後將推進軍事現代化”，從而放棄了此前“將逐漸推進”的一貫提法，這實際上等於首次否認中國的“漸進國防政策”；同時還首次聲稱“應該客觀、慎重評價中國軍事現代化目標是否超出本國防衛的範圍，今後有必要對其動向加以關注”，而 2000 年版

10 「2002 年中國的國防白皮書」，「新華社」北京，2002 年 12 月 9 日電。

還沒有使用“超出本國防衛範圍”字眼。2001年的這些“定性措詞”一直使用至今。¹¹

其後，2003年版“白皮書”在“周邊軍事形勢”一欄中改變了關注的物件國排序，由過去多年延續的朝、俄、中變為朝、中、俄，將中共視為僅次於朝鮮的第二潛在威脅；同時指出2002年中國在《國防白皮書》中將國防建設定位為與經濟建設並列的重要課題，與迄今將“國防建設服務於國家的經濟建設大局”的定位相比，其變化是引人注目的。2007年版“白皮書”則乾脆在“軍事總論”部分指明：中共當前急速推動軍事現代化的中心目標，被認為是為了應對臺灣問題；但是，中共經濟持續快速發展、推動軍事力量現代化且缺乏透明性，引起了有關其目標是否超過應對臺灣問題的議論；對中國軍事力量現代化的擔心正在高漲，就其對地區形勢和日本安全給予的影響，有必要加以慎重分析。¹²

三、對中共國防現代化及軍事力量的評價發生質變。關於陸軍力量。2005年起“白皮書”在“陸軍戰力”一欄目中刪去了此前“總體上機動性和火力性不夠”的一貫評價，強調了中國快速反應部隊和特殊部隊的建設以及提高後勤支援能力的改革等動向關於海軍力量。“白皮書”在2001—2003年又指出：中共海軍被認為正意圖從沿岸防禦型向近海防禦型、進而將來向外洋海軍發展，因此有必要對其基於何種海軍戰略而頻繁展開活動加以關注。在2005年刪去了“大部分艦艇是舊式的”評斷，指出“據認為中國海軍意在擴大近海的防禦作戰空間、增強在近海作戰的綜合能力，對此動向有必要加以注意”；在2007年更進一步指出“從中國海軍現代化的狀況來看，中國被認為是意在構築在更遠海域的作戰能力”。

“白皮書”特別在2004年提到中共空軍的舊式戰鬥機數量逐減而第四代新型戰機數量激增；在2005年說明“中共空軍被認為正從國土防空型朝著攻防一體型空軍轉換”；在2006年特別提及“中國正努力提高航空電子作戰和情報搜集能力。特別是從2005年以來，中國飛機在日本周邊空域的活動達到前所未有的活躍程度。這些活動被認為是從事某種對日情報搜集工

11 「中國反恐全方位啟動」，「南方日報」2002年11月21日報導；
http://news.china.com/zh_cn/domestic/945/20021121/11367731_4.html

12 熊光楷，「九一一以來的國際反恐形勢及特點」，2004年5月12日，
<http://www.fmcopec.gov.hk/chn/szyw/t98059.htm>

作，此類動向今後有必要加以注意”；在 2007 年指出中共還意圖在構築更前沿的制空能力以及對地對艦攻擊能力。導彈力量。除了重複以往的“彈道導彈威脅論”，“白皮書”在 2002 年談到中共推動巡航導彈的研發等動向，在 2006 年指出巡航導彈進入實用化階段後，將被作為彈道導彈戰力的補充。在 2007 年進一步指出巡航導彈“有可能將包括日本在內的亞太地區納入射程”。¹³

四、 進一步明確提出“海洋活動”和“軍事透明度”等問題。海洋活動。“白皮書”從 2001 年起進一步介紹中共海洋調查船在日本專屬經濟區的“頻繁活動”狀況，指出其目的可能是“為了中共海軍在海區活動進行調查”；同時還指出中共海軍在日本周邊近海頻繁活動，遠洋活動非常活躍。在 2005 年特別提及中共核潛艇前一年在日本領海下潛航行。在 2006 年首次明確指出中共海軍加強海洋活動的四個目標，提出對為此目標而日益活躍的中國海洋活動有必要加以注意。國防費用與透明度。¹⁴

2001 年版“白皮書”聲稱中共近年大力推進軍事現代化、擴大海洋活動範圍，卻不公開裝備、兵力、訓練運用、預算等的詳情。2002 年版指出中共國防費用內容缺乏透明性，而且也沒明確本年度國防費用總額，有關國防費用的不透明性正在增大。2006 年版在“軍事總論”部分以序列第二的醒目位置單列“軍事力量透明性”欄目並表示：對於國防費用的詳細內容，中國過去的 5 份白皮書並沒有以看得見的形式提高其透明度；中國正穩步成為地區政治經濟大國，軍事動向為各國所關注，為了消除對中國的擔心，中國提高國防政策和軍事力量的透明度變得越來越重要。2007 年版首次在總體部分單列標題論述“武器國際移轉”，提出中共被認為是向有些存在著人權和民主問題的發展中國家轉讓武器，為了消除國際社會的擔心，是否提高“武器國際移轉”透明度將受到關注。

五、 顯著強調“臺灣問題”，涉台立場帶有更明顯的傾向性。從 2001 年起到 2007 年，“白皮書”的涉台動向有如下三大特點：首先，將有關“臺灣軍

13 王毅，「新挑戰、新觀念—國際反恐鬥爭和中國的政策」，2002 年 2 月 2 日在慕尼黑國際安全政策會議上的講話，見中國外交部網站。

14 張潔，中國的反恐政策：原則、內容與措施 China's Anti-terror Policy: Principles, Content and Measures. 當代亞太 Contemporary Asia-Pacific Studies. 2005 年 11 期，2005-11-16。

力”部分的内容大幅增加。其次，連續指出“傳有中國內地增加在臺灣對岸部署短程彈道導彈的動向”。最後，對兩岸軍力進行綜合比較：2001年提出“中國在數量上、臺灣在品質上佔優勢”的結論，同時指出“今後有必要對中台軍事力量的現代化與美國對台軍售的動向給予密切關注”；2003年提出：“從綜合因素判斷，中共正急速推進軍事現代化，不久將來中台軍事平衡中臺灣的品質優勢可能發生大的變化”；2007年論調變化更大，不但指出面對中共內地的軍事現代化，臺灣被認為缺乏有效的應對手段，還明確作出結論，即“中台的軍事平衡正朝著對中共一側有利的態勢變化”¹⁵。綜合以上分析可知，此期“白皮書”反映的對華安全政策傾向中，最突出的特點可謂是從能力和意圖兩個方面開始全面強調中國軍事“潛在威脅論”，祭出了明確的“防華”論調。

首先，“白皮書”對有關中共國防力量的事項不但進行了較之以前更全面和詳細的關注，而且對這種力量發展水準的評價發生了質變性轉換，即改變了自上世紀以來謹慎穩健的評價，認為中共陸海空、導彈和核武器發展水平正取得質的突破，軍事現代化目標正在超出本國防衛範圍，聲稱就其對地區形勢和日本安全給予的影響有必要加以慎重分析。言下之意就是中共所發展的“超出本國防衛範圍的軍力”可能對日本形成安全上的“潛在威脅”。

其次，從事關和影響日本安全的角度出發，越來越帶有傾向地對其中一系列國防政策動向直接進行評論並表示“憂慮”。這是此前欲言又止、半遮半掩的部分。“白皮書”從對中國國防路線、海洋活動、“軍事透明度”、涉台方針、軍事外交等問題進行了與此前不同的正面處理和高調渲染，而且並不諱言這些政策和動向給“地區形勢和日本的安全”帶來了影響，從而意圖說明中共在政策上構成對日“潛在威脅”。¹⁶

15 楊帆，「大陸入世重頭戲：國家經濟安全」，「投資中國」第93期，2001年11月，頁62。

16 「中央社」台北2006年11月24日電；<http://tw.news.yahoo.com/article/url/d/a/061124/5/74np.html> 日本霞山會主席研究員阿部純一指出，經由安倍十月訪中之旅，且提出「戰略互惠關係」，意謂著日中關係有著和日美同盟的意涵，日中關係或許可與日美關係並列，甚至有期待「日、美、中三國領袖高峰會」的可能。

第三節 東亞諸國的回應

在相當長一段時期裏，中共的政治制度、早期的「輸出革命」政策以及敏感的東南亞華僑問題，令許多東南亞國家對中國的意圖十分懷疑，而中共則痛罵成立之初的東盟「反共反華」，因此直到上世紀 70 年代，中共與東協關係還是互不信任和對立的。而後中共與東協改善關係後，相繼與泰國、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國實現了邦交正常化。1991 年，中共與曾在 1979 年開戰的越南恢復了邦交，至此中共與東協所有國家邦交正常化。¹⁷

但是，歷史的陰影和現實的利益糾葛，使得中共與東協之間的關係時有波折。由於東協大多數國家都是與中國毗鄰的小國，對於中共在 1990 年代經濟的快速發展，產生了許多新的不安和擔憂，因此在 1990 年代，「中國威脅論」一度在東南亞甚囂塵上。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是中國東協關係的一個轉折點。金融危機的突然襲擊使得東協國家想要快速進入發達國家行列的夢想瞬間破滅；為了抑制危機的進一步傳染，同時也為了消除「中國威脅論」的不利影響，中共在自身經濟面臨巨大壓力的條件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這種負責任的行為改變了東南亞國家對中共的認知。¹⁸

此後，隨著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計劃的提出和落實，2002 年雙方確立了全面經濟合作夥伴關係。而這時，塑造穩定周邊、服務中共經濟崛起大局的戰略已經形成。「富鄰、睦鄰、安鄰」正是要通過建立和睦的周邊環境而保持鄰安，而其背後則是我國外交政策調整後周邊外交在總體戰略中地位的提升。為了消除東協國家對南海潛在衝突的擔心，中共先是與有關各方發表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進而加入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將雙邊關係上升到戰略合作夥伴層次。

目前，中共與東協關係被認為「處在近 50 年來最好狀態」，甚至還出現了「兄弟關係」（中國與緬甸）、「黃金時代」（中國與菲律賓）等提法。顯然，

17 楊潔勉，〈美國的全球戰略和中國的戰略機遇期〉，《國際問題研究》，第 94 期，(2003.3)，頁 11-16。Ibid., 59.

18 閻學通，《中國與亞太安全—冷戰後亞太安全的安全戰略走向》(北京：時事，1999 年)，頁 24。

自 1997 年亞洲金融危機後，東協發現越來越難以抵禦中共在經濟援助上的壓倒性影響力和軟實力。到近幾年，大多數東協國家已被北京有關「和平崛起」的聲明及友善支持者的形象說服從而打消了疑慮。從過去的互相不信任和指責到今天的自貿區，在過去二三十年時間裏，中共成功地完成了在東南亞地區的角色轉變和形象更新，由輸出革命到輸出商品，最近開始輸出资本，逐漸在該地區建立起領導作用，日益成為一個令人信服和依賴的大國。

對日益崛起的中共而言，不僅需要一個和諧的內部環境，更需要一個穩定的外部、尤其是周邊環境。這正是「和平崛起」、「和平發展」以及「和諧世界」理論的主要背景。而在這個過程中，消弭「中國威脅論」，成為一個不僅有強大的經濟實力，更讓國際社會放心和信賴的可敬可信的力量，是中共的當務之急。而中國通過東盟自貿區的建設，在東南亞增信釋疑，顯然是一個值得肯定的開始。¹⁹

從以上可以看出，中共東協自貿區的建設顯然更多是出於政治與戰略的考慮，出於睦鄰友好的外交需要，經濟上的邏輯並不清晰，只是中共希望通過自貿區的構建來加強雙邊的合作態勢，讓東南亞國家相信它們也能從中國的和平崛起中獲益。至於中共能否從中獲益，中共與東協之間的經濟互補性如何，並不是主要的考慮。但自貿區的建成主要靠政治上的推動，建成後的運轉更多是一個經濟話題，運轉的效果更是取決於客觀的經濟規律。從國際產業鏈的角度來看，中國和大多數東盟國家仍同處於國際產業鏈下段，還沒有拉開距離，產業出口的競爭面自然相對的大，這使得東南亞國家對中共的擔心與警惕居高不下。

而據統計，在中共對東協貿易中，在華外資企業占 60% 以上。近年中國與東協貿易的增長，多因這些外企內部或之間的貿易增長所造成。同一產品往往需要過境兩次甚至多次才形成最終產品。這樣的價值重複計算，雙邊貿易額飛速上升，但實際產品數量並未相應增加，造成貿易數字的虛腫。而這一重複計算約占中共與東協貿易額的 30% 以上。再者，轉口貿易也占中共東協貿易額中相當的成分。例如，在中國同新加坡的貿易中，過境轉口貿易占中共對新出口的 46%，

¹⁹Samuel P. Huntington, "Why International Primacy Matter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7, no. 4 (Spring 1993): 83.

占新加坡對華出口的40%。換言之，許多出口產品，雖然算入貿易總額，但最終並不進入彼此的消費市場。²⁰

隨著中共與東協自貿區的啟動，大量的中共商品會以零關稅進入東協市場。東協國家對此反應不一，新加坡是工業國家，它可以把生產、投資拿到中國，利用中國的生產能力把新加坡轉型成一個非常好的服務業社會，因此持歡迎態度；而印尼、馬來西亞、泰國的反應就複雜很多，擔心中共廉價商品的湧入會危及本國的製造業。如果後一種情況果真出現，不排除東協國家會出現新的「中國威脅論」，這樣一來，自貿區不僅不會增加中共和東協之間的互信，反而會起反作用，中共過去二三十年在該地區增信釋疑的努力會付之東流。

30年來，中共從一種邊緣的、反抗的國際形象，變成了趨於中央位置的、具備建設性與合作能力的「負責任大國」。而何謂「負責任」，人們的看法不盡相同。過去幾年來，中共的領導人攜帶大批貸款和援助資金頻繁訪問東協各國，幫助緬甸和老撾等國家修建公路和港口，向印度尼西亞和菲律賓等其他國家慷慨地承諾大筆投資。²¹在發展經貿關係的同時，北京的政治影響也不斷增強。顯然，中國對「負責任」的理解，還更多停留在輸出利益，自己吃虧、讓別人佔便宜的層次上，以為經濟上的好處必然會帶來政治上的互信。在中共實行閉關鎖國政策和奉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時代，中共曾經本著國際主義和支援世界革命的理想向一些國家提供大量的無償援助和各種支持，甚至犧牲了不少人，換來的只是廉價的讚揚和口惠而實不至的「同志加兄弟」的情誼，而且隨著時代的變遷煙消雲散。²²

往深處看，更難的是社會和文化的深層鏈接和融合。在東南亞，不同的文化、種族、宗教、政治交織在一起。這裏向來有五大文化，即伊斯蘭、佛教、印度教、基督教和中共的儒家與道教文化。中共即使在歷史鼎盛時期，其儒教與道教文化只出現于越南，而未能在東南亞其它國家盛行。要達到與其社會

20 「新華社」北京2002年1月29日電；顧震球，「多邊合作與集體安全」，「瞭望」新聞周刊，2002年1月3日。

21 〈中方關於新安全觀的立場文件〉，中共在「東協區域論壇」外長會議中提出，2002年7月31日；全文參閱中共外交部網站www.fmrc.gov.cn。

David M. Lampton, Richard Daniel Ewing, *The U.S.-China Relationship Faci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rises: Three Case Studies in Post-9/11 Bilateral Relations: Three Case in Post-9/11 Bilateral Relations*, The Nixon Center (Washington D.C.), January 2004, p.2, 9.

和文化的深層鏈接和融合，談何容易？顯然，無論從營造有利的周邊環境還是「中國製造」升級的角度，東協都是中共走向世界的必經之路，但這條路，至今仍然漫漫而長遠。



第陸章 結論

南海情勢的發展所反映的是我國外交與國家安全困境的一個縮影，我們所看到的是一個崛起的中共，它在外來威脅大為降低的情況下，能夠集中更大的力量來支持其在南海的主張。東南亞國家面對一個浮現的強權，除了加強軍備之外，只能依靠結盟包括向美國靠攏，以及運用外交的手段來與中共周旋。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看到美國在東南亞的影響力持續在上升中。我們或許可以假設美國不會允許中共完全掌控整個南海，美國未來可能在南海問題上扮演較以往積極的角色。我們或許也可以假設在可供佔領的島礁全部被佔之後，南海主權爭端國間短期間應不會再度發生像一九八八年中越共海戰的情形，但是這些爭端國會加強對已經佔領島礁的經營，同時也會積極從事外交或信心建立措施來控制彼此間的潛在衝突。

第一節 研究發現

在南海爭霸戰的棋局中，台灣似乎逐漸被邊緣化，東協就南海問題直接與中共對話，而將台灣排除在外。中共與東協在討論擬訂南海行為準則時，台灣未被邀請。如果加拿大不再贊助或處理南海潛在衝突研討會因任何原因停辦，我國在南海衝突問題中的舞台將更為緊縮。台灣得以參加處理南海潛在衝突研討會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中共認為台灣會在南海問題上與其站在同一陣線，但是台灣與中共的立場過於雷同，又讓東南亞國家覺得不邀請台灣參加對它們有利。

此外，台灣在南海問題上的自我克制，讓東南亞爭端國覺得不必在意台灣的想法。我們可以假設中共應不會對太平島動手，因為中共目前仍然認為台灣駐守太平島是在幫中國守護領土，當許多南沙島礁仍然被越南、菲律賓、及馬來西亞佔領之下，中共如先向同是華人駐守的太平島著手，很難贏得國內外華人之認同。但是中共擴張在南海的勢力，卻會威脅到台灣的國家安全，因為中共將可能扼守台灣的生命線。然而，南沙島礁實在是無險可守，因此我國很難完全靠軍事力量來維持南海主權。雖然也有人認為南海與台灣安全問題兩相比較，南海問題現階段尚非主要影響因素，台海則直接面臨安全威脅，中共似乎毋需甘冒美日因素干涉，捨近求遠於南海截斷我補給生命線。

隨著經濟的持續發展，中共向海洋爭取資源的心情將更加迫切，而中共轉向海洋發展對我國國家安全之威脅就隨著升高，因為中共會將軍事力量的重心向東南沿海移動，而且中共為了經營海洋將著重於發展海空軍，這會降低台灣海峽作為台灣國家安全屏障的功能。從中共過去對維護南海主權的措施，可以了解中共的對外行為深受其內在政經情勢的影響。在建立政權的前二十五年，中共內憂外患從未間斷，在這種情況下，中共不具有海洋視野，也沒有經略海洋的雄心壯志，它對南海主權只能作消極的宣示，既沒有武力的展示行動，也沒有強化南海主權的軍事戰略。但是中共國力增強時，角逐南海主權的動作就越大。東南亞國家對中共的畏懼增加時，對與台灣進行第一軌的互動關係就越謹慎，台灣對東南亞國家拓展外交關係的難度就隨著增加。台灣在東南亞的外交挫折是其整體外交困境的一個縮影，但是台灣在東南亞的外交挫折讓人特別心痛，因為台灣在東南亞有巨額的投資，而且台灣與東南亞國家具有某種程度的共同安全利益，加上南海情勢發展關係到台灣的國家安全，使我國不能消極地坐視南海情勢的變遷。

固然南海情勢發展關係到台灣的國家安全，但是嚴格說來真正威脅台灣國家安全的直接來源是台海兩岸關係之發展，以及台海軍力平衡的演變。在臺海兩岸之競局中，台灣無法控制中共如何發展其軍事力量，也很難左右中共的軍事戰略。中共目前面臨許多政治、經濟、社會層面的挑戰，中共政權可能崩潰、中國大陸可能再度分裂，但是台灣對整個中國大陸的發展方向不具有影響力，唯一可以確定的是中共對台灣的軍事與外交壓力只會增加而不會減少。台灣所能做的是力求團結一致對外、精心規劃國家安全戰略、以及勵精圖治以厚植因應中共挑戰的力量。如果台灣人民沒有這種認知，那麼台灣在對中共以小搏大的賽局中能夠生存的機率相當小。

我們可以假設美國、日本、東南亞國家、甚至歐洲許多國家均樂意看到台灣的繼續存在，如果中共對台用武，則美國應會提供一些軍事幫助、日本會對中共經濟制裁，東南亞國家會口頭上聲討中共，但是台灣能否生存最終仍是掌握在台灣人民自己的手中。南海情勢最近幾年有許多新的發展，這些發展有些帶給台灣機會，但有些則增加台灣新的挑戰，例如美國重新回到東南亞，以及中共與美國在南海可能出現的競爭關係，會增加台灣的戰略重要性，但是中共增加在南海及東南亞的影響力則會進一步壓縮台灣的外交空間。

台灣在南海問題上的消極作為，使台灣在這一場權力競賽中越來越像其它爭端國手中的一枚棋子。菲律賓在美濟礁事件中重新檢討一個中國的政策，越南試圖對台灣威脅利誘以防止臺海兩岸在南海問題上合作，中共亦積極拉攏台灣在南海問題上採取統一戰線。台灣並不需排斥與任何爭端國的合縱連橫，但台灣應積極參與此一棋局，而不是消極等待其它爭端國來告訴我國可以做什麼。以下將先探討總體國家安全戰略，在就與南海情勢發展對我國國家安全與外交直接相關的國防、外交、大陸政策、及南海策略等幾個層面提出一些建議。

第二節 研究心得

自從中共於一九七〇年後將勢力深入南海海域地區，並與越南分別於一九七四年發生武裝衝突後，凸顯南海海域主權糾紛不斷的現象，使得本區曾一度成為衝突地區熱點之一。隨著中共的改革開放及因應消除「中國威脅論」，極力推行「睦鄰、安鄰、富鄰」之三鄰政策，提出「主權歸我、擱置爭議、共同開發」原則，並於二〇〇二年與東協國家簽署「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後，南海海域主權爭議暫告平息。但是隨著中共海軍戰略已由近海防禦逐漸轉向遠洋作戰發展，除保衛二百海里專屬經濟海域及較遠的大陸外，還需要擔負保護海上貿易和維護航道安全，以及延伸一千多海哩的南海水域。南海地區的安全維護工作，主要是南海艦隊的任務，但隨著周邊國家不竄得以各項主全宣勢等動作，來強調擁有島嶼主權性絕不容任何國家來挑戰，該區主權的爭議也日益白熱化。中共透過與東協國家十加一的三鄰外交途徑，在不損及國家主權的原則下，以經濟共同開發，共同獲利為幌子，採「分而治之，步步為營」策略，逐步形成獨佔之事實，以武力為後盾，進而暗中迫使這些國家不得不讓步。

一九九五年五月，美國國務院擬定了更全面的南海政策。該政策號稱美國對南海保持和平與穩定有著長久的利益，重申美國對該區域自由航行的權利，稱航行自由對整個東亞地區包括美國在內的和平與繁榮十分必要。此外美國也擔心如果中國在資源蘊藏豐富的南海區域戰具優勢，對於美國尋求能源產第多樣化的國家利益相衝突，這對美國來說是無法接受的殘酷事實及現實。隨著中國的崛起，中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關係發生深刻轉變，一個緊密型的環中國經濟帶正在形成。與之並行的是，中國崛起帶來的地區震動表明，中國有必要以東亞地區發展為核心，大力促進東亞一體化，創立有助於地區經濟發展和進一步經濟開放的地區性國際制度，為其他國家搭中國發展之便車提供機會。中國

對地區合作的參與是一個逐步演變的過程。冷戰結束後，中國與周邊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關係陸續正常化、經濟全球化迅猛發展，構成了這一轉變的歷史背景。中國周邊安全面臨的挑戰和隱患，中國與世界、尤其是與周邊關係的日趨緊密，東亞金融危機的爆發，則提供了啟動地區合作的契機和動力。中共十六大報告中明確提出加強睦鄰友好與地區合作，地區合作首次出現在黨的代表大會政治報告中，首次與雙邊關係並列。此後，中國將加強地區合作與交流作為實現亞洲共贏的有效途徑，積極探索新的合作方式。中國積極參與了上海合作組織的活動及“10+3”的進程，逐步加大對這兩大地區合作的投入。在北面，上海合作組織已完成機制化建設，逐步從安全合作向經濟政治合作擴展。在南面，中國率先與東盟確定建立自由貿易區，帶動其他域外國家對自由貿易安排採取更為積極的態度。

東亞主要採用雙邊安全體制和多邊安全體制來維護和確保整個地區的安全。東亞國家有不同的安全追求，美國追求單邊霸權，中國、俄羅斯乃至日本都在或明或暗地追求多極化，其他國家則期望建立多邊安全協調機制，導致存在名目繁多的安全安排，從而構成了霸權、均勢、合作安全等看起來相互衝突的安全選擇交織的局面，東亞安全秩序被視為各種相關安全模式的疊合。隨著中國崛起正向性作用的發揮，東亞安全秩序呈現出與冷戰結束之前截然不同的特徵。雙邊同盟、多邊對話和特殊外交的混合，既沒有出現軍事競爭對抗，也沒有發展成為多邊合作體系，而是處於均勢與共同體秩序之間。在一定意義上，東亞安全正在經歷著美國同盟秩序構想和東亞合作安全構想的博弈。

參考書目

一、中文專書

1. 王士彙、王國平：《從東盟到大東盟—東盟三十年發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8年3月）。
2. 王逸舟：《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台北：五南圖書，初版，1999年）。
3. 王躍生：《新制度主義》（臺北：揚智出版社，1997年）。
4. 宋鎮照：《東協國家之政經發展》，（台北：五南圖書，初版，1996年）。
5. 宋鎮照：《台海兩岸與東南亞：三角政經關係之解析》，（台北：五南圖書，初版，1999年）。
6. 宋鎮照：《發展政治經濟學—理論與實踐》，（台北：五南圖書，初版，1995年）。
7. 宋興洲：《動態的東亞經濟合作：理論性爭辯與實踐》，（台北：鼎茂圖書，初版：2005年）。
8.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65-2000）》（台北：聯邦出版社，初版，2000年）。
9. 杜震華、盧信昌：《世界經濟概論—東南亞篇》，（台北：華泰文化公司，1版2刷，2001年6月）。
10. 林正義：《東南亞區域安全體系的研究—理論與實踐》，（中央研究院，初版，1999年）。
11. 林碧昭：《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五南圖書，二版，1999年）。
12. 周世雄：《國際體系與區域安全協商-歐亞安全體系之探討》，（台北：五南圖書，初版，1994年）。
13. 周煦：《冷戰後美國的東亞政策（1989-1997）》，（台北：生智文化，初版，1999年2月）。

14. 易君博：《政治理論與研究方法》，(台北：三民書局，四版，1996年)。
15. 長谷川慶太郎：汪仲，《亞洲金融風暴：世紀末經濟危機》，(台北：時報文化，初版，1996年)。
16. 洪丁福：《國際政治的理論與實務》，(台北：啟英文化公司，初版，1996年)。
17. 翁明賢：《國際組織新論》，(台北：正中出版社，初版，1995年)。
18. 梁守德：《冷戰後國際關係中的彼與己》，(當代世界出版社，初版，2002年)。
19. 郭承天：《國際建制與國際組織》(臺北:時英出版社，1997年)。
20. 陳欣之：《東南亞安全》，(台北：生智文化事業，初版，1999年)。
21. 陳怡君：《東協關稅減讓對我國的影響與分析》，(台北：中華民國對外貿易發展協會，2000年)。
22. 陳鴻瑜：《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渤海堂文化事業，初版，1992年)。
23. 陳鴻瑜：《東南亞國家協會之發展》，(埔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1997年)。
24. 陳鴻瑜：《臺灣：邁向亞太整合時代的新角色》，(台北：臺灣書店，初版，1996年)。
25. 陳鴻瑜：《東南亞政治論衡(一)》，(台北：翰蘆圖書)。
26. 陳沖、王耀興，《亞洲金融風暴研究》(台北：財政部金融局，1998)。
27. 陳勁：《歐盟外交政策與對外關係》，(台北：五南圖書出版社，2版，2002年)。
28. 陶威廉：田弘茂，《後冷戰時期亞太集體安全》，(台北：業強出版，初版)(1996年12月)。
29. 張亞中、孫國祥：《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

出版社，初版，2001年)。

30. 蔡政文：《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發展及其評估》，(台北：三民出版社，初版，1989年)。
31. 蕭全政：《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初版，1996年)。
32. 蕭全政：《東亞金融危機對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香港：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1999)。
33. 蕭新煌、顧長永：《新世紀的東南亞》，(台北：五南圖書，初版，2002年)。
34. 盧明華：《當代國際關係理論與實踐》，(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35. 謝福進：《2002~2003年亞太形勢發展與展望》，(台北：遠景基金會，初版，2003年)。
36. 顧長永：《臺灣與東南亞的政治經濟關係—互賴發展的順境與逆境》，(台北：風雲論壇出版社，初版，1998年)。
37. 顧長永：《東南亞政府與政治》，(台北：五南圖書，初版，1995年)。
38. 趙明義：《國際區域研究》，(台北：黎明文化出版社，初版，1996年)。

二、中文期刊論文

1. 王傳寶：〈東協合作前景：『十加三』機制未來走向與中國的目標〉，《中國評論月刊》(香港)，2001年4月號，頁9-11。
2. 朱文暉：〈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各國的憧憬與感受〉，《中國評論》(台北)，頁64-74。
3. 朱景鵬：〈區域主義、區域整合與兩岸整合問題之探討〉，《中國大陸研究》，第42卷第8期，頁71-94。

- 4.江亦麗：〈二〇〇二年亞太安全形勢綜述〉，收錄於張蘊嶺、孫士海主編之《亞太藍皮書：亞太地區發展報告 2002》（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3），頁 293-306。
- 5.宋鎮照：〈解析當前美「中」兩國亞太政策下的東南亞發展策略〉，《展望與探索》（台北），第 1 卷第 7 期（2003 年），頁 12-27。
- 6.宋鎮照：〈東南亞金融風暴之政治經濟意涵〉，《海峽評論》（台北），第 85 期（1997 年 11 月），頁 12-15。
- 7.宋鎮照：〈中共與東南亞之政經關係與發展：回顧與前瞻〉，《東亞季刊》（台北），第 29 卷 1 期（1998 年 1 月），頁 57-78。
- 8.何建雄、高連福、魯閔：〈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的新發展〉，收錄於中國國際經濟關係學會主編之《經濟全球化大潮與中國對策》（北京：時事出版社，2001），頁 422-436。
- 9.李文志：〈後冷戰時代亞太安全體系發展與台灣戰略的思考〉，收錄於蕭全政等著之《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 年），頁 29-140。
- 10.李國雄：〈「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政經背景分析〉，《立法院院聞》，第 31 卷第 11 期，（2003 年 11 月）頁 71-82。
- 11.林欽明：〈東協區域經濟整合〉，《台灣經濟研究月刊》（台北），第 25 卷第 7 期（2002 年 7 月），頁 61-68。
- 12.林曉光：〈戰後日本與東南亞國家的關係〉，《亞洲論壇》（香港），第 4 期（2000 年），頁 21-29。
- 13.吳宗憲：〈全球化下的台灣「南向政策」的機遇與挑戰：國際典則理論的研究觀點〉，（2003 年台灣的東南亞區域研究年度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蔡元培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
- 14.吳宗憲：〈論「中共—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建構與挑戰〉，《新世紀的東亞》，（台

北:五南出版社, 2002年9月), 頁 357-358。

15. 吳福成:〈亞洲新震撼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台灣經濟研究月刊》(台北), 第 25 卷第 7 期 (2002 年 7 月), 頁 48-51。
16. 吳玲君:〈東協國家 APEC 政策的政經因素〉,《問題與研究》(台北), 第 39 卷第 3 期 (2000 年), 頁 39-43。
17. 邱坤玄:〈結構現實主義與中國大國外交格局〉,《東亞季刊》(台北), 第 30 卷第 3 期 (1999 年夏), 頁 21-25。
18. 邱啟楓:〈中國與東南亞經貿創雙贏〉,《亞洲月刊》(新加坡), (2002 年 9 月 23-29 日), 頁 36-37。
19. 林欽明:〈東南亞區域整合的趨勢〉,《東南亞投資雙月刊》, 第 13 期 (2000 年 8 月), 頁 2-7。
20. 林若雱:〈中共與東南亞之經濟整合現狀與發展〉,《中華歐亞基金會研究通訊》 第 7 卷第 12 期 (2004 年 12 月 10 日)。
21. 林碧炤:〈改革開放聲中的中國外交〉,《光復大陸》(台北), 第 263 期 (1988 年 11 月), 頁 71-94。
22. 林麗香:〈中國與美國在東南亞的競逐〉,《中國問題研究》(台北), 第 36 卷 第 2 期 (2002 年 2 月), 頁 56-79。
23. 金榮勇:〈柯林頓政府的東南亞政策〉,《美國月刊》(台北), 第 8 卷第 5 期 (1993 年 5 月), 頁 69-81。
24. 金榮勇:〈一九九〇年代日本的亞太政策〉,《問題與研究》(台北), 第 32 卷第 6 期 (1993 年 5 月), 頁 30-39。
25. 金榮勇:〈東南亞金融風暴的起因、影響與展望〉,《問題與研究》(台北), 第 37 卷第 1 期 (1998 年 1 月), 頁 1-14。

- 26.金榮勇：〈東亞金融風暴對東協組織的影響〉，《問題與研究》（台北），第38卷第2期（1998年1月），頁55-67。
- 27.金榮勇：〈亞洲金融風暴與東南亞經濟安全體系之建立〉，《問題與研究》（台北），第39卷第1期（2000年1月），頁1-14。
- 28.金榮勇：〈布希政府的東南亞政策與挑戰〉，《問題與研究》（台北），第40卷第6期（2001年11、12月），頁53-68。
- 29.門洪華：〈國際機制與二十一世紀的中國外交戰略〉，《中國大戰略》（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頁225-284。
- 30.胡鞍鋼：〈建構中國大戰略：“富民強國”的宏大目標〉，《中國大戰略》（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頁3-40。
- 31.徐之先、劉軍紅：〈變革中的日本〉，《亞太戰略》（北京：時事出版社，2002），頁86-108。
- 32.唐仁俊：〈後冷戰時期中國對東協外交政策之分析〉，《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27卷第12期（2001年12月），頁83-94。
- 33.陸建人：〈東協合作前景：『十加三』機制開創東亞合作新紀元〉，《中國評論月刊》（香港），2001年4月號，頁8。
- 34.陳鴻瑜：〈南海之石油資源開發與政治衝突〉，《東南亞季刊》（台北），第1卷第3期（1996年7月），頁35-39。
- 35.陳勁：〈東協對內及對外安全機制的演變與策略〉，《國立中山大學社會科學季刊》（高雄），第41卷第6期（2002年11、12月），頁81-107。
- 36.陳治萍：〈東協區域主義與台灣南聯策略之分析〉，收錄於蕭全政等著之《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年），頁155-220。

- 37.陳治萍：〈南海地區情勢變化與台灣因應之道〉，收錄於蕭全政等著之《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頁 221-302。
- 38.喻常森：〈日本與東盟關係中存在的問題〉，《亞洲論壇》（香港），第 2 期總第 3 期（2000 年），頁 16。
- 39.曹筱陽：〈布希鄭府亞太政策調整〉，收錄於張蘊嶺、孫士海主編之《亞太藍皮書：2000 年亞太地區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 321-334。
- 40.曹筱陽：〈新世紀美國的亞太戰略-繼承與演變〉，收錄於張蘊舫主編之《亞太藍皮書：亞太地區發展報告：2000 年亞太地區發展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頁 256-271。
- 41.馮昭奎：〈經濟外交的興起〉，《世界知識》（北京），第 24 期（1997 年），頁 14-15。
- 42.張華：〈東盟與龍共舞〉，《亞洲週刊》（香港），2002 年 9 月，頁 48。
- 43.張雅君：〈十六大後的中共外交：相互依賴深化下的利益、挑戰與政策取向〉，《中國大陸研究》（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 46 卷第 2 期（2003 年 3、4 月），頁 1-2。
- 44.張虎、許光泰：《中共十六大後走向》（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2003 年），頁 41-50。
- 45.張惠玲：〈中國與東協建立自由貿易區之戰略考量評析〉，《共黨問題研究》（台北），第 28 卷第 7 期（2001 年 7 月），頁 4-16。
- 46.張蘊玲：〈東亞合作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第 25 卷，第 7 期，2002），頁 61-68。
- 47.張惠玲：〈亞洲金融機對中國區域霸權目標之影響〉，《問題與研究》〈台北〉，39 卷 2 期，〈2000 年 2 月〉，頁 51-65。

48. 蔡增家：〈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日本、東協與中國大陸互動關係的轉變〉，《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 45 卷第 4 期（2002 年 7、8 月），頁 75-99。
49. 蔡增家：〈冷戰後中國對東協的外交政策〉，《中國大陸研究》（台北），第 41 卷第 9 期（1998 年 9 月），頁 71-82。
50. 蔡東杰：〈東亞雁形結構的調整與變遷〉，《中國問題研究》（台北），第 36 卷第 2 期（2002 年 2 月），頁 56-79。
51. 蔡宏明：〈大陸與東協攜手打造世界最大貿易區〉，《貿易雜誌》（台北），第 115 期（2003 年 1 月），頁 24-28。
52. 鄭宇碩：〈二十一世紀初期中國與東盟的關係〉，（台北：願景基金會，2000 年 12 月），頁 1-8。
53. 趙文衡：〈區域貿易協定與東亞國際政經體系之重組〉，《問題與研究》（台北），第 41 卷第 6 期（2002 年 11、12 月），頁 81-107。
54. 趙文衡：〈東協與中國成立自由貿易區初探〉，《經濟論壇》（台北），第 25 卷第 2 期（2002 年），頁 98-106。
55. 鄧小平：〈吸取歷史經驗，防止錯誤傾向〉，收錄於《鄧小平文選》（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 3 卷，頁 229-230。
56. 劉二龍：〈經濟與政治的接軌—由東協自由貿易區看中共區域版圖的擴張〉，《共黨問題與研究》，第 28 卷第 8 期（2002 年 8 月），頁 66-69。
57. 閻學通：〈中國外交需要立足周邊〉，《瞭望周刊》（北京），第 11 期（2000 年 3 月），頁 49-50。
58. 閻學通：《中國與亞太安全—冷戰後亞太國家的安全戰略走向》，（北京：時事出版社，1996），頁 21-33。
59. 潘石英：〈南海與歷性權利的國際慣例〉，《國家政策雙周刊》（台北：財團法人張榮發基金會國家政策研究中心），第 96 期（1994 年 10 月 4 日），頁

7-9。

- 60.蕭全政：〈亞太地區國際多邊合作典則的最近發展及其限制〉，收錄於田弘茂主編之《後冷戰時期亞太集體安全》，（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年），頁1-29。
- 61.蕭全政：〈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台北），第14期（2001年），頁201-222
- 62.蕭全政：〈後冷戰時代亞太政經變遷中的兩岸關係〉，收錄於蕭全政等著之《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1996），頁1-29。
- 63.蕭全政，〈兩種社會科學典範〉，《政治科學論叢》，第5期，（1994），頁59-85。
- 64.蕭全政：〈全球化下亞太政治經濟發展之前景〉，《台灣經濟研究月刊》，第24卷第6期，（2001年6月），頁23-29。
- 65.謝福進：〈後冷戰時期中國與東協安全戰略關係之研究〉，《戰略與國際研究》（台北），第3卷第4期（2001年10月），頁56-79。
- 66.謝福進：〈後冷戰時期東協與中共之安全戰略目標衝突—台灣議題〉，《遠景季刊》（台北）（第3卷第1期，2001年），頁93-104。

三、學位論文

- 1.呂冠頤：《現狀霸權與崛起強權互動模式之研究：一個理論與歷史的分析途徑》，碩士論文，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2003年。
- 2.吳素馨，《後冷戰時期中國與東南亞國協合作夥伴關係之研究》，碩士論文，中山大學政治研究所，2001年。
- 3.吳德鳳：《東亞金融危機對亞太區域安全影響之政治經濟分析》，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7月。

- 4.林碧美：《東亞金融危機之政治經濟分析》，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年7月。
- 5.卓秀玲：《從 PECC 到 APEC: APEC 建制化發展中的認知因素》，碩士論文，東海大學政治系，2001年。
- 6.黃金湯：《後冷戰時期中日外交關係》，碩士論文，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2001年。
- 7.盧俊偉：《中國區域發展之政經分析，(1949~2002)》，碩士論文，臺灣大學政治研究所，2002年。
- 8.謝福進：《後冷戰時期中國與東協安全戰略關係之研究》，博士論文，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2000年。

四、外文專書

1. Acharya, Amitav. 2001. *Constructing a Security Community in Southeast Asia: ASEAN and the Problem of Regional Order*. London: Routledge. chap.2, pp. 47-79.
2. Andreas, Peter. 2003. "Redrawing the Line: borders and Securit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2, pp. 78-111
3. Brooks, Risa A. 2003. "Making Military Might: Why Do States Fail and Succeed?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8, No. 2, pp. 149-191.
4. Cheeseman, Graeme. 1999. "Asian-Pacific Security Discourse in the Wake of the Asian Economic Crisis." *The Pacific Review*, 12(3): 333-356.
5. Christensen, Thomas J. 2006. "Fostering Stability or Creating a Monster? The Rise of China and U.S. Policy toward East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31:1, 81-126.
6. Dickens, David ed. 1997. *Comprehensive Security and Cooperative Security in*

the Asia-Pacific. Victoria University (Wellington): Center for Strategic Studies, Chapter II.

7. Dittmer, Lowell. 2002. "East Asia in the "New Era" in World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55, No.1, pp.38-65.
8. Grieco, Joseph M. 1997.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edited by Michael W. Doyle and G. John Ikenberry. Westview Press. pp.163-201.
9. Lake, David A. and Patrick M. Morgan. 1997. *Regional Orders: Building Security in a New World*. Penn State Press.
10. Lawson, Stephanie. 2005. "Region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nd Social Change in the Asia-Pacific: Implications for Human Security and State Responsibility."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17, No.2, pp.107-122.
11. Lipschitz, Ronnie D. ed. 1995. *On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2. Nye, J. S., Jr. 2005,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History*.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Ch.9.
13. Peou, Sorpong. 2002. "Re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in Southeast Asian Security Studies Today." *The Pacific Review*, 15:1, 119-138.
14. Sadleir, David. 2005. "A Study in Harmony: The Great Powers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17, No.3, pp.299-314.
15. Yang, Chengxu. 2005. "Great Power Relations and Asia-Pacific Security."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17, No.3, pp.291-298.
16. 李文志，2004，〈全球化對亞太安全理念之衝擊：理論的初探〉，《政治科學論叢》，第二十二期，頁 31-66。

17. 楊永明、唐欣偉，1999，〈建立信心措施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第三十八卷，第六期，頁 1-21。
1. Beeson, Mark and Berger, Mark T. 2003. "The Paradoxes of Paramountcy: Regional Rivalries and the Dynamics of American Hegemony in East Asia."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15, No.1, pp.27-42.
2. Carter, A. B., & W. J. Perry 著，許綏南譯，《預防性防禦：後冷戰時期美國的新安全戰略》，台北：麥田，前言、導論、ch.3, 4, 5。
3. Heginbotham, Eric and Christopher P. Twomey. 2005. "America's Bismarckian Asia Policy," *Current History*, pp.243-250.
4. Posen, Barry R. 2003. "Command of the Commons: The Military Foundation of U.S. Hegemon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8, No.1, pp.5-46.
1. Katzenstein, Peter J. and Nobuo Okawara. 2004. "Japan and Asian-Pacific Security."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edited By J.J. Suh,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Charls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 97-130.
2. MacIntyre, Andrew. 2003. "American and Japanese Strategies in Asia," *Beyond Bilateralism: U.S.-Japan Relations in the New Asia-Pacific*, edited by Krauss and Pempel. Stanford. Pp.115-129.
3. Cha, Victor. 2001. "Japan's Engagement Dilemmas with North Korea." *Asian Survey*, Vol. XLI, No.4, pp.549-563.
4. Yuzawa, Takeshi. 2005. "Japan's changing conception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from an optimistic liberal to a pessimistic realist perspective." *Pacific Review* 18(4): 463-497.
5. Mulgan, Aurelia George. 2000. "Beyond Self-defense? Evaluating Japan's Regional Security Role under the New Defense Cooperation Guidelines," *Pacifica Review*, Vol. 12, No. 3, pp. 223-246.

6. Lind, Jennifer M. 2004. "Pacifism or Passing the Buck? Testing Theories of Japanese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1, pp.92-121.
1. Christensen, Thomas. "Old Problems Trump New Thinking: China's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Taiwan, North Korea, and Japan."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4.
2. Christensen, Thomas. "PRC Security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Why Things Are Going So Well."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8.
3. Christensen, Thomas. "Will China Become a "Responsible Stakeholder"?—The Six Party Talks, Taiwan Arms Sales, and Sino-Japanese Relations."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6.
4. Christensen, Thomas. "The Party Transition: Will It Bring a New Maturity in Chinese Security Policy?"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5.
5. Garrett, Banning. 2001. "China Faces, Debates, the Contradictions of Globalization." *Asian Survey*, Vol. XLI, No.3, pp.409-427.
6. Ji, You. 2001. "China and North Korea A Fragile Relationship of Strategic Conveni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0, no. 28 (August 2001), pp.387-398.
7. Jianwei, Wang. 2005. "China's Multilateral Diplomacy in the New Millennium." *China Rising: Power and Motivation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edited by Yong Deng, and Wang Fei-ling. New York, NY: Rowman and Littlefield, pp. 159-200. ISBN: 074252891X.
8. Jisi, Wang. 2004. "China's Changing Role in Asia." *The Rise of China and A Changing East Asian Order*, edited by Kokubun Ryosei and Wang Jisi. Tokyo, JPN: Jap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pp. 3-22. ISBN: 4889070699.
9.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04. "Beijing's Security Behavior in the Asia-Pacific: Is

China a Dissatisfied Power?" *Rethinking Security in East Asia*, edited by J.J. Suh,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Charls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Pp.34-96.

10. Kim, Samuel S. 2004."China's New Role In The Nuclear Confrontation." *Asian Perspective* 28, no. 4 , pp. 147-184.
11. Shambaugh, David S. 2004.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9, no. 3 (Winter 2004/05): 64-99.
12. Shambaugh, David. 2003. "China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6, no. 2 (Spring 2003): 43-56.
13. Shambaugh, David. 2004.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ing the Regional 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9, No. 3, pp.64-99.
14. Suettinger, Robert. "The Rise and Descent of "Peaceful Rise"." *China Leadership Monitor*, No. 12.
15. Sutter, Robert S. *China's Rise in Asia - Promises, Prospects and Implications for the United States*. Occasional Paper. Honolulu, HI: Asia-Pacific Center for Security Studies, 2005.
16. Wunderlich, Uwe. 2003. "Globalization and Security in the Taiwan Straits,"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 15, pp. 121-138.
17. Yu, Xintian. 2005. "Understanding and Preventing New Conflicts and Wars: China's Peaceful Rise as a Strategic Choice."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17, No.3, pp.279-290.
1. Acharya, Amitav. 2005. "Do Norms and Identity Matter? Community and Power in Southeast Asia's Regional order." *The Pacific Review*, 18:1, 95-118.
2. Eaton, Sarah, and Richard Stubbs. 2006. "Is ASEAN powerful? Neo-realist

versus Constructivist Approaches to Power in Southeast Asia.” *The Pacific Review*, 19:2, 135-155.

3. Lee, Lai To. 2001. “China's Relations with ASEAN: Partners in the 21st Century?” *Pacifica Review* 13(1): 61-71.
4. Yoshimatsu, Hidetaka. 2006. “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s and Regional Integration in ASEAN.” *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28:1, 115-140.
1. Kuan, Eugene Hung-chang. 2006. “Domestic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Explaining the Formulation of Taiwan’s ‘Participate in the U.N.’ Policy.” *Issues & Studies*, vol.42, No. 1, pp. 137-162.
2. McDevitt, Michael, 2004. “The Security Situatio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3:40, 411-425.
3. Wu, Yu-Shan. 2006. “Domestic Political Competition and Triangular Interaction Among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The U.S. China Policy.” *Issues & Studies*, vol.42, No. 1, pp. 1-46.

五、其他文獻

(一)、網站資料

1.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 <http://www.aseansec.org/13100.htm> (2005年6月)。
2. 人民網：<http://www.people.com.cn/>
3. 大紀元：東協 10 國經貿攻防要塞：
<http://www.epochtimes.com.tw/bt/5/3/13/n847150.htm> (2005年4月)。
4. 中華經濟研究院：<http://sear.cier.edu.tw/jk.htm>。
5.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http://www.mofcom.gov.cn/>。

6. 中國網: (朱鎔基:10 年建成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
<http://www.china.org.cn/chinese/PI-c/73119.htm>。
7.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網: <http://www.cafta.org.cn/>。
8. 中國海關統計: <http://www.tdctrade.com/chinastat/chinese/>。
9. 中興大學全求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
<http://cgps.nchu.edu.tw/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50>
10. 中興大學全求和平與戰略研究中心:
<http://cgps.nchu.edu.tw/modules/wfsection/article.php?articleid=250>。
11. 東亞區域整合型態與台灣處境 [1]之探索:
<http://www.tier.org.tw/ctasc/issue/FTARTA/Article4.htm> (2005 年 4 月)。
12. 東盟經貿網: <http://www.wenweipogx.com/ASEAN/indexe.asp>。
13. 財團法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www.npf.org.tw/PUBLICATION/TE/091/TE-B-091-019.htm>。
14. 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www.xinhuanet.com/>。
15. 經濟部投資業務處: <http://twbusiness.nat.gov.tw/paper/y05/04/24-101.htm>。
16. 遠景基金會論壇: <http://www.future-china.org.tw/csipf/activity/mt910506.htm>。
17. 博鰲亞洲論壇: <http://www.boaoforum.org/Html/home.asp>
18. 蔡宏明:〈APEC 在促進區域整合之現況與展望〉,《經濟情勢暨評論月刊》(台北), 第 4 卷第 1 期 (1998 年 5 月)。網址:
<http://www.moea.gov.tw/~ecobook/cynex/sac16.htm>。
19. 洪財隆:〈中國與東協簽定自由貿易協定(FTA)的進程內容與效應〉,頁 1-17,
http://cfcc.nthu.edu.tw/~newsletters/series/4/pdf/feature1_hong.pdf

20.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中國在南海問題的基本立場以及解決南沙爭端的政策主張)， <http://www.fmprc.gov.cn/chn/6000.html//> ；林若霄，(評析中國於東亞高峰會之角色)， http://enadm.url.com.tw/ind/files/literature/4470.4818_4.pdf
21.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南海問題的由來」，
<http://www.fmprc.gov.cn/chn/5997.html//> .
22. ASEAN Secretariat : “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http://www.aseansec.org/5469.htm> 、
23. ASEAN Secretariat : “Press, Statement by the Chairman of the 7th ASEAN, Summit and the 5th ASEAN+3 Summit, ”<http://www.aseansec.org/5467.htm> 。

(二)、西文書籍

1. Andreas Hasenclever, Peter Mayer, Volker Rittberger,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 Barry Buzan, Charles Jones and Richard Little, The Logical of Anarchy: Neorealism to Structural Realism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3. Koro Bessho, Identities and Security in East A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
4. Charles P. Kinderberger, The World in Depression, 1929-1939 (Berkeley, CA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
5. Cheong Inkyo., East Asian Economic Integration: Recent Development of FTA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Korea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olicy (KIEP) ,2002) .
6. Chris Brown,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Houndmills: Macmillan Press, 1997).
7. Duncan Snidal, “The Gam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edited by Kenneth A. Oye, 1986.

8.G. John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9.Hans. J. Morgenthau and Kenneth W. Thompson, *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Knopf, 1985).

10.Hans. J.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ersu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11.John Baylis and Steve Sm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World Politics* (London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Martin Griffiths, *Realism, Id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A Reinterpretation* (New York : Routledge, 1992) .

13.Roger D. Spegele, *Political Realism in International Theory* (New York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Robert O. Keoha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89).

15.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16.Robert Keohane, *After Hegemon : Cooperation and Discord in the World Political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4).

17.Robert M. Grawford, *Regime Theory in the Post-cold War : Rethinking Neoliberal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artmouth : Dartmouth Publishing,1996).

18.Robert Powell,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ew York :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19. Riordan Roett, *MERCOSUR: Regional integration world Markets* (London: Lynne Rienner Press, 1999) .
20. Stephen D.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Ithaca, NY :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21. Michael Nicholso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 New York University, 1998).

(三)、西文期刊

1. Arthur A. Stein, “Coordination and Collaboration: Regimes in an Anarchic Worl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 Vol.36, No.2,(1982). PP.115-116.
2. Benjamin Frankel, “Restating the Realist Case: An Introduction,” *Security Studies*, Vol.5 (Spring 1996) . PP.XIV–XX.
3. C. Randall Henning, “Systemic Conflict and Rrgional Monetary Integration: The Case of Europ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 Vol.3, No.52, (Summer 1998) . PP.537-568.
4. Chang Hui-Ling, “Trade as a Stepping Stone to Power,” *Taipei Times* (Taipei) , (2002) , PP.8-10
5. Ching Cheong, “China FTA Could Be Engine of Growth for Asia,” *The Strait Times* (Singapore) , (December 2001) , PP.13-16.
6. David Dessler, “What at Stake in the Agent-Structure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 Vol.43, No.3. PP.451-453.
7. Duncan Snidal, “The Limits of Hegemonic Stability Theor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 Vol.39, No.4 (1985), PP.591-593.
8. Evans. Thammy, “The PRC’s Relationship with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Modern Asian Studies* (London) , Vol.37, No.3 (July 2003). PP.737–763.

9. James A. Baker III, "America in Asia :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 Vol.70, No.5 (Winter 1991) ,PP.1-18.
10. Jonathan M. DiCicco and Jack S. Levy, "Power Shifts and Problem Shifts: The Evolution of the Power Transition Research Program,"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3, No.6 (Dec.1999) , PP.670-979.
11. John G. Ruggie, "International Responses to Technology : Concepts and Tren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 Vol.29, No.3(1975), PP.561-572.
12. John Ravenhill, "Economic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 Changing Incentives," *Asian Survey* (Berkeley) , Vol.35, No.9 (1995), PP.850-866.
13. Kenneth N. Waltz,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 Vol. 25, No.1 (Summer, 2000) , PP.5-41.
14. Kerongkew, Medhi. "Social consequences of the East Asian economic crisis : A case of globalization gone wrong, " *Globalization and the Asia Pacific Economy* (London) ,(2002) , PP.60-84.
15. Kusuma Snitwongse, "Thirty Years of ASEAN : Achivement Through Political," *The Pacific Review* (Oxford) , Vol.11, No.2 (1998), PP.183-194.
16. Martin Feldstein, "Refocusing the IMF,"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March / April 1998) , PP.90-92.
17. Nye, Joseph Jr. "East Asian Security: The Case for Deep 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July/August 1995), PP.90-92.
18. Patrcik James, "Structural Realism and the Causes of War," *Mersh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39, No.2 (Oct. 1995) , PP.181-208.
19. Peter M. Hass, "Introduction: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 Vol.46, No.1(1992).

PP.1-35.

- 20.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Cambridge) , Vol. 5 (Spring 1996) ,PP.90-121.
- 21.Robert Powell, “An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The Neorealist-Neoliberal Debat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Vol.48,No.3(1994),PP.313-344.
- 22.Rosemary Foot,“China in the Asian Regional Forum,”*Asian Survey*,Vol.37,No.5, (May, 1998) ,PP.338-343.
- 23.Ross H. Munro,“Awakening Dragon : The Real Danger In Asia is From China,”*Policy Review* (Washington), (1992).
- 24.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 *Foreign Affairs* (New York) ,Vol.72, No.3 (Summer 1993) ,PP.25-27.
- 25.Sharma, Shalendra D.,“Beyond ASEAN and APEC : Towards a New Asia-Pacific Economic Regionalism,”*East Asia Review*, Vol.14, No.3 (2002) ,PP.37-48.
- 26.Stephen M.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 Vol. 9, No.4 (Spring, 1985) ,PP.3-43.
- 27.Stephen D. Krasner ,”Structural Causes and Regime Consequence : Regimes As Intervening Variabl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ew York) , Vol.36,No.2 (1982) , PP.13-16.

六、翻譯著作

- 1.Andrew Heywood 著，林文斌、劉兆隆等合譯：《政治學》(台北，韋伯文化出版社，1998年4月)。
- 2.Barry B. Hughes 著，歐信宏、陳尚懋等合譯：《國際政治新論，上冊》(台北，韋伯文化出版社，1999年4月)。

3. Kenneth N. 華茲 (Kenneth N. Waltz) 著，胡祖慶譯：《國際政治體系理論解析》（台北：五南圖書公司，1997）。
4. 大衛·A·鮑德溫主編，肖歡容譯：《新現實主義和新自由主義》（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5. Robert Gilpin 著，郭樹勇譯：《新現實主義及其批判》（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6. Robert O. Keohane、Joseph s. New Yorke 合著：門洪華譯：《權力與相互依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 年）。
7. Willian Overholt 著，鄭正鈐、湯觀明譯：《中國威脅》，（台北：智庫文化，第 1 版，1999 年 5 月）。
8. K. Scott McMahon 著，曾祥穎譯：《美國飛彈防禦的過去與現在》，（台北：麥田出版社，初版，2001 年 8 月），頁 5-10。
9. Dokolsky Richard, Angel Rabasa, C.R. Neu, 高一中譯：《東南亞在美國對中共策略中的角色》，（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局，2001）。
10. 卡利扎德、萊斯著，張淑文譯：《21 世紀的政治衝突》（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第一版，2000 年 10 月）。
11. 佐藤考一著，李明峻譯，（南中國海的國際關係：『中國（共）威脅論』與東協），《東南亞季刊》，第 2 卷第 2 期（1997 年 4 月），頁 38-40